

跨文化对话平台：思想与方法
新思想文库之一

编年史：中欧跨文化对话（1988-2003）

——建设一个多样而协力的世界

主编：乐戴云/金丝燕
协编：皮埃尔·吴翰

北京大学
法国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有过三次接触。前两次在暴力中终结，第三次，没有人能够预料它的未来。它的命运掌握在各方人民手中，人民应当求同存异。

致 谢

我们要对以下提及的先生和女士们致以深深的谢意：马修·卡蓝默

(Mathieu Calame)、陈燕来、艾蒂安·加亚尔德 (Etienne Galliard)、乔纳森·刘 (Jonathan Liu,)、居斯塔沃·马林 (Gustavo Marin), 让-路易·莫尔科 (Jean-Louis Meurgue)、米歇尔·苏盖 (Michel Suaquet)。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乃至付出, 一切皆不可能。

目 录

序言

皮埃尔·卡蓝默/乐戴云
这次会议将带来怎样的改变?

前言

怎样避免作壁上观?
起步 (AVE, DIV, APM)

相互认识与相互理解

“它山之石”

试点项目

FPH 和跨文化组织：神州初探

I. 1991年：相遇广州；1993年：蛇口会议

回顾：地球国家预备性协约筹备工作

企业家交流……

II. 1994年丝绸之路新旅：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

独角兽与龙

III. 1995年世界社会峰会北京会议与亚洲会议宣言

合作的开端（1993-1994）

米歇尔·苏盖与乐黛云相识……

IV. 1996年：文化的多样与共存：南京会议

顽石易朽，文墨永存

跨文化对话掀起高潮

1997：相聚维拉尔索 - 出版计划付诸实施

V. 远近丛书

计划的落实

从文学中走出的北国之冬

别出心裁的丛书

主题选择与跨文化阐释

读者群

巴黎政治大学圆桌会议

VI. 《跨文化对话》杂志

《跨文化对话》始末

怎样的读者？怎样的作用？

《跨文化对话》与人类进步基金会

今后的新方向和新话题？

《跨文化对话》中的基金会

《跨文化对话》与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纪实

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的两种形式和两个阶段

具体成果

VII. “关键词”计划：解读中国、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对话的密码

跨文化出版计划：中西对话关键词

跟随跨文化的进步步伐

相聚达喀尔（2003年1月—4月）

第二部分

中国参与世界事务——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公民？

VIII. 2001年：中国参加全球性对话-里尔世界公民大会。

世界公民大会要应对的挑战

雄心与梦想

追求人道

倡导和平的人

“地球祖国”意识

教育是促进观念改变的首选方法

浪漫与雄心

入他者之境

当代文明的艰难探索

世界公民大会初论

新模式的一线曙光

IX. 世界集体问题思考中中国的声音

世界 APM 网络与中国公民亮相海外

世界 APM 网

中国人发现农村组织问题

世界社会论坛——建设民间社会的新模式

2001-2002年中国对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

石书

2003年中国参与世界社会论坛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一位中国农民研究员首次出国

属于中国的光束

中国代表团访印小结

2001年哈瓦那首届民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

古巴的中国之声

一位中国与会者的期望

2001年9月7日古巴哈瓦那世界食品主权论坛闭幕宣言

第三部分

求同存异、协同共事、迈向集体智慧

2004年皮埃尔·卡蓝默访谈录

X. 1999 : 北京会议: 第三部门——对 FPH 非政府组织职能的思考
“尽人事”还是“守成例”?
一张照片不是一部电影
与合作方的关系
中国 APM 网
转基因: 中国的目光
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策略
中方合作者在国内外展开的思考与行动 (1997-2001)
哲学社会运动

XIII. 2003 年肩负起思考的责任——相遇北京
回顾与前瞻: 跨文化对话——构建一个负责、团结和多元的世界
总结——转眼十年
农民农业与全球食品供给
跨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随笔
长期合作关系
什么是“第三空间”?
北京会议的经验与续曲
两个目标
为了一颗理想的种子和它的千年未来
北京归来, 我们将做, 并且倾听

前瞻

团结产生智慧——中国和 FPH 合作创新

一瞥
2005 年北京治理论坛
心系国家改革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类型
破碎的民主
第一届治理论坛 (2005 年 6 月 5-6 日)

总结与日程
前瞻 1 中欧论坛
前瞻 2 中印论坛: 迈向文化间对话的第一步
青年的责任感与创造力将改善 21 世纪的中印关系 (2007-2010)
前瞻 3 中国食品实验室
中国的期待
前瞻 4 中国与 FPH 的新平台: 三维跨文化对话

后记

FPH 的目光
中国的目光

两个转折期（1996-2002, 2003-2005）：从观察到参与，从计划到方法
思想和实践相辅相成、互滋共长

序

皮埃尔·卡蓝默 (Pierre CALAME)

本文是为 2003 年休整年期间举行的基金会中国合作伙伴北京会议《论文集》所写的序言。它试图从本书的材料出发，归纳出基金会在中国参与的本义。

皮埃尔·卡蓝默

专著/FPH 基金会/2007 年 7 月 26 日/6 页(内部常设文献库[Bip]编号(n°):
3443)

摘要:

主题关键词: 历史; 跨文化

地理关键词: 中国; 欧洲; 法国

角色关键词: 大学、非政府组织、国家、基金会

方法关键词: 思想与提案传播; 经验积累

编号: intranetfph/bip/3443

本书是关于一个事件的记忆。这一事件，便是由中国文化书院乐黛云教授主持的中国合作伙伴与基金会历年参与这一合作的主要角色之间的一次聚会。聚会发生在基金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即在 2002—2003 年休整年期间。

何为基金会休整年(sabbatiale)?

那是每隔十年重复一次的时刻，期间基金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历史，在经年累月的紧张活动之后，从容地进行长时间—18 个月—的思考，以便总结教训，并在确定新方向的同时获得一种新的冲力。

如果基金会确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把社会变迁的长远历史作为她工作的切入点，那么是否还真需要每隔十年变换方向？当然，变化并非为变而变；而是因为社会在演变，因为我们本身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接触，每天学到很多东西，并应利用这些所学内容，去与新的合作伙伴接触交往，或使我们的行动方式发生变化。

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治理可用一个三脚支架来形容：体制机构；机构间的角色与权限分配；制约每一方行动的规则。治理的这些基础不太适合处于运动和转变中的社会。体制机构不断地被要求演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角色与权限互相转变，而那些不适合于情境多样性的规则便成为枷锁，不仅不能规范，反而阻碍各种关系。于是，应当用目标、伦理和工作机制这另一个三脚支架来取代治理的传统三脚架。

目标即是为我们引路的星星，一个恒定的、振奋人心的和遥远的终点，但它象磁铁般地吸引住我们，是我们共同行动的理由本身。

伦理确定共同生活的原则。伦理在不事先强加统一规则的情况下激励我们时时刻刻寻求借鉴开放、互惠、尊重和效率原则的各种规则。

至于工作机制，则是我们随着学习所得而共同创造并不断修正的行事方式，旨在找到一起走向目标的最佳方式。基金会的体整年就是这类重要工作机制之一

如同犹太智慧书(传道书，第三章)所说：“万事皆有时机，万物各有节律；一时投石，一时拾石；一时寻找，一时失落；一时保留，一时抛弃”。而对我们而言，基金会会有一个行动时间和思考时间。有一个采集经验和发展合作伙伴的时间和在一个在所有这些材料中挑选提炼用作下一时期基础的东西的时间。

因而，把本书主要献给逝去的时间、献给曾需要在 2003 年进行总结的随着岁月而积累和演变的事物，则不足为怪了。与一个前来评判我们的所作所为的专家的所谓中性的评估相反，总结只能是共同的。这儿的总结，也就是无论天晴还是下雨，也无论奔康庄大道，还是走曲折艰难的小路，曾始终与我们结伴同行的合作伙伴们聚集一起，在一个中途站歇脚、进食、恢复体力，同时返转身来共同观赏已经走过的路途。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取名为“编年史”的原因。它叙述一段历史。它的主角是时间。一段有进程、有巧遇、有反复、有繁荣，也有主观性的历史，因为，同一历史的两个角色可以有那么多的诚意，而且他们的叙述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人们甚至可以怀疑他们是否曾真的共同经历过这一历史。

这一历史，便是 1988 至 2002 年间，基金会不敢说是与中国缔结一个区区瑞士基金会敢谈与一个博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将是何等的自命不凡！一而是与她自己选择的、或自己被选中的合作伙伴所建立的伙伴关系的历史。这些关系通常都产生于表面很偶然的聚会。然而，当两个人或两个机构相互“再”相认的时候，是否还真的出于偶然？无论如何，这些合作伙伴对于基金会来说，就是“她的”中国关系。而对于每一个中国合作伙伴而言，基金会将曾经是它们一至少基金会是如此希望的一通向西方和通向世界的门户之一。

这一段历史本身就是由多重历史构成的。这是本书具有点彩派性质的原因所在。如同任何优秀的编年史，它一段一段地所连接的是对各种聚会的叙述、对聚会所产生的后续事件的描写以及聚会的中方或欧方主角对这些共同冒险的评述。

就象古时的编年史那样，本书不打算对此作概括综合。它不试图从中得出一种关于合作伙伴关系、关于跨文化对话或关于欧中关系的立论并强加给读者。它尽可能贴近每个人在这些历史的某一时刻的所言、所思和所行。然而，就象计算机显示屏那样，无数个像素在一定距离观看时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图像，而当所有这些故事相互形成补充时，便产生意义，并加入到大历史之中；这一大历史，也就是90年代期间，中国全新进入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与西方新关系的历史。

就象一个俄罗斯玩偶一样，时间与空间一一嵌套在一起。1988年至2002年间，一个瑞士基金会与其中国合作伙伴的对话也是如此。这个历时十五年的时期与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开始的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新时期衔接在一起。这一新时期又可被纳入一个为时数百年的一就说从利玛窦开始吧一现代西方建设与中国之间的对话时期之中。而最终这一时期又可融入到一个以丝绸之路为物质载体和象征的中西交流数千年的背景之中。

只有在这样一种俄罗斯玩偶式的景观中，本书的书名—《编年史：欧中跨文化对话》—才显出它的全部意义。这是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女士和男士们所作的贡献，他们恰恰就象当年取道丝绸之路的沙漠旅行者一样，追求和丰富一种跨文化对话，而这一对话即便是在最严重的危机和封闭时代也从未真正间断过。

这是一次跨文化对话的编年史。虽然它只是成千上万其它对话中的一次，但我们却喜欢认为，它的持久、频繁和丰富程度都足以使它本身随之具有关于西方和中国跨文化对话的更普遍的教训。

这一对话的价值在于它的轶事性。人们有时谈论文明间的对话，就好象这种对话是自在存在，而不取决于构成其经纬血肉的具体男人女人、体制机构和事件

有人常说，建设和平须从解构敌人的形象开始。有人还说，战争就是言语的变节。当他者的具体现实消失，而被代之以无时间性和非物质性的抽象概念—他们与我们、野蛮者与文明人、西方与中国—的时候，语言的变节便出现。

我们在始终不懈地追捕这类抽象概念，并代之以对话、共同行动、逐渐建立的信任、冒险或共同分享的梦想等种种现实。这一抽象的“他者”并不总被恶魔化。“他者”也同样可以因对其理想化而被毁灭。对象我这一代人来说，只要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加入切格瓦拉(Che Guevarra)、加里巴尔迪(Garibaldi)、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拜伦或圣女贞德的行列，如何走进被按照那种曾赢得人民、煽动人民暴动的革命的浪漫理想进行想象与重建的革命万神庙，便足以明白这一点。我们的跨文化对话用面孔和事件替代了抽象概念。我们这种做法最有典型意义的，则莫过于“远近丛书”了。我们在这套丛书里谈论死亡、美、自然与梦。但却不是对这些重要抽象概念的中欧观念比较论文；而是每一本书的中国作者和欧洲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并通过谈他们自己对死亡、美、自然与梦的观念，使这些概念具体化。按词源学“言语交错”这个意义上的对话只因为对话伙伴的存在而存在。

因此，应当把这一编年史看作是一种随着岁月流逝而进展的具体对话的编年史，就象观看一些忠实朋友之间十五年交往书信的收藏集一样。

因为书信交往还在继续，所以这一编年史也是一种进步的编年史。不仅仅是相互认知中的进步，而且也是这一相互认知所采纳的意义的进步。特别是，我在这儿以基金会执行主席的名义说话，并不敢在我以下说法中牵涉到我的中国朋友；与中国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为中国本身而寻求的关系。我们从未对自己说过：“基金会对中国感兴趣”；我们也从未对自己说过：“应当发展跨文化对话，尤其是与中国的跨文化对话”。

我们对中国的关注从来不是纯知识性的；也不是纯被理解和认识的欲望所指引。我们对中国的关注从一开始便以清晰明确的方式表明是实用性的。它出自基金会在八十年代的一种意识觉醒，也即当今世界的各种重大挑战都是全球性的挑战，而且就象今天人们所说的那样，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地方性(glocaux)”问题，既有地方性一面，又有全球性一面。

既然挑战都是全球性的，那么显而易见的便是：没有中国，世界便不成其为世界；因此，与中国建设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便不属于好奇性和知识性的关注，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必要性。

就在中国社会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对 1830 年至 1950 年一段使其深受伤害和侮辱的历史欲行报复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西方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的根本利益关系之外，高度肯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确定在欧洲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深层的对话是建设一个和平的、并因人文与文化的相互贡献而变得丰富的世界的前提条件。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从不曾为对话而对话，而是为共同行动而对话。

如同任何编年史，本书按时期区分章节。它把人类基金会与中国编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相互发现与相互了解；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或者说中国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为应对共同挑战和建设一种集体智能而学会共同携手工作。

这三个阶段事实上结合了两种逻辑。还是那个俄罗斯玩偶的问题。第一种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所特有的逻辑；即相互发现的时间与共同行动的时间。而第二个逻辑则更为重要；我想它与中国变化的速度密切相关。

当人们谈论两个社会对话的时候，人们有时似乎在认为每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时间都是同样的。而这是再错误不过了。从 16 至 19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曾深受演变节奏差别的影响。

西方曾被卷入一场巨大的演变，且导致产生了一种利弊双全、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在同一时期，继承了悠久历史的中国似乎成了传统与惰性的囚徒，处于被动忍受而不是主动书写历史的境地。

而在本编年史所涵盖的时期恰恰相反，让人惊讶的，则是中国转变的速度，若与西方的相对稳定性相比，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在经济与技术领域，人们谈到追赶效应，或者“后来者(dernier parti)”优势。“后来者”可以享受别人的经验，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组织方面的经验，而无需承受一种悠久历史的积弊与沉重。

在和我们相关的那个还受天安门创伤影响的时期之初，在快速向世界开放的中国经济—而且这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以立足中国并很快发生技术转让的多国企业为榜样—与还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前一时期的封闭性的中国社会之间曾经存在着一种反差。因此，我们基金会在其行动中还受某种忧虑的引导，考虑帮助中国社会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并且参与对话的国际动力机制，就象基金会当时称为APM(农民农业与全球化)的项目所推动的那样；这一项目的目的，是使得本质注定为地方性的农民世界不被它既无法理解，更不能控制的国际动力所推翻和毁坏。

在这第一阶段中，如果我可以尝试一种说法的话，那就是我们试图使我们的中国朋友通过这一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世界公民社会的发现中赢得时间；这一公民社会尚在建设之中，但我们觉得它的建设必不可少，而它的目的是为了

避免经济霸权统治或者美国文化霸权统治的双重野蛮。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促进一个负责、多元与团结的世界联盟”的建设占据中心位置；在这一阶段中，我们试图使中国合作伙伴直接成为正在创建中的世界的相关方。这种参与的象征本身，首先是中国合作伙伴对2001年12月在法国里尔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的大规模出席，然后是这些合作伙伴对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介入；而自2001年起，世界社会论坛即在普通公众眼里，具体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也即此前还曾各自封闭于自己的地域或主题空间之内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趋向于同一目标，以肯定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当负责建设这一世界。

第三阶段即是中国社会各组成部分都意识到自己是有待建设的世界秩序的相关方的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便是它的象征性表达。我们从共同生存的象征体系过渡到了在互相尊重之下共同行动的挑战。

既然我在开头援引了传道书的犹太智慧，也既然跨文化对话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把我们融入一种世界性麦当劳化(mac-donaldisation du monde)之中，而是用我们的文化生物多样性使我们互相丰富，那么，我在这儿将引述使徒保罗。在回答那些认为基督的信念只属于守教规的信徒的人时，保罗大体上这样说：已不再有犹太人、希腊人，也不再有奴隶、自由人，而是上帝的孩子们。透过这番话，保罗并不试图颂扬一种无阶级、无特殊历史和无差别的社会。人人保持自己的位置；这就使得经常有人指责保罗为社会保守主义。其实他是想说，我们有共同的更重要的东西，它超越我们间的差异，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作为相应对比，我们的对话行程就是要把我们引向一种这样的目标趋同。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需要共同紧急地建设一个更易相处和更民主的世界。作为公民，我们应当来共同

设计和建设这一世界，而不忍受经济与强权决定论。我们希望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不断丰富的对话来建设这一世界；而中国人和欧洲人既相似，又不同，既是世界公民，又是不可缩减的两大文明的继承人。

本编年史自许是这一宏伟冒险事业中的一粒石子。

作者介绍：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执行主席，治理问题专家。

译者：让-居易

序 言： 承当思想的责任

乐黛云 金丝燕

本书记录的是中欧一次历时十五年的共同历险。

2003年2月26日至28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与法国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简称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联合主办了“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为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国际研讨会。70多名不同职业、身份、国籍、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与会者，就环境与人类责任、农业、经济一体化与多元文化对话、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前景进行了一次前瞻性的跨文化国际民间讨论。

“我们会议的目的不是将十几年合作的成果做一个回顾和展示。我们会议的出发点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问题把我们联系起来。是共同的问题将我们召集到一起。我们需要创造和体验在一个共同思考空间中共同思考的过程。当我们在等待历史的时候历史往往同时也在等待我们。人是有责任的思想是否能改造世界，是否能改变历史那大概是上帝决定的，但思想是我们的责任。”（陈越光）

2003年的北京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对我们中国网络与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第一阶段合作进行了总结，为第二阶段的合作前景制定了战略方向。我们的合作背景是中西的第三次相遇。

文明圈的撞击：对他者的两种态度

近世以来，中国与西方三次相遇。

“我”在与他者的相遇中，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着力在他者身上寻找相同点，第二种态度则是寻找他者与自己的不同点。

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当时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雍容大度，让别人了解自己。传教士中，耶稣会教士所作的了解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最大。其重点，就在寻找西方与中国可能的融合点，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天主实义》，皈依天主教的儒士严谟所著的《天帝考》。严谟（教名保罗 Paul）在中国儒家古代经典中找出六十五处有“天”和“帝”的段落，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天、帝的异同，并推断中国古代的“天”和“帝”就是西方的上帝。这种寻找相同性的努力使耶稣会教士比较平和地得到中国的认可并融入中国，在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耶稣会的这种努力受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专家们的质疑，罗马教会颁布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的法令，第一次中西相遇在“礼仪之争”中

中断。本来可以建立的对话成为不可能。

中国在这一相遇中的态度是不在乎、自大和比较开放。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西方“自我”主体意识的出现，中国是西方想象中一个使人莫名其妙却很有吸引力的“他者”，一个儒家的乌托邦。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惊醒，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以图革新与革命，坚信只有科学、进步能救中国。一个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新世纪开始了。西方向中国输出他们各自的文化模式，中国最终选择了启蒙思想、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

中国在第二次相遇中的态度是务实、被动、卑微，但仍然自大。一切西方的东西，只要不危及政体，均要拿来。科学技术、文学、教育、哲学、经济、军事全方位地接受。这样的接受情形，表明中国没有与西方对话的平等心态，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如果说第一次中西相遇是西方走向中国，那么，第二次相遇的方向则相反，是中国被迫面对西方。中国成为西方“自我”认同与扩张的假设对象，成为进步与自由的反面。第二次中西相遇就这样在不平等和中国几乎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进行。然而，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自我，但也没有归化而成为他者。中国的尴尬与矛盾就这样在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与西化的反复交替中体现出来。这两种思潮其实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其根源都是没有平等的对话精神。

中西相遇，是两个文明圈的撞击。双方互为他者，是对立、借鉴、批判、镜子的关系。一旦任何一方逾越这一界限，试图把镜子变成自己，用自己的文明标准强加于他者，就会出现大冲突，就会带来恐怖与威胁。第三次中西相遇，核心问题都集中在自我身份与他者所代表的不同特性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主体如何在他者的相互认知中保持各自的主体性。倘若这一关系不能协调，第三次中西相遇便不能避免遭遇前两次的命运。

新的方中西相遇，有两大因素是避免冲突的关键：一是在尊重各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二是使跨文化对话具有真正的跨度和多元性，如加入非洲，拉美，亚洲、大洋洲等过去不被重视的不同文化。倘若人类真有普遍性，它应该来自丰富的特殊性。任何归化他者或拒绝他者的心情和做法只能剥夺其特殊性，也就是摧毁其普遍性。20世纪，中国曾试图按他者的标准建立新的世界，其代价是自身的文明被轻视和否定。然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获得成功发展的先例。只有发现、发扬自己的特殊性，充分尊重与自己不同的相异性，达到真的互识，也就是在人类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以自我为相遇的途径和方法，达到与他者相遇和沟通的目的。跨文化对话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纬度上，通过寻找和尊重相异性来达到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目的。

多元、跨文化对话：人类新的历险

在跨文化对话中，我们的立场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区域的、个别民族的而是多元的、社会的、人类的。我们不谈保卫，亦不尚归化。我们认为人类文化没有优劣，但有着不断演化的特殊性，我们最大程度地承认他者的相异性以消除对立。

然而，具有寻找和承认相异性的意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习惯于从他者身上寻求与自己的相同点，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有安全感。但如果把他

者完全拉到自己的文化想象中去，他者的特殊性就被剥夺了，同化了。

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对西方的影响，并对“善”之帝国和社会乌托邦提出质疑。欧洲对他者（包括自然、生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继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第二次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自己。这种自我批判的态度很可能从思想上影响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关注欧洲知识、思想界的这一动向。当“他者”与“我”由对立面转到对话者，真正的相遇才开始。一切取决于相遇者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期待下，九十年代初，我们和欧洲跨文化学院 (l' Institut Transcultural)、人类进步基金会 (Fondation Charles - Lé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ès de l' homme) 全力推动跨文化对话，希望打开中国、印度、拉美、非洲和西方各国文化的大门，建立相互信任和了解，共同就人类面临的挑战进行思考，在多元文化的平台，用跨文化的精神去寻求避免冲突、建设和谐的世界家园的集体智慧。

人类进步基金会自 1982 年创立以来，将人类认知的探险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使命。它以鲜明的积极促进多元对话的态度，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最早提出建设负责、协力和多元的世界。基金会与全世界上万个个人与组织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农民、渔民、居民、研究人员、企业家、作家、工会干部、记者、哲学家、政治人物、编辑、艺术家、公务员等。二十余年来基金会通过长期的工作，建立了以信任和理解为准则的世界网络。

人类进步基金会的使命与我们希望第三次中西相遇以及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期待相吻合。我们中国网络是基金会最早的中国合作伙伴，是人类进步基金会三个发展阶段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基金会的第一阶段为 1982 至 1989 年，工作重点在于鼓励扶持有具体思考与行动力的方案，世界各地的几百项方案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主题包括：发展政策、卫生、教育、居民、农业、开办企业、小额贷款、环境、对全球未来的思考等。第二阶段为 1990 至 2002 年，基金会致力于建立重大主题的国际网络与建立经验交流、传播信息化机制。从 1994 年始，基金会全力支持了“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联盟”的诞生及发展。联盟并非是实体，它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众多公民与各种组织，共同思考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模式、希望走出个人的无力感、创建集体智慧、推动变革，建立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第三阶段：在十年工作基础之上制定了 2004 至 2010 年规划，其宗旨是：

- 从地方到全球需要新的治理观念、新的社会策略与机构准则，我们的世界相互依存，人与生物圈相互依存。
- 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方式，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而持久的社会。
- 要管好我们共同的星球，上述两种变革必不可少，从而需要与之相符的共同伦理原则。

这些新规划的实施需要在世界区域之间、各社会、各领域之间实现新的对话、交流，增强集体建议的能力。人类基金会作为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全力促进世界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赞同基金会的新规划和工作方法。

思想者与实践者：跨文化对话、思想与方法、跨文化对话国际论坛三足鼎立的空间

我们的合作，在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

建立一个思想的学校。我们关注的是创造集体智慧，做思想者与实践者。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多元的国际思考平台，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和对话。人类进步基金会及其世界网络处在国际思考的前沿。我们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创建了跨文化对话平台，其中包括《跨文化对话》杂志、《远近》丛书，组织翻译出版基金会与国外的各种思考与研究的文章、专著，如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J.里夫金的《欧洲梦》；组办北京治理论坛、中印论坛与专题国际研讨会；并自2007年初拓展了跨文化对话的平台，通过《跨文化对话》杂志、《“思想与方法”空间》与《跨文化对话国际论坛》形成跨文化对话三足鼎立的空间。在《“思想与方法”空间》，我们将推出《思想的对视：跨文化新人文书库》，《新思想书库》，两套丛书，将最新资料、最新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新论题介绍给中国，将首先翻译出版基金会推荐的五十种资料。

建设一个具有首创性与实践能力的公民空间。我们关注的是世界各文化的经验积累与共享，思想者与行动者两种能力的共存。世界各文化的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是非常宝贵的财产。启蒙运动两个世纪后，国际与西方社会认识到人与众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进步基金会及其网络在多元对话与实践的方法上有广阔视野、警觉的观察力、灵活的组织和参与能力。

为了使这些丰富的人类经验能够得到交流共享，使中国与世界能够对话，互相观摩，我们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把这些经验和思考逐渐译成中文出版，如《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资料》(Dossiers APM)，A.阿伯特的《草莓中的鱼》和R.约瑟夫的《世贸组织思考》，《治理的一百个问题》等。还创办了《土地与公民》报。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经验资料库(DPH)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组织人员交流。我们与人类进步基金会组织了多次国际社会的中国农村考察(1997年陕西、山西、江西三省粮食安全考察，1999年宁夏农业、水利与粮食安全考察，2002年北京农村地区绿色农业考察，2004年江苏、甘肃两省的持续性农业发展模式对比考察，2005年东部沿海渔业持续性发展考察)。我们始终坚持多元的原则，参加考察的中外代表由研究人员，政府与公民社会代表三部分人员组成。另一方面，组织中国人员参加了第一、二、三、四届巴西、印度国际社会论坛，古巴世界粮食安全论坛，喀麦隆世界农民论坛，葡萄牙世界渔民论坛，南非、喀麦隆、巴西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国际考察美国粮食安全讨论会，美国世界粮食实验室年会，瑞士公民与世界一体化讨论会，法国世界公民大会。我们很赞同基金会的工作方法：考察与开会同时进行，参加者的发言与考察中提出问题并随时随地与讨论相结合。提倡通过现实问题来思考问题。面对现实而非感叹现实。坚持透过问题去理解文化，这比单独寻找解决办法可能更重要。

要“提炼历史进程中的过渡点。历史永远都是一个过渡状态，每一时期都是一个过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声音，各自有自己的过渡点，互相表达，互相倾听不同的声音，没有主宰，也没有主宰的声音。建设一个协力、多元、负责的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关照；交流我们所经历、所观察、所思考的问题、事件、现状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强调观察比观点更重要，提出问题比得出结论更重要；赞成那种经过思考的生活，提倡那种经过观察的思考。”(陈越光)

蓝天之下，精神深处，我们将与人类进步基金会一起，协同世界的朋友

们共同历险。

想

树，目光
心
月亮舞者
拉开云雾
烛火上祖先的气息
智性
思想的仆人

(金丝燕：《象形文字》)

从人类、社会、政治角度来看，加深对他者的了解，就是进一步了解自己。如果用术语来讲，就是在工作中评估自己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认识他者，参照他者对我们“成为自己”必不可少，“成为自己”又是对话，协商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地狱，就是他者”，萨特《禁闭》(Huis Clos)¹中的主人公如是说：我认为地狱，是拒绝他者是为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规则来衡量他者，吞噬他者，强制他者接受我们的规则和行动，进而剥夺他者的活力。理解他者有助于我们明晰我们自己的经历，从而去伪存真。今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三个世纪以前的人们看来可能会匪夷所思，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却最容易被忽略。伊丽莎白·巴丹特尔 (Elisabeth Badinter) 在著作《爱之外》(L'Amour en plus)²中，用历史及社会学方法，研究了四个世纪以来，母爱这一概念的变迁，并提出了有趣的观点，她向我们展示了母爱——法国人一致推崇的情感——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将超越人们的认识，发生新变化。作者进而提出疑问，这种情感到底是人的本能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分析其他文化的特点，分析某些概念与时间、荣誉、金钱、自然、情感和权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证实我们自己与这些概念的关系是不是符合我们原先的认识。或许可以借用印度理论家雷蒙·潘尼卡 (Raimon Panikkar) 评述宗教的话来谈论广义的文化：“只了解己方宗教的人算不得真正懂得这门宗教，他至少应该去接触另一门宗教，从而给自己的宗教定位，进而发现它的特性。³”

(米歇尔·索凯：《他者的智慧》，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出版社)

¹ 这一表达无疑被过度阐释了。依照原著的上下文来看，它并不强调“他人”身上的地狱气息，而是指禁闭主人公的空间本身，是它使得人物日夜生活在他人眼光和评价之下。

² LGF – 袖珍本，巴黎，2001年。

³ 引自 Hesna Cailliau, 《宗教的精神》，Milan 出版社，2006年。

基金会是一个极特殊的机构，其创始人捐赠的遗产收入使基金会具备两个特权：相对于各种权力的独立性和长期行动的能力。

面对人类在二十世纪末遇到的挑战，基金会的独立性可以使它们的惰性小于那些庞大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基金会因而负有一种责任：对规划人类未来的前景作出贡献。

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即将来临的巨大变革，人类似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因为以往发明的调节形式已不再能适应人类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初看上去，大规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似乎最有资格迎接这些挑战。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受到许多制约，最大的制约之一是它们为了保持其活动分子的热情而不得不选择有轰动效应和立竿见影的行动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基金会需要采取主动。遗憾的是，由于文章中所描述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它们很少这样做。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通过支持负责、多元和协力的世界联盟的诞生和发展尝试接受这一挑战，并承担这个有抱负的责任。它呼吁那些具有相同责任感的基金会共建一个基金会联盟。

(皮埃尔·卡蓝默：有抱负是基金会的责任，陈力川译，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3 337)

这次会议将带来怎样的改变？

开了这个会能怎么样？这是我们在筹备会议中经常要自问的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很多精力，也花很多财力，大家在百忙之中赶来开这个会，除了互相交流一些想法，又能怎么样呢？我想其实谁都知道不能怎么样。我们的会议2月28日晚上结束，2003年3月1日的地球照样是这样的转法，风采依旧，危机依旧，污染依旧，迷茫依旧。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代人类思想视野的拓宽有赖于每一个人提供各自不同的视角。这点我们是明白的，当代人类的思想视野有多宽和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的思想视野是有关系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学业中，沉浸在自己所谓的事业中，沉浸在自己的忙碌中，或者沉浸在自以为是的争夺中，甚至沉浸在互相的伤害中！我们在具体的忙碌中麻木了，仅此而已。当然，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面对颐指气势的超级的大国政府；我们面对信奉资本统治世界是天经地义的跨国财团；我们面对广泛的贫穷、资源匮乏、环境恶化，我们也面对着互不理解的你、我、他，在这一切面前我们确实深深感到我们个人太渺小了，太无能了，也太无奈了。于是，似乎我们能做的，就像大仲马借基度山伯爵之口说的：在上帝还没有给人类新的启示时，人所能做的就只有期望和等待。但是，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内心的力量，一种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等待历史的时候历史往往也在等我们。这种声音又提示我们人是有责任的，至少思想是你的责任，思想是否能改造世界，是否能改变历史那大概是上帝决定的，但思想是你决定的，所以开了这个会我们至少表示了我们认识到思想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最后我要说，如果需要对我向大家汇报的中方筹备小组对会议的这些设计和思考有一个标题的话，这个标题就是——承当我们思想的责任。

谢谢大家。

(陈越光：2003年会晤北京大会开幕式发言，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3 308)

怎样避免作壁上观？

一个基金会的手上握有两张王牌：自身的独立性和长期行动的能力。

一个基金会的治理应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两张王牌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张王牌如何才能服务于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实践中，基金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选择一个相对有限的介入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资助相当数量的项目，对这些项目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限定，项目之间互不关联。这个方法经常被当作明摆着的事：一个小基金会在抱负方面应有自知之明，它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智力和财力关注广泛的问题；为了评估其影响力，它需要“不同于别人”，就象美国人说的那样“to make the difference”，办法是选择适合其能力，可以将效果孤立起来观察的短期项目。应当质疑的正是这个“明摆着的事”。如果这不是一个“明摆着的事”，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机构用另一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就是基金会治理的最大问题。

(皮埃尔·卡蓝默：基金会运作的十个问题，陈力川译，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3 338)

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当一个基金会愿意介入到这个现实中去的时候，就要放弃一点一点评估其影响力的做法。但是它没有权利放弃评估的考量。问题不是弄清楚一项资助是否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而是弄清楚面对特定的挑战，我们是否很好地使用了所占有的资源。这是一个战略部署而不是一种管理监督：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合作者好不好？我们是否运用独立性使行动作用到点子上？基金会的介入是否使原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次行动是否借鉴了从以前的行动中学到的东西？有没有产生协同作用？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否会给其他项目提供有益的经验？等等。这就是相对于影响评估，我们可以称作恰当性评估的东西。

在许多基金会，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某个特殊领域的考量常常与同时在几个领域投资的愿望相伴随。这反映了对问题的复杂性和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活动领域的意识。但是人们同时发现这个选择一经做出，基金会各个部门的活动便相互隔离了。这也是官僚主义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如果不同的项目不能真正连接，如果它们之间不能互助互补，那么同时推动这些项目还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在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值得倾注全力的情况下？唯一的答案仍然来自内部：不同领域的并存是因为基金会想在几个问题上同时出击。这应当是现实的结构特点，即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的重要性，它证明同时涉足这些领域的正确性，也意味着应当在基金会组织的内部建立和重视这些关联。

(皮埃尔·卡蓝默：基金会运作的十个问题，陈力川译，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n° 3 338)

起步 (AVE, DIV, APM)

我们的合作始于1992年启动的三个项目：AVE（地球未来项目），DIV（文化间项目）和APM（农民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当时的目标是与欧洲的两

个基金会取得初步接触（跨文化和 FPH），之所以没有选择美国基金会，是想了解美国之外的地区怎样看待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中国怎样才能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农村地区的改革与发展？FPH 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政府改革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由此，中方决定参加 AVE、DIV 和 APM 三个项目。中方合作人员并非没有隐忧。人类进步基金会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听起来顺耳”，可它会不会把自己的理念（我们并不担心方法）强加给中方人员？另外，微小的不慎（一句或是一篇未被媒体妥善报道的讲话）就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政治问题甚至间谍嫌疑），因为我们的中国朋友们不是在世外桃源悠然读书的文人，也不是独自冥思或是三五成群谈天论道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多方正式机构。在陈越光和谢杨主持的 SECM（中国农业现代化网络）——APM 在中国，国家级机构就有 5 个：

- 中国文化研究院
- 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农村杂志社和 700 名乡村干部
- 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的期望非常明确：增进利于长期共同发展的深层互信。我们与 FPH 的战略关系定位如下：

-国家层面：组织并落实同 FPH 的各种会晤，为全方位开展工作做好准备；

-国际层面：积极参与、认真观察并深入思考，在媒体面前尽量少说话。国际会议期间中方人员表现得积极而且坦率，但一旦遇到记者，到了摄像机面前或者签署一项宣言时，他们可以马上缄口不言。在 1996 年罗马世界粮农组织和雅温得 APM 国际会议上他们宣称自己“仅仅是观察员”。

中国与会者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开放需要时间和耐心。FPH 对中方人员表现出了耐心和深度理解。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方与 FPH 之间、中方人员和其他国家与会者之间建立起了深层互信。这种信任得益于 FPH 成员的努力，他们表现出了堪称典范的耐心以及处理问题的高度灵活性，中方对此感受甚深。

至于协调工作，我们成功地让大家认识到：我们不是要以领导、特派员或是指挥的姿态做事，而是要进行积极协助。这种态度和方法受到了中方的赞赏。

（陈越光、金丝燕：对 FPH 的期待？——两大历史转折）

基金会的中国合作网络

-政府机构

国务院农村发展部(北京)

无论从科研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讲，在基金会的中国合作网络中，国务院农村发展部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承担着政府顾问的角色。在陈越光和谢杨副部长的帮助下，自1999年第二届会议开始，我们就得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部的大力支持，由此，在中国的农村实地访问和考察才得以顺利展开。

江西省行政学院（西安市）

江西省行政学院为培养国家公务员而设。皮埃尔·吴翰和皮埃尔·卡蓝默在这里分别主持了食品主权和国家治理研讨会（2004，2005）。

该校副校长曹刚参加过北京治理论坛，他曾提议与中国其他行政学院及FPH的IRG一起进行一次全国普查（陕西省行政学院牵头，云南、山东和甘肃等省行政学院参与），这项计划即“中国公务员培训系统和治理思想实施研究计划”。

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

江苏省行政学院在行政系统改革领域举足轻重。土地政策研究院前院长冯治是我们的忠实合作伙伴，他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对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着深刻理解，也正是他组织了2004年夏的中国西部实地考察。皮埃尔·吴翰受邀作了全球农村及社会运动现状报告。

广东省行政学院(广州)

广东省行政学院与法国国立行政学院一起参加了欧盟的高级干部培训计划。2006年6月，在欧盟培训计划框架内，谢林平先生邀请陈力川先生在此举办了治理研讨会。

中国各行政学院在FPH建设思想型学校的进程中，尤其在治理和政府改革等问题的处理上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中国西部、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毛如柏先生对中国APM网在宁夏举办的活动提供了支持。

江西省乐平市政府（中国南部）

乐平市前市长张保增是APM中国网的积极成员，曾出席APM框架内的多次国际会议。1997年，他和陈越光共同组织了对江西的实地考察。

河南省南乐县政府（位于北京以南）

河南省南乐县政府为乡政组织调查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大力支持。1949年以来，乡政机构组织就是一个禁忌话题，没有该县的支持，在中国农村的这次实地考察将无法实施。

-学院

中国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院是中国第一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所非政府研究院，前院长汤一介教授是乐戴云教授的丈夫。该院因其科研水平与文化研究规模而享有国际盛誉。卡蓝默先生非常欣赏该院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召力，邀请它共同组织了2003年北京大学国际会议。自1992年以来，该研究院积极参加了FPH组织的历次活动，是FPH最为重要的中方合作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副所长杜志雄、李成贵、檀学文于2004年组织了渔业实地考察。中国粮食实验室U进程正式启动。该研究所拥有40名一流的研究人员，承担着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的责任。与FPH的合作中，该所亦举足轻重。

-大学

在活动组织、高等教育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探讨中，中国各高等学府都是我们的可靠同盟。

乐黛云教授时任北京大学跨文化中心主任、《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她是FPH最早的中国合作伙伴之一，领导着《独角兽与龙》丛书的编辑工作。2003年2月，乐教授在北大农园主持了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与中国十年合作的“回顾与前瞻”大会。

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是1996年南京会议组织者之一，南京会议之后，任《跨文化对话》杂志执行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宋永伦教授在中国治理论坛期间组织了同中国大学生的辩论。1996年以来，他积极参与了FPH组织的多次会议，如澳门和里尔会议。

广州大学王宾教授是“关键词”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由索凯·米歇尔（Michel Sauquet）和嘉特琳·盖尔尼耶（Catherine Guernier）在1996年联合发起，由盖尔尼耶女士和加亚尔德（Etienne Galliard）先生负责组织。自1992年起，王教授就是FPH各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陈越光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副主席。该基金会参与了2003年北京会议的组织工作。在北京会议开幕式上，青基会理事长顾晓今作了如下

介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诞生于 1989 年，是在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与其他中国非赢利性组织一样，青基金会经历了从逐渐摸索到独立自主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过去十年中，青基金会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有效的成员管理机制。例如：在捐款管理问题上，一对一的治理体系是最为有效和最为流行的方法。相互信任的关系保证了捐助者和受益人之间的美好沟通。这样的做法使得捐助人可以随时了解受捐者的情况，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因此能够得到捐助人的经常性监督。

在赞助管理问题上，我们不仅制定了希望工程执行管理条例，还同各省级青基金会和县级政府签署了协议，来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权利并规定了违反协议行为的惩罚措施。在我们的建议下，作为监督体系的一部分，希望工程全国监督理事会得以成立。此外，我们在河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自治区）组织了两次政协监督代表团考察活动，以监督希望工程的实施。

在资金使用管理问题上，除国家审计署的专门审计外，我们还委托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并公开发表审计报告。

1997 年，经国家商标局批准，“希望工程”注册为中国首例慈善商标，“希望工程”名称从此受到法律保护。

在中国贫困地区，每年有 600 所小学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建立起来。调查中国农村地区教育状况的计划也在酝酿当中（陈越光、金丝燕、檀学文、冯至、桥梁行动与 FPH）。

2000 年，青基金会与联合国联手在北京举办了“第三部门与国家”国际会议。波莱特和皮埃尔·卡蓝默受邀与会，分别以民间社会的作用和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建立与运作为题，做了演讲。波莱特还就如何在一个监控程度较高的国家经营非政府组织问题发了言，130 多个青基金会省级分支机构代表认真听取了演讲。

-民间社会

中国大学校长联合会

中国大学校长联合会在中国知识界享有盛誉。联合会致力于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途径。金丝燕于 1997 年受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强文义教授之邀在该校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与 FPH 方法的讨论。未来三年中，大学改革将成为“跨文化对话”杂志的三大主题之一（其它两大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与伦理）。

-中国 APM (SECM)

1996 和 1997 两年间，APM 项目的中方合作伙伴产生了要将此项目引入中国的想法，当其时，该网络已在世界其它地区成功实施。FPH 给了中方伙伴广阔的选择空间，以便该项目能最大限度适应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并有效运作。中方建立起了以陈越光和谢杨为负责人，涵盖五个国家级机构的 SECM 网络，这五大机构是：

-中国文化研究院

- 社科院农业科技发展中心
-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农村杂志社和 700 名乡村干部
- 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

该网络也包括农业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其它一些机构。主要负责人陈越光是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学者兼社会活动家。陈先生为我们引荐了各界精英，他们受邀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中方要人。1996 年到 1999 年，中国 APM 分支、APM 全球网络和基金会共同组织了多项活动。通过这段时间的磨合，各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并且坚定了通力协作的信心。在此期间，众多中国 APM 网络成员受 APM 之邀参加了国际会议，其中包括在非洲、拉美、法国和西班牙举行的座谈会。许多农民企业家也积极加盟，其中有人对辩论不甚感兴趣，他们更关心企业精神和利润而不是发展、社会和环境问题。最终，我们同中方友人逐步实现了相互理解。会议期间中方与会人员积极参与，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不论是在巴西卡斯卡韦尔世界 APM 大会，古巴的 FMSA 大会还是 2002 年雅温得会议上，中国 APM 成员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媒体

网站

2005 年北京治理论坛之后我们建立了“治理网站”，以便在第一时间发布会议发言和翻译稿件。此后，该网站成为思考、询问和讨论中国治理问题的平台。通过链接，它得以与 IRG 资料网站相辅相成，其中某些文件还被翻译成对方国语言。“治理网站”还承担了搜集治理经验的任务，并始终关注具体案例的研究（负责人：陈越光，陈立川）。

杂志

《中国科技》是 2004 年 6 月在中国科技部领导下创立的月刊。该刊的创刊主旨是帮助公众了解当代科技的发展状况，开辟一方跨学科交流空间并鼓励青年人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研究。2005 年 6 月治理论坛的组织者陈越光担任该刊主编，组委会主要成员包括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杰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和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校长。其读者群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科技专业大学生、企业领导、记者和科普方面的评论家。该刊 2005 年 7 月专号谈论治理问题，该期杂志已分发给科学院和工程院全体院士。

跨文化对话

米歇尔·索凯和嘉特琳·盖尔尼耶承担起了中欧间沟通的重担，包括编辑《跨文化对话》杂志的法文版（瑟伊出版社已出版两期，第三期正在筹备中）。该杂志尤为中国新兴精英阶层所关注。同杂志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并在杂志中占有专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近十年来活跃在中国知识界的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员。他们中有历史学家庞朴，文学评论家刘小枫，人类学家叶舒宪，哲学家赵汀阳和何怀宏。

不仅如此，不少来自欧洲、美国和新西兰的海外华人也加盟了《跨文化对话》，

每期杂志都为他们留有专栏。海外学者的研究和思考深受国内同胞的赏识。

应欧洲、北美和大洋洲 9 个国家 24 所大学的要求，嘉特琳·盖尔尼耶和艾蒂安·加亚尔德向他们寄发了近几期的《跨文化对话》杂志。

-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6 年到 2004 年 8 年间，该社副社长郝铭鉴和编辑李国强，不仅我们的出版项目提供了大力支持（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而且还出版了两卷本的《跨文化对话》精选集（从第一到第十六期）

江苏出版社

该社在中国南方颇具影响力，2005 年以来《跨文化对话》杂志由该社负责出版。

(金丝燕)

跨文化与 FPH 殊途同归

早在 1991 年，FPH 就和跨文化有了接触，阿兰·李比雄就是经跨文化的高仑波（J. M. Collombon）介绍才加盟 FPH 的。

“互动人类学”的各项活动使文明间的目光相汇，这也正符合 FPH，尤其是其 DIV 项目的前景。阿兰·李比雄因此成了 FPH 的合作伙伴。另外，FPH 也对一项欧盟出资的研究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这项研究由一名中国研究员负责，致力于分析欧洲各分子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的文化行为。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第一部分

相互认识与相互理解

“它山之石”

基金会要应对当前的挑战，就应该在多样的见解中汲取营养，并学会跟“他人”（其他的文化和文明、其他的社会群体、其他行业的人）一起共事，在各个层面呈现多样性。

[...]

DIV（文化间项目）计划定位在基金会整体构想（确定 21 世纪重大挑战之后）框架之内。

面对该怎么给这个项目命名的问题⁴，已有的经验使我们学会了“平心静气”。（这是在跨文化工作中取得的一大美德！）

定位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项目还是一个政策？最初的会议之后，后续活动能不能展开？），坚持多样性从而拓展项目的实践使我们最终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并使我们对跨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试点项目

90 年代初，创立一个旨在分享交流经验的国际网络的想法初现端倪，并成为一种超前理念。这种网络此后称被为“沉默之声”，在其付诸实施后，成为 DIV 项目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交流，观察家们更热衷于探讨声音和言语的多样性。他们从方法的多样性谈到如何将这些方法结构化。撇开主流的媒体和社会群体不谈，社会边缘群体如何发出声音，这些声音又要怎样才会有听众？要想让单方面的声音发展为双方的对话，就必须意识到发表意见的正当性，必须承认自身文化的价值，并找到理想的表达方式。观察家们的工作就是要看群众的文化和知识能在多大程

⁴ 参见 AG 2003 年文件：《DIV 计划疑问总汇》。

度上参与交流。

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现实，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要问：1、怎样认清我们的差异？2、怎样寻找共同的价值观？3、怎样共同行动？有了一些具体经验和进行了一些主题性尝试之后，DIV 倾向于探索对话发生的条件，并反思跨文化合作的空间。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FPH 和跨文化组织：神州初探

FPH 能与中国结缘，这要感谢跨文化；幸亏有它，FPH 才跟中国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正是这次接触，为 FPH 同中国各方人士开展直接合作提供了可能。

阿兰·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 在中国这片平静水面上投下石子，激起了串串涟漪，FPH 的视野随之如波纹般荡漾开来；随着合作的展开，我们的接触面逐步扩大，开始创立联盟（燕京小组）并实施了 APM 计划（现在中国 APM 网络的组织者、在政府官居要职的陈越光，当时就同阿兰·李比雄取得了联系）

DIV 能在中国出版业找到主要合作伙伴，也都是拜跨文化的联系之功；乐黛云教授是 DIV 计划的开创者之一，她同阿兰·李比雄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与 FPH 的合作，跨文化本身也通过“无墙大学”理念在中国叱咤风云，以独立的身份同中国开展合作和跨文化对话。

我估计跨文化所开创的“交互人类学”进程依旧会扣人心弦，而阿兰·李比雄的工作也会一如既往地牵动人心，他一直在系统地反思面对他者时的思考模式和行动方式，反思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工作方法，反思跨文化项目运作中的效率概念。

跨文化功不可没，因为它使 FPH 的工作和运作方式被中国人理解并接受，它一直试图消除由两大文明间的差异而可能引起的误解。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I. 1991：相遇广州；1993年：蛇口会议（居斯塔沃·马林）

1991年3月，欧洲跨文化学院同中山大学首次在中国联合举办了题为“相识战略”的国际研讨会，31名研究人员与会，其中包括4名法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西班牙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日本人。1993年6月，作为会议成果的文集《狮在中国——文化相互了解战略问题》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宾和阿兰·李比雄担任主编。

FPH委托跨文化举办了1993年6月中国地区蛇口会议，这次会议为同年9月召开的“地球全会”作了部分准备。蛇口会议代表着燕京小组与联盟合作的开端！

燕京小组集合了不同专业的大学教员，负责会议的组织、研究活动的开展和文章的出版。

集团秘书长由葛海滨教授担任。其他成员包括国情研究生态学家王毅教授，北大哲学院教授王炜，以及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历史学家王焱。燕京小组的协调人是陈嘉映。

1993年中欧学者恩贝托·埃柯（Umberto Eco），安托尼·丹钦（Antoine Danchin），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阿兰·雷（Alain Rey）等，齐集《欧洲与中国-在探索普遍性中的误读》巡回研讨会，相应的文章出版也在筹备当中。

让我们看看没有围墙的大学吧！

丝绸之路巡游是“无墙大学”项目的战略计划之一，是中欧交互人类学采取的一种特别方式，作用之一是将我们在该领域的努力经验化。

“无墙大学”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共体和中国文化研究院（哲学家汤一介教授任院长）等机构的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国际大学及企业网。

在方法上，该网络主张以经济交流为动力，逐步建立起企业领导和大学校长间的国际交互联系网络，以增进中欧关系。在欧洲跨文化学院科技指导理事会的领导下，这一网络将对中欧交流的长远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回顾：地球国家预备性协约筹备工作

1992 和 1993 两年，巴黎的 FPH 精心组织了几次洲际和地区级会议，为“地球国家预备性协约”做准备。当时，一个法语智囊团“维孜莱小组”（le Groupe de Vézelay）正在致力于研究臭氧层破坏、核工业危险、生物技术研究及工业危险等技术风险，对该团队的调查研究，FPH 予以了资助。90 年代初，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同 FPH 取得联系，这使 FPH 意识到，有关生态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在法语国家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当时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拓展学术视野以便听取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人们的思考、经验和建议。1992 年始，FPH 和维孜莱集团在智利圣地亚哥、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加拿大蒙特利尔、埃及开罗、希腊雅典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众多地缘文化会议。预备会议定于 1993 年 9 月在法国召开，随着会期的临近，在中国召开一次筹备会，显得尤为不可避免。法国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审议名为“构建一个负责、团结的世界平台”文件。21 世纪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必须集合全球之力去面对，而该文件是启动这个全球总动员的基础。

这项伟大的事业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

1993 年 2 月，我们有幸在巴黎见到了青年哲学家陈嘉映，他在美德两国做过研究，当时正准备回国。我们请他帮助我们在中国召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区的中国人，举办会议来思考怎样面对当前的挑战，讨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能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建议。就这样，陈嘉映组织了一个筹委会，同在蛇口的中国商业集团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进而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区的 40 多名与会者来参加 1993 年蛇口会议。

FPH 和维孜莱方面出席蛇口会议的人员有：皮埃尔·卡蓝默（法国）、拉比·布格拉（Larbi Bouguerra，突尼斯）、韦南·古奚（Venant Cauchy，加拿大）和居斯塔沃·马林（Gustavo Marin，智利，在巴黎 FPH 工作，一年前组织了智利圣地亚哥会议），以及跨文化（法国）的阿兰·李比雄和台湾耕莘文学院的马天赐神父。

这次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下：

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中国的文化传统能为当前问题的解决做出怎样的贡献？

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

（居斯塔沃·马林：合作之始——相遇中国南方蛇口，
DPH 文件 n° 274，1993 年 6 月）

企业家交流

1993-1998：1994 年起，FPH 决定对“欧共体与中国：新经济前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该项目由欧共体出资，FPH 的资金主要用于组织会议。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帮助对中国感兴趣的欧洲企业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特点乃至不足，另一方面着眼于研究中欧企业家会议的组织情

况以及会议的“人类学”后续状况。两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项目理事会首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日至3日在澳门举行。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项目的主要方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启动项目。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马丁·布拉达 (Martin Prada)，加里·纳盖伊 (Gary Ngaye) 和特丽·萨娜 (Teresa Sena，澳门文化学院)，俞昌民 (中商团)，乔治·库丹 (G. Rudin)、班杰耶 (J.M. Piquier)、瑞·罗柏斯 (Rui Lopes，欧洲企业家)，雅克-布莱·马蒂斯 (Jacques Poulet Mathis, FPH)，阿兰·李比雄 (跨文化) 以及麦岗 (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

项目偏向于采取实用而非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目标有两个：

- 1) 组织一批中国企业家来欧访问，以便直接交流并分析交流中的误解和困难；
- 2) 实施10个研究计划 (麦岗为中方协调人)。

1994年12月8日至17日：该项目的首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德国和比利时。

1994年6月6日至10日：跨文化在“无墙大学”框架内组织了题为“神权代表的悖论”研讨会。FPH列席会议。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II. 1994 : 丝绸之路新旅: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

1991年,“相识战略”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成功举办,该研讨会激起了中欧专家对跨文化对话的极大兴趣。1992年5月,中山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胡守为教授和跨文化学院院长阿兰·李比雄教授共同商定并签署了联合考察丝绸之路文化计划。1992年8月10日,考察团从广州出发,经西安、敦煌、吐鲁番、伊宁并于8月29日抵达北京。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组织了《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研讨会,考察团团员在会上总结了此次实地考察,讨论了在“无墙大学”项目框架内进行长期合作的问题。会后,由于得到了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支持,我们举办了“后工业时代的欧洲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座谈会。随后,文集《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独角兽与龙

文集《独角兽与龙》汇集了参加“无墙大学”项目的来华学者论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部分为中文，其余部分为法文和英文。

探寻中西文化普遍性过程中产生的误读是文集《独角兽与龙》的中心议题之一。我们所说的误解，意指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双方都很难逃脱自身文化传统和己方思维方式的束缚，只能以自己熟悉的角度和方式看待对方。有一则中国寓言很有启发意义：一只青蛙试图向它的朋友鱼描述陆地上的生活，而那条鱼却把鸟理解成它的同类，即天上飞着的鱼，至于地上的大车，在它眼里，其实就是长着四支圆形腹鳍的大鱼。它只能以自己的视角来理解周遭的世界。同理，当一个人试图理解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他先是进行选择 and 归类，然后依据他已有的、惯常的思维方式对所选择的现象作出解释。因此，误解在所难免。

(乐戴云：跨文化对话，《独角兽与龙》)

正如瓦莱里预言的那样，“我们这些异类文明终于意识到我们可能带来血光之灾”。9·11事件再一次（及时地？）提醒了我们。依据人类现有的知识和科学，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寄居于一块既定的土地之上，这块土地有自己的认知模式，自己的文字游戏，传承着西方文化传统，但也充斥着我们对世界其余地方及其他文化的无知。

这种无知有三个不同类型。第一种无知是我们把未知或陌生的东西当作探索对象，当作有待发现的新土地，当作探险家、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探索的乐园……以上种种都表明探索者们并不了解的异类人群（如果还有的话）和他们的土地，他们一方面想要去了解，但是另一方面却在依据自己的标准和分类方法去认识他们。第二种无知是由先前的探索的谬误引起的。而第三种无知更彻底，由于他们与我们如此不同，我们甚至排除了他们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能做的是：要么纠正我们从前对某些东西的误认或误解；要么干脆承认我们的谬误，依旧按照我们所知的标准探索所谓的未知土地；要么勇敢地去发现前所未闻的别样世界，哪怕它没法规入我们所知的任何体系。我们所倡导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态度，因为这才是科学的探索之道，继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仍然希冀着“人类一体”和对人类学知识的一视同仁。彻底的异质、未知与绝对的新奇符合我们的主张，古圣贤所说的“日日新”于吾辈心有戚戚焉。我们也因此可以驳斥瓦莱里的一个设想：“终极世界的时代开始了”。事实恰好相反，终极世界的时代不是开始了，而是结束了。

（阿兰·李比雄：欧-亚-非，相互了解的大三角，
《独角兽与龙》）

我们关注文明间的碰撞乃至交锋。西方世界显示出了对其他文明的好奇心，尽管只是为了经济扩张的缘故。不过好奇往往会被蔑视吞噬：希腊人所称的野蛮

人本意其实指支支吾吾讲话不清楚的人，其实就是那些不懂希腊语而因此被看作是不会说话的人。但很快就有开明的希腊人，比如斯多葛派（也许因为其中有人有腓尼基血统）便指出虽然所谓野蛮人使用不同于希腊人的词汇，但却能表达相同的思想。马可波罗满怀崇敬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礼仪与习俗；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大师命人翻译了阿拉伯哲学家、医学家和占星家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试图找回几乎已无迹可寻的古东方迦勒底人和埃及人的智慧；孟德斯鸠曾尝试理解波斯人对法国人的看法；许多现代人类学家将撒勒爵会教士们的报道作为自己研究的开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起了几个世纪以前，其他一些传教士由于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文明，而最终支持将他们赶尽杀绝。撒勒爵会教士在亚马逊的博鲁鲁人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尽可能地劝他们皈依基督教，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理解这个部落思考与生活方式。

[...]

判断的标准就是另一回事了。它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习惯、爱好和价值体系。举个例子：把寿命从 40 岁延长到 80 岁，这种延长是否构成一种价值？我个人认为是，尽管很多宗教狂热者会对我说，和一个 80 岁的老混蛋相比，圣路易·德·贡扎格 23 年的生命历程更有意义。但如果我们承认延长寿命是种价值，那么西方医学和科学就优于其它许多医学知识和实践。

（恩贝托·埃柯：圣战、激情与理性，《独角兽与龙》）

有人讨论文明间是否有必要竖起高墙，这让我想起《庄子·山木》中的一个故事。

故事大意如下：从前有棵大树，其形状奇特，无法制成任何器物，因此，伐木工没有砍伐它，大树存活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生长正常，就能作为可用于建筑的木材，而它也会因此一命休矣。还有一只鹅，被主人杀了用来款待庄子及其弟子，原因是它不会鸣叫。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它就不会被杀，可以继续苟全性命。于是，弟子问庄子：“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回答说他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以便自存。这个故事说明事物没有绝对的价值而只有相对的价值。我想借此来探讨文明间高墙的问题，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观之，有墙与无墙看似矛盾，但其实更多的是互补关系。也许我们在有墙无墙的辩论中无法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因为正反双方都能提出有利于己方的论据。照此看来，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认为，文明间也处于有墙与无墙之间。在中国哲学中，我们不习惯说文明间要不要互树高墙，我们认为处于两个概念之间的中庸立场才最为理想。如果我们以整体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同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经常持这种介于有和无之间的中庸态度。

（汤一介：文明间是否要筑起高墙？《独角兽与龙》）

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的科学态度为人类所共有。意识到需要科学态度并不难，难就难在认识到科学包含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永无止境地生产出科学的核心概念。这种衍生批评法诞生于西方。然而，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担心的那样，这种方法在西方远没有被普遍使用，亦没有被大量使用。几大文明相互敌对但又谁也没法吞掉谁，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叠压才产生了西方。我认为有两大传统，一是印欧传统，即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所描述的主权-宗教、战争、生产三大机能传统，二是希腊-埃及-非洲传统，该传统起源不详但却孕育了科学精神。第一种传统让我们看到三种普遍存在于印欧民族中的标志性人物：教士、农夫和士兵。权力在创造（或者接收）知识的人、通过技术来使用知识的人（这里体现出科学和技术的主要联系），和最终用武力传播知识的人之间分配。这种源于暴力的权力，这种武力压服无法创造深邃的思想。而希腊传统孕育的科学精神与上述三大机能没有关系，它创造了能产生科学并让科学进步的方法。西方正是这两大传统交锋的产物。大体上，我们可以说科学生产是抽象、无私、宽容、富有创造力的，而技术是商业、军事、不宽容和毁灭性的，同时也是实用主义、高效并利用科学的。与此同时，科学又需要倚重技术而进步，它的方法建立在建设性的怀疑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怀疑一切，单纯的怀疑不足以把人带入科学的圣殿）。什么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所有理论的和谐。这种和谐势必带来理性的进步。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好或坏后果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安托瓦纳·唐善：中西方对话的潜在能力问题，
《独角兽与龙》）

人类存在于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对事物的认知也就不能不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因此任何对“他者”或是对文化经典的诠释都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事实上，“先验的理解”或者是偏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因素，这些因素也成为新诠释的前提。但当一个人带着这种“先验的理解”与他者相遇时，他所能做的第一件事恐怕是在假设自己和他者间存在共同点的前提下“粗糙地”解读他者。这种解读的具体方法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和他者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与这种解读的程度成正比。这一过程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解读，解读的产物便是佛教禅宗或称汉地佛教，这种佛教新派别对中国原有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首次实质性的对话发生在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士大夫成了这次对话的主角。这次对话意义重大。利马窦的巨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或称《利马窦中国札记》，“在文学、科学和宗教哲学领域产生的影响远大于17世纪的任何其它著作……它让欧洲初识孔子……它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户并展现了一个未知民族的风采……”。在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看来，我们怎样高估这次对话对中国人的益处都不算过分。如果要细究产生这些积极成果的原因，我们应该首先将之归功于利马窦等传教士所奉行的亲儒策略。

(孙尚扬：中西方交流中的误解及其创造性，
《独角兽与龙》)

III. 1995：世界社会峰会北京会议与亚洲会议宣言

首次世界公民大会在召开前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986年，8名法语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家召集会议，希望通过集体智慧来反思当今世界面临的主

要技术风险，并试图找到对策。这就是维孜莱小组的源起。马耶基金会对他们给与了资金和其它方面的支持。当时的研究主题有4个：高大气层演变、民用核能风险、生物技术以及技术控制问题。第二年，该工作组的首篇文章《维孜莱倡议书》问世。文章提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行动，来应对由严重失衡引起的新风险。这些行动不仅事关技术和经济领域，还涉及价值、法律、政治、教育和其它领域。对此，传统的调节机制已经失去了驾驭能力。

自那以后，维孜莱小组付出了很多努力，同各地人士取得联系并开展对话，在此基础上相继举办了7次大洲级会议，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国的经济特区之一蛇口。蛇口会议得到了北京燕京小组和袁庚集团的大力协助。继这些活动之后，1993年他们又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城堡里召开了60人与会的综合会议，会议讨论了各个地区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迫切任务并设想出了可能的应对措施。“负责任的团结联盟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诞生。

（居斯塔沃·马林）

燕京小组由陈嘉映，王毅，王焱，王炜等人发起并创立。北京会议由燕京小组组织，由其他参加过1993年6月蛇口会议的合作者共同主持。燕京小组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创新性的看法。

1995年2月北京会议的一大亮点在于：中国与会者激起了邻国同仁的兴趣，他们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北京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来自菲律宾、日本、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

会后起草的宣言发表在中方报纸上，并附有与会者名单。同年3月，北京会议的中国主持者参加了四大洲会议总结大会，在哥本哈根发表了题为“反对社会种族隔离的世界联盟”新宣言。

(居斯塔沃·马林，1995年2月世界社会峰会北京会议，DPH文件 n° 275)

合作的开端（1993-1994）

1993年2月，当时正在法国工作的陈嘉映与基金会的卡蓝默、马林等人相识。当时，基金会正在讨论一部纲领，名为建设“协力、负责、多元世界”纲领，希望在中国召开一次地球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即“全球三级会议”第七次大陆级筹备会议。陈嘉映答应回国后帮助安排此次会议。五月，陈嘉映回国，随即着手准备两件大事：一是安排会议场所，二是联系中方与会者。

举办会议的场所经过多方考虑，最后定在蛇口。通过于硕介绍，陈嘉映与当时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余昌民等人取得了联系，并赢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蛇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很适合举办这个国际会议。

陈嘉映邀请了王焱、邝阳等老朋友，通过他们了解了国内一些相关人士的情况，邀请了王毅、秦晖、朱正琳等一批杰出学者与议。由此，“国际环境与经济问题”的研讨会于1993年6月24日至29日得以在中国蛇口举办。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中国的经验能够为世界提供怎样的建设性意见？具体措施有哪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欧洲、北美和非洲的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企业家、环保专家、艺术家、记者、官员等共25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包括来自台湾的陈锦生和来自香港的吴庭亮）。与会者对中国及世界在环境与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陈嘉映：燕京小组与基金会合作的回顾）

“澳门，我们又来了！”

1996年1月15至20日：中欧企业领导会议在广州，澳门两地举行，会议由跨文化学院（阿兰·李比雄、金丝燕和李桦）牵头并得到了FPH和众多中欧组织的支持，欧盟也为此次会议提供了资金支持。

会议的两大目标是：

- 1) 为企业领导、社会活动家与学者提供一次相聚的机会；
- 2) 创建中欧企业家俱乐部。

米歇尔·苏盖与乐黛云相识……

1995年5月：在一次访问中国的途中，米歇尔·苏盖结识了乐黛云。

乐黛云教授专攻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其夫汤一介教授是中国的大学者，夫妇二人都曾不幸身陷囹圄。

米歇尔·苏盖与乐黛云相见恨晚，此次会面，他们商定了若干出版计划，这些计划后来由DIV负责落实（其中包括相识与误解集，若干主题讨论小册子，杂志以及撰写有关中国的«多音树»计划等）。同年7月两人再度相逢巴黎，乐教授提出的建议和计划再次激起米歇尔·苏盖的强烈兴趣。

IV. 1996 : 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存: 南京会议

“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多样性与共存”研讨会于 1996 年 4 月 22 至 24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江苏比较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学、跨文化基金会和文类进步基金会联合举办，由乐黛云教授与钱林森教授负责组织。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顽石易朽，文墨永存

- ①中欧联合杂志《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由乐黛云教授创办，她对杂志的成长给与了特别关注，希望以此为平台来展现跨文化对话和互识互解如何在科学、经济、工商等领域起到积极作用。FPH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阿兰·李比雄更是承担了为该刊寻找法国出版商的任务。
- ②《研究》杂志的翻译与改写。安托尼·丹钦为杂志创办者之一，他主张打造《研究》中文版。
- ③生命大事中法丛书：乐教授提议编写一套丛书，姑且叫这个名字，由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Desclée de Brouwer）负责出版，南京会面后仅两周金丝燕就同该社签署了丛书出版合同！丛书的初衷很简单：死亡、自然、美等概念对中法两大文明都很重要，一位中国作家和一位法国作家将共同撰文，讲述这些概念对自身和己方文明的意义。随后，他们的文章将被译为对方文字，合编为一部作品，如此以来，中法智慧将相映成趣，成为真正的跨文化对话结晶。对此计划，FPH解囊相助，资助北大出版社，承担了丛书在中国的翻译费用。
- ④农界丛书：丛书由陈越光提议创办，陈先生后来成为 APM 项目的合作者。
- ⑤《独角兽与龙》文集：文集的出版拖延了很多年，尽管得到了 FPH 的资金支持，但由于相关文章的散佚，后来无果而终。
- ⑥敏感词词典：由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汤一介教授和王宾教授提议并主持的“关键词”计划既激动人心，也备受质疑。该计划的初衷是搜集中国和欧洲政治哲学关键词，尤其是个人主义、民主社会、文化、时间、权利等重要概念。《关键词》与 DDB 出的几本小册子有些联系，但行文更多科学而非文学色彩，虽然如此，这两个计划本是一体，都是中欧“面向未来的跨文化词汇表”计划的“一员”。FPH 表示愿意在欧洲寻找第三家出版社，以便同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形成三马驾车态势。
- ⑦《多音树》和《花粉》丛书：乐教授对《多音树》丛书情有独钟，希望

能够编写出中国三部曲。苏童也曾向苏珊娜·布吉耶（Suzanne Bukiet）承诺将从他的短篇小说中挑选出来一些进行翻译，以供编写《花粉》丛书之用。但同其它丛书一样，这部书也途遇不顺，无果而终。

①中欧交叉文化视点：译林出版社同数位与会的大学教授都希望能编写两部书：《中国作家的欧洲梦》和《欧洲作家的中国梦》，以展示中国文学如何想象欧洲，欧洲文学对遥远的中国又有哪些想象。

②中法诗篇：贝尔纳·尚白孜（Bernard Chambaz）提议编写一本集子收录中法诗人有关颜色、云彩等主题的作品。FPH未参与其中。

（贝尼迪特·莫特：文化间项目经验汇集）

跨文化对话掀起高潮

现如今，“跨文化对话”计划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十年来，中欧学者和思想家共同出席了多次会议。双方学者都拒绝“相互同化”和“合而为一”式的全球化理论，因为他们都视此理论为变相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接受并维护与己相异的文化，每一个文化体系才能博采众长，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才能在这种相互参照中成长蓬勃。而现在，正是西方文明寻找这种参照的时机，唯有与异类共舞，方可重新自我审视，才能走出自我，摆脱墙，再造辉煌。此外摆脱了殖民主义阴霾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亟需使其传统文化重焕生机，并以此与西方展开平等对话。因此，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也就自然而然成为顺应当今各文明发展的历史任务。

为了使对话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我们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不但能够让各方的特色和创新都得到表达，而且能够冲破旧有体系的桎梏，建立重新审视各自文化的基础并使其浴火重生。寻找这样一个载体无疑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无论各个文化体系有多复杂，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差异，我们终究会有一些共同点，最起码我们还共同拥有着被称作“人类”的客观概念。我们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关心同样的话题，比如和平与发展、生态、乌托邦、西方极乐以及世界末日等等。不同生活和思维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穿越了历史时空，现代人会以现代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只有在不同文明间开展经常性的交流，我们才能给出更好的答案，这些问题的深远意义才能得以发掘，我们才能进行真正的、互相理解的文明间对话。

(乐戴云：跨文化对话)

1997：相聚维拉尔索 - 出版计划付诸实施

南京会议一年后，当年的与会者再次齐聚维拉梭，召开了一次富有成果的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标是推动并落实曾在中国酝酿的出版计划，试图寻找新的出版商和合作伙伴。会议开得很务实，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同中国合作出版的主要的几部丛书（远近、跨文化对话和关键词）都取得了进展。会议还确定了编委会成员。

V. 远近丛书

智慧、美丽、激情、夜晚、旅行、死亡、自然……我们可以用这些字眼编出冗长的八股文，也可以吟咏出令人浮想联翩的诗句，它们是我们这部丛书的关键词，类似的丛书在法国少有出版。“远近”丛书由马耶基金会主办，由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编辑蒂耶尔·甘科东（Thierry Quinqueton）发起，一次对中国的访问激发了他编辑这部丛书的灵感。时至今日，《远近丛书》已有八年之寿。1999年秋，它在巴黎诞生，几个月后这位文婴得到北京大学的呵护，借由图书出版来开展跨文化对话的理念从此有了实质性成果：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将就同一主题撰文，由此，两种思想得以彼此衬托、交相辉映。《远近丛书》得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积极支持，由于它的存在，跨大洲的思考不再是天方夜谭。丛书不仅仅满足于“文明冲击”，不等同于传统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摒弃偏见，开创交流和创作的新天地。

（马克·乐布歇：远近丛书-重启的对话）

计划的落实

如何更好地理解《远近丛书》计划呢？面对无法逾越的遥远距离，怎样才能把对话落到实处呢？

《远近丛书》由乐黛云和金丝燕主编，嘉特琳·盖尔尼耶协编。丛书结构新颖，作家可以在按要求写作的同时不失去自己的风格和特性。丛书有着怎样的定位？只需读读下面的介绍便一目了然：“两位作家：一位中国作家和一位法国作家，围绕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抒己见。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将从各自的人生阅历和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从哲学家、作家和诗人那里获得灵感。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我们经由别文化迂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己方文化，同时，这也推动了中法跨文化交流，当然，理解与误解同样不可避免。”

丛书的中法两册几乎同步出版，法文版交由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负责，中文版委托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将《远近丛书》束之高阁，安放在专家们的书架上，而是向所有对外部世界有好奇心、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广大读者开放。如今中西间人员往来频繁，很多人都希望通过这部书来了解异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停留在游览名胜古迹或是翻阅旅游手册这样浅显的接触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它能面向更多的读者，与此同时，质量问题不能忽视，正如中国朋友所说，要“精益求精”。我们必须激发起读者的兴趣，让他们有进一步了解其他文化的愿望，比如吟诵中国诗歌或是研习西方音乐……

(马克·乐布歇:远近丛书与重启的对话)

意料之外的华章

出版丛书的风险依旧存在，我们必须保持勇气和决心，在最初短暂的激情散去之后继续激发公众和新闻界的兴趣，即使此时这个计划本身已不是什么新闻。正因为如此，程抱一专为“对话”所起的名字在几年之后才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好评。

出版商没有抱怨种种难处来博得同情。因为“远近”丛书固然厚重，但同时也是快乐的源泉，是真正的精神享受。

正因为作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凭借自己的阅历来谈论某个主题，所以丛书给予我们的快乐首先是一种发现的快乐。艾克沙维·李比雄在“死亡”这一主题中满怀羞腆地描述了他的父亲，而金丝燕则通过中国神话和一位可爱老奶奶的脸庞同世人谈论梦境。同样，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借蒙泰威尔迪的歌剧俄耳甫斯赞叹“美”之朦胧，而龚刚则以茶之高洁品“味”。每次这样的美文都带出版商独一无二的享受。

初读原文便觉甘之如饴，接下来的编辑工作同样兴味无穷，我们的编辑不仅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还得适当地将原文改头换面，以便于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好地理解文意。如此以来，我们不仅需要避免不必要的精确陈词，还得适当改写那些晦涩的典故，以便使文章通俗易懂。当然我们也可以要求作者把意思说得明了些，不要过分隐晦，不要使用太过西方化或太过法国化的语汇。每当此时，出版商就得仔细拿捏，多为将来的读者着想。

(马克·乐布歇:远近丛书与重启的对话)

干燥的季节里，整个北京城都被沙尘蒙上了灰色。小树光秃秃的，紫禁城依旧辉煌，湖泊已经封冻，冰上的人们坐着自制的雪橇嬉笑滑行，宽阔的大街上自行车缓慢地并排行驶，低矮的平房组成了迷魂阵，所有这一切都是灰的。餐厅的内壁刷着漂亮的油漆，或红或金或是塑料涂层，似乎有意跟外面的灰尘叫板。二月的北京，越发空旷辽远也越发天寒地冻，大家似乎都过着日子，而且还过得不错，相对不错。共产主义依旧。毛泽东的画像还在，还挂在办公室和酒吧的墙上，但它的意义只相当于拉美或是美国的耶稣受难像：人们已不再信仰，但只是不把它撤下来，仅此而已。美国总统依旧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中华共和国也依旧是人民的，如果说这样不好，但也不坏，重要的是它行得通，因为行得通，所以行得通！

第三次中法编辑大会时的北京便是如此。

这是继1996年南京和1997年维拉梭会议之后，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会晤。会议开得很有实效，没有发展成我们起先所担心的纯礼节性会晤。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头4部中文版“远近丛书”剪彩。这几部书的法文版于1997年9月由法国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出版，其装帧颇受法国读者好评。此次中文版开本与法文版类似，但色彩更加丰富，而且增加了插图。两个版本都显得端庄稳重。

(米歇尔·苏盖、嘉特琳 盖尔尼耶：2002年2月15-20日，龙年之始：《北京之冬》，第三次法中未来

文化间丛书编辑会议报告)

“揭幕”仪式如期举行，不失隆重。60多名大学教授、记者和出版商于2月16日齐聚北大接待厅，厅内悬挂大幅标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大副校长及前校长、法国驻华大使及众多中国知识界精英济济一堂。与会官员的发言显示出他们充分了解丛书的内容和意义，我们对此大为惊讶，同时也感觉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大使先生的发言热情洋溢，他希望我们在文章和翻译质量上再下点功夫……）。

BIF的重要人士几近到齐。中方有：乐黛云教授（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与汤一介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上海文化出版社⁵的郝铭鉴和李国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化教授，1997年会议的组织者钱林森教授。广州大学哲学教授、关键词项目的核心人物王宾。APM项目的中国合作者陈越光两度出席了为期一周的揭幕活动。法国方面：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瓦·阿斯提耶（Françoise Astier），她借此机会非常完整地介绍了基金会的状况。金丝燕，丛书主编，我们不可或缺、不知疲倦的协调人。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文学主管马克·乐布歇（Marc Leboucher）。基金会BIF项目光临的人士有嘉特琳·盖尔尼耶和密歇尔·苏盖。出席揭幕式的还有马纽·阿斯提耶（Manuel Astier）（以个人身份出席，发表了极富建设性的讲话），以及奥勒加·郝戴尔（Olga Rodel）（前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电讯主编，在丛书中翻译了金丝燕有关梦的文章）。

（米歇尔·苏盖，嘉特琳·盖尔尼耶：2002年2月15-20日，龙年之始：《北京之冬》，第三次法中未来文化间丛书编辑会晤报告）

⁵上海文化出版社：1952年创建。出版社下设四家企业、三家印刷厂，拥有470名员工。每年新出版图书400种，重版图书600种。出版社印刷量大，出版种类繁多，包括知识类、小说、时尚杂志、日常生活(其中毛衣编织类，印册达一亿五千万)。年营销额达30亿（4亿美元）。出版社与日本、美国、瑞典、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法国等国的同业界均有合作。《远近丛书》每次印刷量为5500册，卖价为9到12元。

从文学中走出的北国之冬

我们星期天晚上抵达马赛，那是一个月圆之夜。想到离开北京时我们告别的就是这轮圆月，心里充满了天涯共此时的感慨……

8 170 公里，11 000 米的高空，零下 56 度，10 个半小时抵达巴黎……我们飞过蒙古，薄薄的冰雪覆盖在蒙古戈壁，依稀可见田野的轮廓。飞临首都乌兰巴托时，我们看见棋盘般纵横的街道。之后西伯利亚的数条大河映入眼帘，蜿蜒曲折，宛如花体的阿拉伯文字。

该说说这次行程了，如果说它在工作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了成果的话，那要归功于金丝燕，归功于她的活力、耐心和她始终如一的亲切，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能力。要知道随时都能帮得上忙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找的（这一点我有体会，在南非她就为 APM 项目充当过翻译，可谓雪中送炭！）。

其实应该说我们这个不大的团队里，所有队员都有着清一色的热忱。大家都希望看到这次文化与出版盛会顺利进行。这方面的情况我还是留给米歇尔、卡特琳娜和马克去介绍吧。

本以为中国人很少见到西方人，所以他们会盯着我们看。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还是有人仔细打量我们。在名胜古迹徘徊，胸前挂着相机的中国游客，有时会齐刷刷地向我们探头，眼睛睁得大大的。

北京冬天的冷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觉得好冷（也就是说我们被冻僵了），老天哪，零下 13 度啊！

中国人不像我们那样全副武装。不过还是有些年轻女士带上了口罩（外科医生的那种）来保护她们娇嫩的皮肤。

似乎女人们对美容和身材非常上心：我们一打开电视就有一堆化妆品和减肥品广告扑面而来。

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否用过化妆品，我们确实不太能看到她们脸上的皱纹，即便是耄耋老人也是如此，她们显得还很年轻；而那些更年轻些的（50 岁）看上去几乎就是年轻人。我们也不太能看到白头发，这确实是个待解之谜：满目黑发是天然的吗？

北京的沙尘也是名不虚传，我们躬逢其盛，北风一起，跟着来的便是戈壁沙土。到处都覆盖着灰尘，自行车和货架上的书也无法幸免。当我们抬头看太阳时，太阳总是白花花的，跟塞内加尔刮沙尘时的太阳一样白。

北京的传统民居房是砖砌的……因此也呈灰色，房顶盖着漂亮的灰瓦。即使使用别的材料，人们也把它抹成灰色，但一切都被红红的胡同大门和民居的木雕衬托得别有风味。当然，因为到处都有树木，到了较为温和的季节一定还有绿

树掩映。

而从前的王府，比如我们的旅馆，色彩就更为丰富，红色自然少不了，除此之外还有兰色、绿色、金色，或许还有高高翘起用以避邪的鸱吻（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恐怕需要核实一下……）。

文化方面，我们所接触的中國人都显得十万火急：乐黛云教授对我们说“可别晚了”，金丝燕说“8点准时出发”；这些还好，最厉害的是去长城游览那天，有一段长城距北京40多公里，我们是坐小巴去的，车上除了我们还有8名中国游客。到了长城就自由活动，约好下午1点半集合出发。下长城时我们晚了5到10分钟，这就好像是捅了大漏子。米歇尔腿肚子疼，走路不利索，这好歹成了我们的借口：腿肚子保住了面子。埋怨也就是一会儿的事（至少看上去是），作为惩罚，我们得唱一首法国歌。我们忘了问一个问题：西方人是不是有总是迟到的名声？

米歇尔由于腿疼，在我们参观一家玉器厂的时候留在了门外，不打算进去。当我们回来时发现他成了厂里年轻职工关注的对象：简直难以想象，他竟把袖子挽起来让他们看他的体毛！我们“当然”有体毛，亚洲人没有……

另一件事让我感到惊讶，中国人如此喜欢给他们所谈论的人加上崇高的评语，他们总说某某是“伟大的教授”或是“某某领域的第一”，比如“最伟大的中医”，“伟大”抑或“最伟大”的书法家等等不一而足……这实在好笑，我们刚在一所大学遇见了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旅馆老板便向我打包票说他名片上的字是最伟大书法家的墨宝：我们实在摸不着头脑……要是我们不在一个人的称谓前加个体面的修饰，这个人是不是就会被中国人看作傻瓜？要不就是“伟大”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意思，就像意大利人口中的“博士”头衔一样？实在想搞清楚！

多亏了金丝燕这个北大的校友和前教员，我们在北大的访问才变得丰富多彩。北大校园很大。有的教员住在校内，住房条件依职称而定：金丝燕15年前还和多人合住一处，且男女分开，即使是已婚教员也一样，还有一项规定是两年内不能生孩子……职称越高住房就会越舒适。乐黛云教授住在一个小湖边，湖水冬天封冻，夏天莲叶接天。

从早饭开始，金丝燕就负责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也说明我们对中国满怀兴趣！藉此机会，她向我们介绍了她在文革时的经历，当时她还是学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很惊讶也很高兴地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变化，10年前他来这儿时，很少有机会远离旅馆去别处活动或是在城中散步，这在当时是禁止的。他所说的变化让其余首次来中国的人感到惊讶，因为这次我们到处招摇过市，实在难以想象从前的境况。

我们这次远称不上“铺张”或是“舒适”的旅行却是一次深入了解文化，会见中国朋友并适应中华风俗的好机会，这对像“远近”这样的项目实在很有必要。

我们的中国朋友很优秀、热情而细腻。周一、周二、周三和周六的会议开得很

愉快，大家在坚持原则之余也表现出了灵活性，说话坦率。

官方会议上那些一言堂式，让其他人昏昏欲睡的发言并没有在这里出现，这次它们占用的时间不多而且也很有趣：法国大使毛磊阅读了丛书，因此能够侃侃而论。其它与会人士还有文化参赞戴鹤白先生。

(2000年2月，弗朗斯瓦·阿斯提耶看北京，与基金会的嘉特琳·盖尔尼耶、密歇尔·苏盖、金丝燕及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的马克·乐布歇、奥勒加·郝戴尔和马纽一起执行任务)

别出心裁的丛书

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这套书的确别出心裁。“远近丛书”围绕着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主题让两位作家的思想得以辉映。中法两位作者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依托自己的经历，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寻找古圣先贤、文人骚客的名言，谈论同一个话题。这是一次通过他文化来更好地了解己文化的尝试，同时也增强了中法文化间对话。当然，理解与误解依旧不可避免。

丛书中法版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版，法文版由巴黎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第一系列四册1999年9月在巴黎、2000年2月在北京和上海出版。该系列的四个主题是：梦、夜、死亡和自然，第二

系列于 2000 年 3 月在巴黎出版，其中包括美（朱存明/多米尼克·费尔南代（Dominique Fernandez）著）、味（龚刚/保尔·阿利耶斯（Paul Ariès）著）和建筑（杨辛/昂热列可·舒尔乡（Angelico Surchamp）著）。相应的中文版也将随后问世。

（米歇尔·苏盖、嘉特琳·盖尔尼耶：2002 年 2 月 15-20 日，龙年之始：北京之冬，第三次法中未来文化间丛书编辑会晤报告）

主题选择与跨文化阐释

2000年北京会议的经验表明中法双方人员共同商定主题是何等重要。事实上每次讨论的任务不仅局限于那些可能引起两国公众兴趣的话题，还包括明确这些话题在双方文化中的确切含义。如果认为当中国人和法国人在说同一个词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翻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每次向中国和法国作家建议一个主题时，我们都需要确认他们将会在同一领域内发表意见，意见本身当然可以不同。当我们试图谈论葡萄酒、死亡或是数学时误解并不明显。一旦涉及到激情、旅行、天空或者家庭这样的主题时，我们会遇到无法确切翻译为中文的词汇，或是遇到某些概念，它们在一种语言中有多重意义而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在两种语言中，尤其在中文翻译中不出现纰漏，不至于使我们的作家摸不着头脑。

基于此，会议最后一天在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家中举行的讨论会就颇具意义了。举两个例子：中方已赶在法方之前请人撰写了有关激情的文章。讨论过程中中国朋友对我们坦言，在中国，激情这个概念是个纯西方概念，而这位中国诗人就此撰文其实是受了尼采的直接影响。于是我们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主题？他们的回答是：

- 其实他写了一篇有关爱的文章。
- 那题目干吗不干脆就叫“爱”呢？
- 因为在中国谈论“爱”不成体统！

原来如此！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的中国朋友就这样写了一篇名为激情的文章，尽管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诗人用它声东击西地谈论了一个禁忌话题——爱。以后在题目上需要斟酌的地方还很多，如果没有双方的交流和讨论，要求作家们谈论的话题往往会偏离我们的初衷。

这些例子说明，在达成某种共识之前，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后为了确保丛书题目的内涵，我们必须经常性地就所用词语的意义交换意见。

(米歇尔·苏盖，嘉特琳·盖尔尼耶：2002年2月15-20日，龙年之始：北京之冬，第三次法中未来文化间丛书编辑会晤报告)

“远近”丛书已出版及待出版分册明细表：

	题目	法国出版时间	中国出版时间
第一系列（回顾）	梦 夜 死亡 自然	1999年9月	2000年2月
第二系列	味 建筑 美 旅行	2000年3月 2000年3月 2000年3月 2001年	2000年底 2001年
第三系列	科学	2001年	
第四系列	家 智慧 对话	2002年 2002年 2002年	
	激情	2003年	2004年 科学 家庭 激情 智慧
待出版系列	读 云 童年 天 对话（中文） 树木 慈悲 人 想象	2008年	2008年

(金丝燕)

读者群

我们一再强调，这套丛书的读者群是非专业人士，他们或被异国文化吸引（中国文化吸引法国人，法国文化吸引中国人），或对所谈的话题感兴趣，或两者都有。这种兴趣有别于纯粹的学术乐趣。当然，丛书同时也旨在满足游人、工业界、外交界及服务业中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人士的好奇心。

面向“广大读者”的愿望已在法国实现，丛书一经面世便得到了消费者（首印2500册3个月内售罄）、报界等媒体的好评，在欧洲出版界也引起了不小反响。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不久前签署了一项将该丛书译为意大利文的协议。

-选择作者

丛书作者由中法双方出版社选定，选择时跟丛书主编、人类进步基金会和中国合作方进行协商。选择的标准并不严格，无论有名与否，年龄大小，更不考虑职业经历如何。丛书作者不必是相关主题专家，只要我们欣赏他的文才，看过他的作品后，相信他能深刻体会题中深意并能从多个角度切入写作，我们即可委之以重任。此外，我们希望作家能够高瞻远瞩，能够不拘于细节，不沉迷于引经据典。

法国方面的作者也不是非法国人不用。但话说回来，法国作家的文章总还是植根于欧洲文化的，行文中意大利、德国、或希腊文化的踪迹随处可见，可以这么说，法国作家更多地是作为欧洲人而非法国人在写作。

一个意大利出版商曾要求出版该丛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丛书不仅事关中法，更事关中欧。这种延伸不仅正当，而且很有意义，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需要就此进行深入思考。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在中法两国国内，“远近”跨文化交流的尝试也是有意义的。丛书别致的风格和内容能够给双方带来惊喜和奇趣，同时又能向对方国家介绍本国文化。如此一来，丛书既不会在己方同胞眼中显得浮浅乏味，也不会成为对方国家读者手中枯燥的教科书，而是一次作家本人向远在天涯的异国人或是近在比邻的本国人讲述自己和本国故事的机会。

-作者的自由和跨文化对话的性质

首先，作者和出版社相互沟通，弄清关键词的含义，出版社向作者发出一份双方共同商定的责任书，就一些主要原则作出规定，并交由德四克雷·德·布鲁威尔出版社最终敲定，一旦完成了这些程序，作者即获得了出版社授权，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谈论相关话题，而不必在意另一位作者要写什么内容。

我们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如此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非常想知道，怎样才能加强这种对话。我们提了许多建议，但最终又都被推翻了。

比如郝铭鉴就曾建议让每位作家一开始就向他的中国或法国搭档提几个问题，主要是问在所选话题的范围内，有哪些问题容易引起对方反感。他们并不需要一五一十地回答，不过是借对方所问给自己提个醒而已。但汤一介和乐黛云反对这

样做，金丝燕也跟他们夫妇一个立场。他们认为，两位作家一开始不该启动对话这样他们才能自由表达他们对所涉话题的看法，这才是纯粹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让两位作家已有的、未受对方影响的意见形成对比，这应该是个基本要求。中方作了有趣的比喻，说这就像中国的传统婚姻，男女双方直到洞房才见面，丛书的中法双方作家也应如此。

人类进步基金会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根据 DDB 和上海出版社之间达成的协议，丛书出版前，每个作家都理应收到对方作家文章的翻译稿，以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某些修改。这并不是为了让双方的文章“整齐划一”，而是为了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并使双方相互启发。我们甚至考虑过在每本书中都加入一段简短的通信集或是两位作家的对话。中方认为这样做过于复杂，且无必要。马克·乐布谢也有同感，而且他认为读者自己就能对两本书进行总结，能根据丛书和各分册的内容品味两位作者间的对话；他觉得公众自能理解远近丛书的深意，再加上一段“跨文化说教”实在有些多此一举。

(米歇尔·苏盖，嘉特琳·盖尔尼耶：2002年2月15-20日，龙年之始：北京之冬，第三次法中未来文化间丛书编辑会晤报告)

巴黎政治大学圆桌会议

金丝燕

几年前我得见程抱一教授，与他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并由此萌生了一个想法：西方文思犹如桑蚕终生孜孜不倦所吐之丝，而中华文章则若玉匠雕琢之器。玉材出自深山，中国文人认为：“玉不琢，不成器”，文思就像玉材，能否成器则需经年雕琢。

[...]

白乐桑

讨论的主旨是探究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跨文化交流、己方文化与他方文化的关系……这类讨论往往会陷入老生常谈，而我个人更喜欢结合实际。我对实际这个词有着广义的理解：实际即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决定着我们的身份，文化环境

必定包括语言环境。

[...]

程抱一

维护和传承文化是一种普遍愿望，我在这一点上与您意见相同。但我觉得，传统在中国是种无处不在的压力，而在西方则更多的是个人的自觉。但无论是中是西都应了马尔罗的那句话：“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诗人”。诗歌发源于远古，源远流长，踏进了这条长河才能成为诗人。我个人认为这条长河的源头在西方是希腊悲剧，在中国文化中则另有所指。人们谈论中国人的信仰，但也常批评中国人，说中华民族没有宗教。中国人或许真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但中国人并非没有神圣感。金丝燕曾对我们说过，中国文字曾经是占卜符号，这个表意系统其实就是将人类精神与宇宙万物之灵联系起来的复合体。正因为中文是起源于象形文字的表意文字，我们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此种系统用比拼音文字更具体的方式将人类与自然联系了起来。比如休息本是个抽象概念，而中文则以一人一木表示休息。同样，“好”这个概念是由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表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字就是一个博大的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系统。如果说的哲学一些，我认为中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一个荒唐的、无意义的宇宙。宇宙应该有它的含义。

(法国政治学院学生：Annabelle Caron, Axel Laroy
Deval, Yang Li, Jonathan Siboni, Dorota Wal, Nadine
Wolf：中国墨，双文化视角-远近文集横向阅读)

VI. 《跨文化对话》杂志

《跨文化对话》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密切。杂志开辟了一方思考天地，讨论一些重要话题，比如国家治理、高等教育改革、新型发展模式以及共同伦理基础。

该杂志是人类进步基金会表达其思想、宣传活动的重要媒介。季刊的主编为乐黛云，副主编为金丝燕，执行主编钱林森。创刊的想法是在1996年南京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具体编辑工作由人类进步基金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承担第一期于1998年10月面世。该刊的宗旨是打破单一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垄断，促进中外思想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并通过引进新思想为中国社会改革做出贡献。

(金丝燕：中方简介)

《跨文化对话》杂志始末

创建《跨文化对话》杂志的想法是1996年在南京国际会议上提出的，人类进步基金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参与杂志编辑。1998年该杂志创刊。创刊宗旨是打破单一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垄断，促进中外思想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并通过引进新思想为中国社会改革做出贡献。

该杂志自创立起便得到了人类进步基金会的资助。资助分两次支付，总额达6万法郎，主要用于支付翻译及编辑费用。米歇尔·苏盖和嘉特琳·盖尔尼耶承担了中欧间的部分协调工作，并负责该杂志法文版的出版。

怎样的读者？怎样的作用？

本刊的读者主要是大中学生、大学教员和职业人士。他们被国际间的讨论和思考所吸引。这本杂志可作为他们同国际知识界和其它国际友人互通有无的桥梁较之于因特网，白纸黑字的杂志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更可靠的交流途径。

2004年4月起，该杂志电子版在北京大学网站发表，有1473名网友点击阅读，全都是大学生。该杂志的专门网站正在筹备当中。

《跨文化对话》以增进中外学者交流为己任，力图使众人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得到广泛共享。因此，自创刊始，该刊的读者定位就是学者和大学教员。其编纂理事会汇集了中欧大家，阵容强大，保证了其严谨性。杂志以其跨文化和跨学科特性吸引了中西众多研究者、大学教员和学者。欧洲方面有：恩贝托·埃柯、艾克沙维·李比雄、麦克·库力、托洛萨那、程抱一、施舟人、弗朗索瓦·于连、皮埃尔-让·雷米、谢和耐、朱利娅·克里斯多娃等，他们曾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稿。另外，保尔·克洛代尔、亨利·米修、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欧文·白璧德及其它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都曾被译为中文在这里发表。

该杂志也引起了中国新兴精英阶层的兴趣。近十几年来活跃在中国学术界的众多研究者和大学教员都与我们的杂志有密切合作，并与我们分享他们研究思考成果，如历史学家庞朴、文学评论家刘小枫、人类学家叶舒宪和哲学家赵汀阳、何怀宏等。

我们的杂志还深受众多博士生导师、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的好评，他们把《跨文化对话》看作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的一个平台。

《跨文化对话》也获得了来自欧美和新西兰的海外华人学者支持。杂志每期都给他们留有专栏。国内同仁们对他们的研究深表赞赏。

应欧洲、北美、亚太地区9个国家24所大学的要求，嘉特琳·盖尔尼耶和艾蒂安·加亚尔德把最新几期《跨文化对话》杂志邮寄给了他们。

(乐戴云、金丝燕、陈力川：《跨文化对话》杂志小结与前瞻)

《跨文化对话》与人类进步基金会

《跨文化对话》杂志是人类进步基金会“跨文化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现今唯一一份中法合办杂志。该杂志对中国民间力量的兴起给与了特别关注，这也是人类进步基金会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跨文化对话》曾有两期专刊介绍该基金会的活动：第9期介绍了2001年12月在里尔举办的世界公民大会，其中包括皮埃尔·卡蓝默和金丝燕的谈话以及另外6篇文章；第12期介绍了200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题为“跨文化对话回顾与展望”的国际研讨会，其中有对会议的深入报道以及其它7篇文章。此外，在已出版的16期中，有13期杂志的26篇文章（随笔、文献、文章、谈话等）和4篇通讯介绍了人类进步基金会从1998年到2007年的活动。

（乐戴云、金丝燕、陈力川：《跨文化对话》杂志小结与前瞻）

今后的新方向与新话题？

我们希望对民间社会的建设给予更多重视，为此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就此进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发表了众多文章。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应该彼此分离，还是相互交融；第二个问题是治理理论实施中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同人类进步基金会及其合作者的联系，以便共同筹备几期专刊（专刊主题有待明确）。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培养民间社会意识，使之与建设负责、团结、多元的世界理念相辅相承。这是人类进步基金会的理念之一，也是我们都认同的奋斗目标。人类进步基金会在杂志的编辑团队及其各国合作者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该杂志副主编金丝燕的协助。我们将很快在杂志中翻译人类进步基金会的以下文章：

1. 治理重建（米歇尔·苏盖）；
2. 农民运动在国际民间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皮埃尔·吴翰）；
3. 皮埃尔·卡蓝默对治理、方法以及大学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杂志编辑团队将为未来3年确定讨论主题。改版后的杂志中，人类进步基金会与皮埃尔·卡蓝默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片思考与思想交流的天地，杂志将继续以印刷和电子两种版本出版。

（乐戴云、金丝燕、陈力川：《跨文化对话》杂志小结与前瞻）

《跨文化对话》中的基金会

杂志已出版了19期，其中16期的36篇文章（随笔、文献、文章、谈话）和4篇通讯介绍了基金会自1998年到2006年的活动。第9期发表了2001年12月里尔世界公民大会文集；第12期报道了2003年2月北京“跨文化对话的回

顾与展望”国际会议；第18期则发表了2005年6月北京治理论坛文集。

(金丝燕, 《跨文化对话》与FPH - 发刊小结 N° .1 - N° .19)

《跨文化对话》与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纪实

创办《跨文化对话》双语国际论丛的设想，是1996年4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对话：文化的差异与共存”中欧跨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南京会议是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知名学者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牵头，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合作，继1991年3月中山大学“文化的双向认识策略”、1993年6月北京大学“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之后的第三次国际跨文化学术会议，是法国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和创设中的《跨文化对话》携手合作的起步：时任出版与交流部主任的苏盖（M. Michel Sauquet）先生代表基金会率团前来南京，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钱林森教授联手主持了这次盛会，积极支持《跨文化对话》的创

意和实施。同年8月，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三方，又在北京相聚，就《对话》丛刊的组织、宗旨、组稿和出版等方面进行具体磋商。1997年5月在北大召开的“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有关方面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商谈。是年7月，法国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巴黎维拉苏古堡举办了由中法相关学者、出版机构代表参加的中欧合作出版会议，达成了包括创办《跨文化对话》丛刊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经中法双方两年多积极筹备，《跨文化对话》中文版创刊号终于于1998年10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当年11月在上海举行隆重的首发式，正式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迄今为止，已出版20期。由此可见，《跨文化对话》的诞生与基金会的合作是同步进行、密不可分的，有着深刻的国际文化合作背景和坚实的学术基础。

(钱林森：《跨文化对话》与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纪实)

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的两种形式和两个阶段

《跨文化对话》的创设和发展，是与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始终如一的支持分不开的，它们在“互利”、“共赢”的道路上，携手探索，已经迈过了十年历程（以1997年巴黎维拉苏古堡中欧合作出版会议为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

从《对话》创刊初至2003年《对话》第12期，为第一阶段。两者合作的重心，是基金会努力寻求与《跨文化对话》中文版相适宜的西方双语合作伙伴，同时资助《对话》论丛部份翻译费，使之在中国顺利地出版，并且自第4期《对话》（2000年5月）起将之纳入基金会“面向未来的文化间文库”。但基金会相关领导，既不介入丛刊编务的操作与抉择，也不要求为其本身的中心工作相配合，双方保持各自独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如此，《对话》主创人员，本着论丛的创刊宗旨，自觉的与基金会高扬不同文化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中心策略及相关举措，相协调、相配合的原则，始终保持密切合作、互相尊重的关系，两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是以“友情支持”、一同前进的形态体现出来的。

从2003年开始至今，是第二个阶段。2003年春，由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与基金会合作举办的“跨文化对话：回顾与前瞻——为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双边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和本刊主编乐黛云教授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第12期《对话》以头条位置开设专辑，刊发了会议的报导和论文，以此为契机，《跨文化对话》论丛与基金会的合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8月，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皮埃尔·吴翰（皮埃尔·吴翰）、金丝燕等一行在上海听取了《跨文化对话》执行主编钱林森教授和上海文化出版社编审、《对话》执行编辑李国强先生关于《对话》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同时会见了《对话》主编乐黛云教授，决定加大支持《对话》的力度，于2005年拨款 欧元，资助出版。与基金会切实有力的支持相适应，《跨文化对话》方面也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适宜的出版合作伙伴，从第17辑起，进行改版，使得论丛的学术追求和富有创新的出版理念得以流畅地体现。其次，从16、17辑起，对编辑理事会进行了充实和调整，逐步完整内部编辑机制的运转，在选题、编务方略上，进一步自觉地与基金会“治理、伦理与社会持续性发展”三大中心主题相协调、相配合。再次，从18辑《对话》始，聘请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先生担任论丛学术委员，使之对丛刊进行实质性的学术指导。两年来，由于上述措施的贯彻和实施，便将《跨文化对话》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论丛面貌为之一新，在学术品位上得到新的提升，充分体现了合作双方“互利”、“共赢”的特点。

（钱林森：《跨文化对话》与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纪实）

具体成果

《跨文化对话》自创刊起，就和基金会紧密合作，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社会文化热点，诸如多元文化共处、伦理与未来社会、“协力、负责、多元世界”、治理、教育和社会持续性发展等重大主题，开设专栏，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

《对话》第4辑开设“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圆桌会议专栏，发表哲学家德里达的《世纪与宽恕》埃柯的《寻求沟通的语言》等专论。

《对话》第6辑开设“科学与人文”、“关于普世伦理”的专栏和笔谈，以“海外专递”的显著位置，刊发了本刊时任巴黎联络处主任、现任副主编金丝燕教授的长篇报导《巴西国际社会论坛会议随记》。

《对话》第8辑，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基金会为建立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的行动纲领，编者卷首语开宗明义，向中国读者介绍：

“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主潮迅猛发展的新世纪之初，人类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式的古老问题，便又重新提到了世人的面前，要人们思考、抉择、行动。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焦虑的深入思考，一个由不同区域的地理文化团体、不同领域的专业社群和不同肤色的知识者代表组成了‘全球协力、负责、多元联盟’”。

接着，《对话》第9辑，以“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世界”为题，开设“第一届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专辑，刊发了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的《选择和平，拒绝战争》和金丝燕访谈基金会主席卡蓝默等文章，使《对话》的中国读者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人类基本基金会所彰显的人类和谐相处、文化共生互补、社会和谐发展的宗旨和追求。

再接着，《对话》第12辑，头条“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专辑，刊发了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的《十年合作的回顾和展望》和《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长篇报道及陈力川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侧记》等文章，编者在卷首语强调指出本辑的重点是‘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专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合作转瞬已届十年。新世纪之初，我们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转折点。

接着的16辑《对话》，又刊发了李成贵的《‘另一个世界’和经济学家——参加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印度）随感》，对基金会所倡导的“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和实践，进行跟踪报导，两者的合作与配合，更加默契。

《跨文化对话》从第17辑起，锐意进行版面改革，扩充容量、拓展深度，加强与基金会相关的重点专辑的建设，以适应《对话》与基金会（包括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愈来愈紧密的合作新形势。17辑为“中法文化年专号”，除设立与中法文化相交汇的杰出人物如德里达、弗朗索瓦·程、弗朗索瓦·于连的专辑，以及法兰西两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让-皮埃尔·雷米和思想家克利斯特娃等文化精英的文章和对话外，还特设“海外专递”的栏目，以醒目的位置登载了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和出版部主任苏盖关于网络和教育改革的专文，编者在卷头语也特别提到：

“本集‘海外专递’两文作者卡蓝默和苏盖先生，是当代法国知识界一直处于前沿思考和致力于实践的代表，他们对国际网络和巴黎名牌大学改革的奏议，正与本刊第13辑‘大学改革论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议论相呼应，反映了中法知识界心气相通，中外文化血脉相连的一面，理应得到读者关注。”

《跨文化对话》第18辑，设“社会协同治理”和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两个专辑，发表了西尔万·拉维勒的《协同治理的精神、技术、伦理和民主》、阿勒菲雷多·裴纳-维加的《知识协同治理的展望》、陈力川的《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与实践》、埃德加·莫兰的《教育的七个黑洞》和高宣扬的《莫兰对现代知识的反思》等文章。

《对话》第19辑是“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的专论，发表了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的《二十一世纪的大学》、陈力川的《欧洲大学的沿革——兼论大学的使命》、高宣扬的《莫兰教育思想简论》，以及莫斯科大学校长B. A. 萨多夫尼奇、圣彼得堡大学校长Л. А. 韦尔毕茨卡娅和我国学者参与讨论的文章。

《对话》第20辑是“中俄文化年专号”，同时刊发了“美国主义研究”专栏和埃柯的《圣战，激情与理智——关于文化优越性的遐思》专论，以及即将出版的21期《对话》“中国——瑞典专号”诸多对话和文章，都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汇互补、共生共荣的宗旨而开设的，应该说，与基金会所彰显的“治理、伦理与社会持续性发展”三大主题是相合拍的、一致的。

《对话》创刊至今，已迈过近10年的困难旅程，步入新的发展大道。在过去不平常的、奋斗创业的10年里，《对话》中文版丛刊，已经和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包括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获得对方适时、有效的经费支撑和学术指导；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主编乐黛云教授为核心的老中青团结奋斗的工作班子，并在今年下半年有望列入CSCSI来源期刊。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团结协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发展未来。

2007年3月28日至4月2日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钱林森：《跨文化对话》与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纪实）

VII. “关键词”计划：解读中国、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对话的密码

“关键词”是出版计划中最富代表性的项目，“从一开始便具有跨文化意义”，这套国际性丛书计划将世界各地的出版商聚集一堂。由于其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的，该计划成了跨文化丛书中最艰巨的项目。要实现“关键词”计划，就要寻求相关支持，这也体现了我们的理念，即探索不同行业专家之间的新协作形式，既要尊重文化多元，又要寻找共同价值。如果我们不为天下先，就不会有人支持这类计划(参见CAB文件 n° 11)，更遑论其实现。

该计划各方在巴黎会议上达成合作协议，确定研究五个关键词：认同、自然真理、经验阳性与阴性。来自中国、美国、摩洛哥、南非和法国的五名出版商参与计划，与丛书的五名主编协作，每名主编又领导着各自的作家团队。一名总协调人将密切关注计划进展，这一重任由娜佳·塔兹(Nadia Tazi)女士担当，她是教育哲学家，也是探索出版社的老朋友。

此外我们还需要出版界专业人士的加盟，这不仅仅是为了校对稿件和评估质量。我们努力帮助各方挑选合适的作者：南非和摩洛哥方面两位主编的意外离开令我们不得不勉为其难，自己去寻找合适的作者。

总协调人责任重大：修改、协调、讨论、审稿，这些还都还是外围工作，困难确实很多：除了出版界常遇到的问题之外，还有水平的良莠不齐，多学科的复杂局面以及对项目前景的不同理解等等。

(艾蒂安·加亚尔德：论关键词， DPH文件 n° 655 - 文件9)

1996年，广州大学哲学教授王宾在南京得遇哈佛大学出版社文学编辑林赛·沃特斯，两人共同商议，提出了“中西对话关键词”这个别出心裁的计划。计划主要是希望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就一些司空见惯的常用词意义进行思考，指出不同文明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该计划不是且从来不是一次学术性研究，恰恰相反，用王宾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填补大学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

首次选择的五个词构促成了项目的第一本书：真、美、善、经验和自然。针对每一个关键词，中西双方都各写一篇文章。该书不啻于一次语义殿堂漫步，其主旨不在于定义，而在于展现千百年来这个词如何演变，如何被运用又是如何产生力量（“文字创造世界，文字生产力量”）。进一步说，在今天的中国人、欧洲人、美国人眼里，这个词描画出怎样的形象，又代表什么含义……

（艾蒂安·加亚尔德：论关键词 DPH 文件 n° 655 - 文件 9）

跨文化出版计划：中西对话关键词

根据 1997 年作出的决定，该计划第一本书的五个关键词是：“真”、“善”、“美”、“自然”和“经验”。这些日常用词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哲学传统。通过这些词我们可以试图理解整个国家的相关文化。换句话说，该计划的发起者并不希望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文化截然分开。这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学理念，它试图通过理解多元文化产生的机制来重新诠释人类、诠释人类的共性。此后该计划还将就其它关键词出版分册，计划每年出版一册。每册都将同时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以当地文字出版。

由于这个计划的发起者们大多工作繁忙，有的身体欠佳，所以两年来该计划仅仅在中国有所进展，这要归功于王宾教授的执著努力，中国学者为该计划撰写了 5 篇文章。

我们建议从 1999 年秋起重启该计划，中方和其他各国发起人共同努力，多管齐下，定能有所收获。这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出版社、探索出版社、人类进步基金会和所有从一开始便参与计划的中方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我们建议在计划中增加阿拉伯国家代表，希望以此变双边对话为三边对话，并由此铺开，使其它文化都能在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两年来已有众多来自世界各方的出版商（印度、南美、澳洲、马来西亚）对该计划表示出了浓厚兴趣，我们希望能尽早实现与他们的合作。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为了重启这个计划，我们亟需一位“队长”协调首次三边跨文化对话尝试（中国、西方、阿拉伯世界）。

（米歇尔·苏盖：中西关键词对话，文化间出版计划，1999 年 6 月 23 日）

跟随跨文化的进步步伐

每逢“中外学者对话”，总要提到“平等”这个词。当今中国，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平等”这个词只是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

口号，还是人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平等”是一种真正的价值，一种人类的无差别体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化间对话在中国走过的历程。

我们一边快速而饶有兴致地浏览文化间对话，这个新建筑的“亭台楼阁”，一边倾听建筑师讲述他们在劳作过程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如果要对此做个总结的话，我想可以引用王宾教授介绍“认同”这个关键词时，在文末所讲的一则逸闻趣事来说明问题，这则小故事对当今的文化间交流事业既有启发性又有建设性：一位非洲行吟歌手受邀赴意大利参加交互人类学研究。这位塞内加尔歌手虽然目不识丁却有着罕见的艺术天分，由他作曲并演唱的“一个非洲人眼中的意大利”让当时在场的欧洲人惊讶万分，他们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然而，有一天歌手从马里来的朋友透露了一个大秘密：诗人的每首歌都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用来取悦欧洲人的，而另一个则要等他回国后唱给他的同胞们听！“欧洲人”自然无缘欣赏这些歌曲的“另一个版本”。

这件事几乎是个寓言，它不能不引起深思。目前的文化间交流，“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初遇他方文化的赞叹、惊奇和喜悦之情，与交流的障碍与交流的极限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互倾听、没有交流双方对各自行为的调整、没有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的愿望，所谓的跨文化交流，就会沦为肤浅的愉悦感，并最终走进死胡同，走向闭目塞听。如果有一天，那个故事中的“欧洲人”愿意屈尊去听那另一个版本（哪怕它没有欧洲版悦耳），如果那位塞内加尔歌手也不再过分地在两个版本上做文章，那么跨文化交流就能往前迈一大步。

（杨建钢：文化间项目经验化，迈向“良好互动”及对FPH的“正确解读”）

相聚达喀尔(2003年12月1-4日)

2004年12月1日至4日，别样全球化“独立出版人联盟”首次全体大会在达喀尔举行，与会者提出了很多想法，或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是很明确的理念，比如“无国界出版商”、“世界出版商”、“蝴蝶群”、“江河之溪”、“梦想商贩”等。让·科克托以一则格言表达了自己的理念：“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事情也就这样做成了。”这并不是大话：在他看来，世上本无命运，只要众志成城、专心做事，原本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让·科克托提到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不信邪的人。而你们，则是60位来自亚、非、欧、美各大洲35个国家的出版商。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不计较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上的分歧，不畏旅途劳顿，齐聚达喀尔。

这次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不仅确定了联盟的治理方式，还落实了共同的出版和翻译计划，在联盟执委会看来，这些都是实现梦想的条件。我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独立出版人联盟，旨在反映当今世界的多样性。我们视团结为动力，只有团结，才能有效地宣传我们的理念，才能改善我们的世界。

(艾蒂安·加亚尔德：开幕式报告，2003年12月1日)

独立出版人协会宣言

联盟执委会以独立出版人的定义为基础，列出并通过了20多条标准，以此作为联盟宣言和入盟申请表的补充，联盟执委会和协调人将根据这些标准审核候选成员的入盟申请。

联盟以增强各语种网络的地理代表性为首要发展原则；老成员将根据原则介绍新成员入盟。

达喀尔会议上被提名的新成员将收到相应语种网络协调人邮寄的此次大会总结报告和入盟申请表。被提名的新成员收到相应材料后，应向协调人和巴黎执委会发送回执；协调人和执委会将共同研究决定是否接纳新成员。候选成员如被协调人否决，则执委会亦无权接纳其入盟。协调人可通知其网络内全体成员参与讨论新成员的入盟问题。

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商网络或者出版商协会可以网络或者协会身份加入联盟，其成员也可以个人身份入盟。协会或网络成员的入盟程序与独立成员的入盟程序相同。

我们欢迎不属于现存任何语种网络的“孤立”出版商入盟；组织语种网络只是为了方便联盟的工作。联盟从根本来说不是排他性组织，而是包容性组织。

(艾蒂安·加亚尔德：2003年12月1日，星期一，开幕式报告)

第二部分 中国参与世界事务——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公民？

十几年前，人类进步基金会刚刚进入中国，其初衷是想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这种融入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组织来自中国各界的人士参加国际会议，另一方面要让来自世界四大洲的朋友们到中国参观访问、参与论坛、组织研讨和会议。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人类进步基金会“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并在工作中与中方合作者建立了深深的默契。因此，基金会制定计划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实际工作的需要，还要兼顾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中方合作者包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逐渐意识到，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其目标是为了世界公民共同体的兴起，中方也以此为标准衡量和基金会合作的历史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历程，中国的开放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如今的中国成了全世界“关注和忧虑的焦点”。面对这种局势，基金会也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基金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寻找可能的选择，也就是在“治理方式的大讨论”中找到一种兼收并蓄的方法。

(皮埃尔·卡蓝默：FPH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工作跟进笔记 n° 21424)

VIII. 2001年：中国参加全球性对话-里尔世界公民大会

人类进步基金会于2001年12月在里尔举办了世界公民大会。这次历史性的盛会迎来了来自80个国家的400名与会者，其中有40名会员来自中国。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人类责任宪章”。

世界公民大会要应对的挑战

世界公民大会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在举办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有些问题乍看上甚至无法解决。

“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事情也就这样做成了。”这句话正说明办这次大会有多难，有时候我们距失败仅有咫尺之遥。这就是为什么，要铭记共同经历的艰难，尤其是2000和2001这两年，我们步履维艰。最终，我们挺过来了，这要归功于所有为此付出了心血的人们和他们的辛勤劳作，也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和默契，否则联盟的理念早已灰飞烟灭了。

挑战：

- 1) 400名与会者能否代表我们这个如此多元的世界。
- 2) 能否扩大与会者所涉领域，以便代表社会职业各界。
- 3) 2000和2001两年的工作量不等。
- 4) 工作团队并没有集体工作经验，要寻找能被大家都接受的工作方式。
- 5) 在筹备过程中不能排斥“少数派”盟员。
- 6) 参加世界公民大会的绝大多数的与会者起先对联盟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通力合作？
- 7) 开创完全不同于以往国际会议的大会模式，说服与会者务必全程参加大会。
- 8) 400名与会者互不相识且语言不通，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对话环境。
- 9) 在北部-加莱海峡大区动员必要的人力，以便为每位与会者提供周到的陪同服务。
- 10) 大会的筹备工作要考虑到举办地的实际情况，本土性与世界性并重。
- 11) 发动当地公共部门积极支持这次大会。
- 12) 要克服语言障碍，用恰当的工作方法制定大会的议程和中心任务，既要保证计划落到实处，又要避免强迫行事。
- 13) 某些与会者没有认真填写建议簿，必须让他们知道大会不能以这些草草了事的建议簿为基础展开讨论。

(皮埃尔·卡蓝默：迎接挑战，世界公民大会，Fiche Bip (基金会
内部常设文献库) n° 567)

雄心与梦想

这次大会首先是个理想、是个梦想、是个诺言、是一项共同的事业，或者说是一曲前奏。

说它是梦想，是因为我们试图在国际社会各方之间实现对话，在尊重多元性的前提下讨论共同事务。

说它是诺言：自1993年起，我们就预言，总有一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会齐聚一堂，共商大计。

正因为如此，本次大会堪称一次历险，一次集体探索，希望在未来的一周内，各位能和我们携手并进。

为了酝酿并组织这次大会，我们进行了摸索和创新。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带水拖泥。我们请在座诸位和我们一起前进。本次大会是一次探险、一次创造和一次相互借鉴的机会。对我们的错误，也希望诸位多多包涵，错误在所难免，它不仅是宝贵的学习机会，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世界公民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这次大会是一曲前奏。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二战后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为一个和平的、尊重多元文化的世界共同体奠基。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在今后的一周时间内就是要试着为这项事业做些事情。

大会成员包括来自各领域、各大洲的400名与会者，他们将从几个简单的议题出发展开讨论。本次大会既是目的又是方法和手段，因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决心：要为里尔大会做好准备。我们得准备好我们的建议，得把它们翻译出来。各界人士都会来，有军界的、法律界的、卫生界的、有农民还有市民代表。里尔大会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但不是终极目的。我们不是要让400人坐在一起清谈一个礼拜，展开讨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们的目的是要结合世界的统一性和多元性，使之相辅相成。我们一直在思考多元性问题，思考多元文化和它在筹备工作中可能引起的问题。我们对会议中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有充分估计，要在未来的一周内学会耐心倾听，并对可能产生的误解做好心理准备。

不仅如此，多种社会职业的并存也增加了会议的筹备复杂程度。

可以在与会者名单中看到，参加会议的有普通社区负责人，有农业、渔业、企业联合会以及工会的领导，有工程师、政界人士、科学家和教师，等等等等。

这个世界就是由如此多元的人群组成的。我们的朋友西达尔塔（Sidarta）指出当今社会人人都在沿着自己的轨迹生活，我们就是要在这些平行而不相交的轨迹间建立联系、学会对话。

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错综复杂，但此挑战和彼挑战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学会找到联系，1993年以来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在40个领域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

挑战是复杂的，观点也是复杂的：在未来一周中大家会看到，来宾们的想法各不相同。大家固然有共同的信念，比如大家都自认为是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地球不是商品，都认为需要建设一个世界共同体，都对彼此间的对话寄予厚望，但共识也只是仅此而已，我们需要对意见的分歧有充分认识。

要让多样性为我们将要建立的共识服务。

第三个问题使我们的工作方法更加复杂。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需要在摸索中解决。这个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强调各个小组、各个团队和

各个洲级会议的工作成果，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与会者人员觉得，我们请他们来是为了让他们赞同我们所做的一切。

大会一开始我们就坦言，我们是从零起步的。与会来宾需要在多元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当今世界的挑战，去寻找应对的方法。

因此，如果各位希望为明天的会议做些准备的话，我只能请大家看一看发给大家的材料，它是用7种语言写成的，其中列举了最精彩的建议书，明天列席讨论的个人和团队可以以此为参考。

我们始终希望以民主的方式开展这次活动，为此我们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首先是不事先确定主题。这一点使很多来宾感到意外。精心筹备大会，出钱出力的组织者怎么连会议的主题都不确定一下呢？

我们这样做是我们的目标使然。谈话的主题要随着谈话的进行自然产生，我们得自己考虑怎么使讨论前后连贯，同时我们得自己考虑怎么从分散的讨论中总结出一些共识。

第四大挑战：世界性和本土性并重。

我们知道，一个活动，无论它在哪儿举办，都会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联系。反过来也是一样，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强调得不够，想要办好活动，就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然后才能谈所谓的世界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智慧源于经验，胸怀天下必先立足当前。

因此，我们的大会既要重视全球性，又要重视实际经验和当地情况，我们认为大会不该在一个孤立的会议中心而应该在市中心举办。就像达尼埃·贝斯洪（Daniel Percheron）刚才提到的，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个发展中的工业区，我们得步行去开会，对当地的一切，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得融入其中。更何况这里是一个有光辉历史的地方，一个有自我认同的地方，一个充满歌谣和信念的地方。

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会充分重视各位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正因为要在北部-加来海峡大区举办这次大会，我们才多方征求建议，这次大会的某些建议就来自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性建议和那些所谓的普遍性的建议有着同样的价值。

我们希望大会能扎根于当地，这才是追求世界性最好的方法。

第五个挑战：这次大会的组织管理工作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发扬专业精神，但同时也得有点发烧友似的狂热精神。我要感谢巴黎和比利时团队为大会筹备倾注的热情。所有那些对大会有功的人，所有为了让大会成为各位人生中难忘一刻而奋斗的人，我都要感谢他们。我想请他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还要继续为大会工作，他们之前在巴黎、里尔和那慕尔筹备大会，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不计得失。他们总共有50人，今天在会场的只有4个人，也就是说其他46个人还在工作，为了能让我们在这里相聚，为了我们顺利拿到签证，他们依旧在辛勤工作。另外有来自瓦朗西那花边技术研究院的100多个年轻人和他们的老师一起，把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大会的筹备中。各位没法见到他们，因为他们还在工作。就是他们去车站迎接大家，就是他们安排好了各位的饮食，就是他们在陪同各位。他们身穿大会的工作服，大家很容易就能认出他们。这些年轻人完全不计得失，一心只为了这次大会，希望它能成功举办。

其次我要感谢200多名翻译，他们是本地的实习生、大学生或是教师。多亏他们，各位才能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交流才能畅通无阻。

我们不希望看到在一个“世界性”的大会上，不说英语或法语的人就没法

说话。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

困难是不胜枚举的。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解决困难也需要很长时间，但请相信，我们作出了巨大努力，而这次盛会也值得我们如此冒险。

最后一个挑战：我们既希望开一个封闭的内部会议：400 名来宾要进行充分地相互交流。只有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聊天才能在一些深奥的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与此同时，又不能让这个会议太过封闭，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不行的。我们要试图建立大会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建立这种联系当然要靠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

这是一次我们了解当地社会的机会，他们会关注我们的会议，也有可能出席。

我们使用了互联网。我们的网站 www.gouvernance.net 让我们始终与外界保持联系。在这里我们交流思想、获得灵感并发起讨论。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今后一周内，他们会和各位共同参与大会，他们每天都会从各位中请出几位和 70 万中国网友在网上进行互动讨论，这是分享大会成果的一种简便方法。此外各位也可以自己通过因特网和外界联系。我们希望大家能安安静静的工作，所以安排的讨论组规模都很小且相对封闭，可这绝不是要大家闭门造车。我们要创造奇迹，要让我们的成果为外界所知。

这次大会将以什么方式进行？

我们从一开始就制订了大会的三个维度：

不同领域；

不同问题、挑战；

世界不同地区。

我们希望本次属于大家的盛会能从以上三个维度展开。会议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明后两天我们以社会职业为标准分组，进行讨论。各位会被分为 20 个讨论组，每组成员分属世界各地。

明天，每个社会职业讨论组都要进行讨论，发表他们对当今挑战的看法，并探索相应的对策。

周二，我们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制定《人类责任宪章》，如有必要，要确定它的结构和内容，如同埃迪特·斯莱 (Édith Sizzo) 所说，这个宪章须字字珠玑。各位务必各抒己见，谈谈你们认为是否必要，是否恰当，是否重要，该写些什么内容，等等。

这是第一步。

随后我们要集中所有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即第二步：制定战略。在这个阶段，前两天建立起来的社会职业组将被解散，我们将按照各位感兴趣的话题重新分组，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主题讨论小组。希望在主题小组讨论中我们能够互相启发，我们也会向大家提到联盟所做的一些工作。说到这里，我要强调一下，除了各位与会嘉宾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团队，我们称他们为大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如果有人现在在会场，我希望他们能站起来接受大家的感谢。他们组织了联盟的讨论组，是他们准备了建议书，正是他们的连夜工作才使我们能在会议桌上看到这些建议书。他们还组织了网上论坛和国际会议充分启发而又留有余地，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

第三步自然就是以地区为单位研究战略。我们不希望这次大会成为那种与会者轮流发言的传统型会议，虽然我们从前就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希望采取一种新方式，希望大家能真正从三个维度来重审以往的经验。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为了能从讨论中提炼出精华，为了既不放慢大会节奏，也能让大家用母语表达思想，我们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工作方法。

我们要求大家遵守工作纪律，请大家不要见怪。这是实现民主工作方式的条件。发给大家的文件中有工作方法介绍，这些原则更多考虑的是公正而非学术。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组织方式，能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并让这些发言相互启迪。发言中要有共识，要有意见和分歧，目标是希望我们在这一周中有所收获。

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尝试和创新，其中难免有谬误，有些地方难免显得粗枝大叶，还望大家海涵。但这毕竟是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我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我们对大会有着怎样的期待，大会组织者又有怎样愿望，大家明天固然会有自己的答案。但作为邀请并接待大家的人，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大会的目标，大家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力求大会要有透明度。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在会议的最后提交一份文件，并请大家批准这个文本，决不是这样！我们很清楚集体工作是何等迟缓，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涉及面之广，我们也知道与会者意见是何等的多样。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脚踏实地的，但也是远大的，我想谈四点：首先是明确我们跨领域和跨地域对话所要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同来自 20 多个地区的嘉宾们一道，在纷繁芜杂的思想中总结出那些我们有必要共同探讨和明确的概念，那我们就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了。

我们希望大家能在这些问题上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罗卡尔先生刚才谈到了“和平之树”，这给我们提了醒，我们不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好的而别人的就是坏的，这个领域是唯利是图的而另一个领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不该这么想。我们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理解我们的差异。

另外，我们要寻找真正的共识，这是我一直以来尝试做的事情。我想起了一次成功的尝试，那是一个半月前，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同仁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果，与会的人来自不同领域。弱势群体、企业界、年轻人农民、大学教员都有代表，出人意料的是，牵动他们的基本问题竟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可以在整个大区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取得类似的共识，那我们就算功德无量了。

最后，我希望通过对人类责任宪章的讨论，通过各领域间的交流，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共同责任，这是当今公民社会的基石。

今后怎么办？这要由各位来决定。我至多能描绘几幅蓝图。但是，梦想是行动的指针，我们这次大会不正是实现了一个梦想吗？如果我们这点星星之火可以燎遍世界各地，这种建设世界公民社会，建设世界共同体的模式就会被他人效法。所以这样的大会应该在各地区巡回举办，以便将我们的心声传播出去。

联盟拟定的建议将以 7 种语言传向世界。我确信这次大会上产生的思想值得被传播。差不多两个月以前，第十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在阿雷格里港举行。从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开始，社会论坛的与会人员就已经提出了与我们联盟理念类似的思想，他们与我们志同道合，这些思想为我们共有，不为任何人所垄断。明天我们会将世界社会论坛拟定的建议书发给大家作参考，每个人都会拿到自己想要的建议本。类似的巡回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确信在我们之后，还会有其他人因为受到了我们的启发和滋养，来继续从事这项伟大事业。

随后我们要动员政府，动员政党，这也是我刚才提及罗卡尔先生的原因，我们要宣传我们的宪章，继续在网上进行公开讨论，利用我们掌握的信息为世界民主服务。我们要大声疾呼，因为这样的国际对话不仅可行，而且是一种迫切需要我们可以在未来十几年内为真正的世界议会而努力，这次里尔会议只是一曲前奏。
感谢大家。

(皮埃尔·卡蓝默在里尔世界公民大会上的开幕演讲)

追求人道

我们在初冬聚集在法国北方的古城里尔。大家期盼着一个月后的圣诞节，迫不及待地给广场装上了点点灯火。如此的装点不仅是为了迎接圣诞节，更是为了庆祝在这座古城召开的首届世界公民大会。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讲不同语言的“圣诞老人”，他们从各自的文化带来了厚礼。2001年12月的最初十天里，他们成了这座古城的普通一员。

里尔地势低洼，位于弗拉芒盆地的一角。1888年，就是在这里，神圣的国际歌首次被唱响。而这一次，首届世界公民大会又高举起新的旗帜：“全世界追求人道的朋友们，联合起来！”

(于硕，《追求人道》
——选自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实录)

倡导和平的人

我们的地球有 60 亿人口。而今天在座的不过几百人。但这并不抹煞我们这次世界公民大会的意义，因为它的声音振聋发聩。

当今世界，许多民族受战火荼毒，数十亿人民挣扎于赤贫之中，在急剧拉大的差距面前，同舟共济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一切都说明世界治理有待改善。我们有必要以公民运动施加压力，以便形成全人类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声音，从而建立民主和和平的治理秩序。

首先要消灭战争。没有和平，发展、团结友爱都无从谈起。

我的童年是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度过的，随后经历了反对殖民战争，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再后来是法国总理为结束新喀里多尼亚内战而进行的谈判。所有的经历都告诉我，选择战争比选择和平要轻而易举。

这个结论看似令人惊讶，但我们中间有谁敢说这样的话：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响枪了，情况改善了。我们说不出来，无论在哪里。

与此正相反，在世界各地，每当社会的、贸易的、领土的、语言的、种族的、宗教的冲突爆发的时候，最直接、最简单也最令人热血沸腾的做法是拒绝谈判、是炫耀武力、是宣称强硬到底。可什么叫强硬到底呢？无非是血流成河。于是大家头脑发热，满怀激情地走上战场。在暴力中，大家都知道好的一方是自己，坏的是对方。战争真打起来不易，可作出要打的决定并不难。选择和平反而是难事。

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有点智慧，因为智者明白，武力什么也解决不了。他追求和平。

要追求和平，就得承认对方和自己是平等的，不管对方的信仰、语言和肤色要和谈，就得了解对方，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痛苦、它的信仰、它的诉求。要和谈，就要共同做出牺牲，没有利益或信仰的妥协就没有和平。

为了让和平扎下根来，我们就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相亲相爱。

我的朋友们，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军校，可没听说有和平学校。也许创建一所和平学校该成为我们这次大会的目标之一。因为如果我们要相互了解、共同工作、共享文化和价值观，就必须学会谈判、学会协调、学会重建、学会和解，这些都是必要的技能。

400 年前，当我国的国王亨利四世结束宗教战争的时候，他为了让两大教派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公正的对待，进行了司法改革。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结束后，一个受联合国支持的勇敢的非政府组织做的第一件善事，就是建立一家广播电台，专门宣扬合作精神和宣传相互和解的事迹。二次大战结束时，德法两国的历史学家共同编纂了两国的冲突史。在南非和柬埔寨，当暴力终于结束，和平终于降临时，人们制定宪法，医治创伤。当巴以和平进程终于重启的时候，人们也都知道这要从水资源的共同治理开始。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大会也可以呼吁卢旺达、柬埔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北爱尔兰、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都一起编写这种和解性的历史教材，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历史中不再学到仇恨。

然而，我的世界公民朋友们，请不要忘记，无论世界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发生战争，当冲突升级时，寻求和平的人总是难免以人民伟大事业的叛徒面目出现。我们需要承认，并使大家都接受这一点：妥协是高尚的。和平比战争更需要勇气。

如果各国领导人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则一切皆有可能。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在南非，休姆在北爱尔兰，西哈努克国王在柬埔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则开始在中东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应对挑战首先就要建立信任。为了避免由人为活动造成的气候灾难，国际社会正以 1989 年签署的海牙条约为基础积极行动。24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了这项条约。他们并没有征求各自政府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不会同意。他们签约纯粹出于相互信任。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我们各自国家的领导人都成为倡导和平的人。

(米歇尔·罗卡尔：2001 年 12 月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发言，in *Rétrospectives et perspectives, société civile chinoise et société civile mondiale en construction*, coordonnée par Yu Shuo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Catherine Guernier, 2003, pp. 181-182)

“地球祖国”意识

我今年年方 80，就是说我比我的朋友，也就是在座的这位施蒂法尼·海瑟尔(Stéphane Hessel)要年轻多了。

当我 20 岁的时候，法国被侵略者占领了。我当时参加了抵抗运动，我个人因此冒了很大风险，不仅如此，当时的局势还很不乐观，要知道那可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前。所以我们不仅要面对危险，还要面对不确定的战争前景。我们抗击敌人所凭借的不仅是勇气，我们所捍卫的价值也给了我们力量。这个价值就是要使普天之下的所有人都有表达与批判的自由，自由就像氧气，就像面包一样微不足道，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价值。而一旦我们失去了，自由就变得闪光、变得迫切、变得不可或缺了。也就是说，抵抗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我们要抵抗所谓的全球化吗？当然要。但必须是为了普世的价值。那要不要为了更美好的全球化奋斗呢？当然更要，我觉得近十几年来，一个“全球社会”呼之欲出却又难以成形。任何社会都得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而这个全球社会的地盘就是整个世界。我们得有一个交流的网络。而我们现在拥有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快捷、多元的交流方式。我们也需要世界性的经济来支撑这个社会，可惜现在的世界经济既无规矩、又无节制，甚至没有方向。一个社会需要一种法律体系来维持，而现在的全球社会却只有法律雏形。一个社会得有社会保障，而在全球社会担负保障之责的联合国却虚弱不堪。为了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威胁，我们开了很多会议，比如最近在京都的会议，但是会议成果无法生效。我们的社会固然缺乏法律，也没有制度，但更缺乏的，是灵魂，因为如果没有对共同命运的意识，一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事实上，这个命运共同体是存在的。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比如核威胁、细菌威胁、生态威胁。我们也有共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调整和引导我们的经济。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是在灵光一闪间意识到同舟共济的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祖国”这个词本身就是共同体的意思。法语中“祖国(patrie)”这个词以代表父亲的词首“pa”开头，而以代表母亲的阴性形式结尾，所以我们才总说“祖国母亲”。更何况我们都是地球的孩子，这个地球囊括了我们所有人的祖国，而我们却没有以地球为祖国的意识。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拥有丰富的文化，而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世界社会，为了爱护我们共同的地球祖国。

(爱德嘉·莫兰：2001 年 12 月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发言，in *Rétrospectives et perspectives, société civile chinoise et société civile mondiale en construction*, coordonnée par Yu Shuo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Catherine Guernier 2003, pp. 179-180)

教育是促进观念转变的首选方法

21 世纪的世界将经历观念改变，伦理变迁和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教育变得至关重要。教育要承担起移风易俗的责任，教育系统自身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不少大学有关教育改革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了大家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教育内容的改变和公平的入学机会。这两个问题，我们在有关生物圈的讨论中已经提及。

用公务员和国际性公共组织的话来讲，改变教育内容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能够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教育”。

其实，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树立观念，而非积累实用知识。这一点很多小组都有共识：居民组认为教育要“发展孩子的创造力”，宗教与哲学组认为要“倡导宽容与开放的伦理价值”，青年组认为要建立“文化交流和普世价值并重的，塑造有能力和有责任心的个体”，军事组认为要“增建和平学校”，居民组还认为要“为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大计办教育”，非政府组织组则倡导“公民教育”。

其它一些组还认为办教育的思路要更融会贯通一些：教师组认为“要在跨学科的学习中获取知识”，青年组认为“教育体制要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间求得平衡，而且要贴近客观环境”，地方领导组认为教育要“尊重历史，保护环境”。

(皮埃尔·卡蓝默：21世纪议程草案，选自2001年12月2-10日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建议书)

浪漫与雄心

要谈首届世界公民大会当然要谈它的浪漫、它的远大理想、它的勇气、它的智慧和它的果敢。在长达 15 年的筹备过程中，我们联盟的中外成员勤奋工作，成功推进并深化我们的事业。他们完成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创举，动用了基金会的全部资金手段，同世界上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发展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马耶基金会的工作主要围绕 7 个主题展开：“发展属于农民的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地球的未来”，“超越文化交流”，“反对社会遗弃”，“国家与社会”，“建设和平”。15 年来，我们联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地球的未来”小组。

在辩论中，各国代表几乎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一些基本矛盾：人类快速增长的科技能力和道德伦理滑坡间的矛盾，强烈的物欲和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每个讨论组都有他们各自的伦理标准，最初审议的宪章叫做“世界伦理宪章”，后来我们发现“伦理”这个概念并不好懂，且很局限，所以把宪章改成了“为了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宪章”。

因为来宾们思考的问题太严肃太激烈，为张弛有度，大会组织者给大家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几乎每晚都有冷餐会和鸡尾酒会；主会议厅外的大厅里更是歌声不绝于耳。另外大厅的背景也很别出心裁，不知是非洲还是南亚的艺术家用草绳编的，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当然是现代艺术的手笔，但更是为了与我们大会的主题相呼应，那就是平民性。

(张炜，责任、理性和浪漫)

入他者之境

如果用人类学和现象学来检验首届世界公民大会，那它应该算是及格了。这是划时代的历史实践（在这里实践是实现跨越和获得知识的先决条件）。世界公民们通过大会自由交流。大会的成功证明，公民世界有能力冲破现有的结构阻碍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大会还试图寻找人类普遍信仰的价值观。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是它让原本无缘见面的人们共同工作，并通过相互间经验的交流实现“入他

者之境”，最终阐释了“只此人间”的含义。

我们还是回头看看“我们”和“你们”这两个概念，这很有必要，因为自创世以来，思想、艺术、男女、经济、居住、国家、敌我、善恶等等之间的界线还从未像今天这样的模糊。肤色、种族、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没有明确的界限。到底谁是谁呢？最高权力承认呈现出双重主体性，且越来越明显。每个个体都可能在内部或外部属于某个晦涩的世界，从而“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个体只成为一个整体）。尼采认为这种“成为”体现了自我战胜的愿望及其实现：“没有主体，只有行为，也就是创造，没有理由也没有后果的创造性。”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将无限的“成为”过程描述为“从生存过渡到经验生活的过程”，这是一种在“超越”或“内在”过程中的主观放逐。通过批判，渔夫变成了鞑靼紫菀花的嫩芽，而他也意外得体验了另一种生活。他在变成嫩芽的同时也失去了双眼，可其实他的双眼正从高高的树梢注视着他。

由此我们进入到另一种思维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我”和“他”被截然分开。我们也由此进入到一种主观的时空交流中，在这种交流中，“我”和“他”（我们把设身处地的进入他人的角色称为“他”）相互混淆直至融为一体。文化相对主义所说的“完整的他者”早已支离破碎。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们永远无法组织这种融合的进程。

（于硕，追求人道-里尔世界公民大会实录）

当代文明的艰难探索

我们常把历史比作一条大河，因为历史的进程就像河流般湍急、蜿蜒曲折和连绵不断。但河流有河床，它从源头延伸至入海口，而河流也很少漫延到河床外它就沿着河床滚滚流入大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历史事件也都沿着一定的轨迹前进：历史上的每一步都是无前例的，而这每一步又给下一步埋下伏笔。但通过对过去的反思和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历史长河并不完全如上所说，遵循着预先定好的方向流淌。当人类经历一种道路，或者一个变革的时代的时候，它的轨迹是慢慢显现的，如同河流的改道，猛烈而又不确定。而“全球化”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赵佚峰, 当代文明的艰难探索 - 人类责任宪章评点)

中文将“Charte”称为“宪章”，这两个字包含有一种强制性和规范性的道德。而在英文和法文中，这个概念代表一种明确的规范，这种规范以每个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前提。“人类责任宪章”是希望每个个体承担起与它的命运、处境和操行息息相关的责任。这一类宪章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的进步，以及这些进步带来的挑战已经把我们引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能以人类现有基本理念为基础，审视过去，从而建立一个能获得世界上大部分人支持的道德体系，那么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将无可挽回的被摧毁。

这样的—个文件不能由少数人制定；如果没有多数的认可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它应该反映世界公民运动的普遍愿望。这个文本的传播、讨论和修改反映了这样一种美好愿景，即保持人类兄弟姐妹间的亲密关系。制定宪章的想法是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于1995年提出来的。1999年，经过来自欧、亚、非、拉美各国代表的多番讨论，“人类责任宪章”的第一个草案终于发表到了1999年和2000年，草案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付诸讨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领域的人士纷纷献计献策，以完成最终文本。在考虑了多方意见和建议后，新版本于2001年出炉。2001年秋季，—个小型的国际语言专家理事会在希腊的锡洛斯岛开会，主要是从各种角度讨论新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从而重新调整用词。

（赵佚峰，当代文明的艰难探索 - 人类责任宪章评点）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中文版宪章仍不脱英法文版的影响，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没有大的变化。这么说的主要理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责”的概念。而“天下”即世界的概念则出现更早，这个词强调了个人和集体的责任，且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这个宪章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制定，反映的主要是现代西方理念和中国近年来的思潮，它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回顾，这一点在许多评论中都有提及。

[…]

卡蓝默先生的文章《破碎的民主》反映了当今的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欢呼民主的胜利，可民主却已支离破碎”。他以批判的精神指出了当今各国的演变和局限。如今的国家往往把公共职能委托给小型的、私人的、非政府性的机构，甚至请大型国际机构联盟参与国际会议，因此，如今这些国家的政府已不再是公共生活的可靠保证。大型跨国企业依仗着巨额财富和摆布人类命运的权利，摧毁了公共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应该重新加强公共权利并重新思考公共生活的新型“治理”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体系恰好与托勒密（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体系中最新的阶段相吻合”。

（赵佚峰，当代文明的艰难探索 - 人类责任宪章评点）

世界公民大会初论

2001 年 12 月 2 日至 10 日，世界公民大会在法国里尔召开。来自五大洲 125 个国家的 400 名代表齐聚一堂，其中有 40 多名代表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次大会，我想就以下几点谈谈它的特殊之处。

这次大会的第一个别出心裁之处在于它的组织模式。尽管这次会议称为世界公民大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独立的，它不属于联合国，不属于任何政府、跨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它是一个世界联盟的劳动成果，这是一个团结的、负责任的、多元的集体，而其真正发起者为巴黎的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之所以说这次大会是非政府性的，是因为尽管它和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担负同样的使命，但确实有独到之处：它致力于促进更为健康的全球化，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并保障人权。它试图发起辩论、开展对话并建立共识。“九·一一”事件后，这种对话、交流、促进和谐的愿望显得既合理又迫切。

大会的第二点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内容本身。大会组织者们认为，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大势是由两大柱石支撑的，其一是世界人权宣言，其二是联合国宪章。这两大文件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尊严、保障人权、促进和平与发展，而当今世界日新月异，这两个文件已经无法适应新局面，应对新挑战。

(陈彦：为人类价值体系树立第三根柱石)

新模式的一线曙光

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

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访谈录

2002年1月

[法国] 金丝燕

金丝燕：我自1996年以来一直参与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工作，2001年12月参加了在法国里尔(Lille)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我有时自己问自己到底是处于一个历史进程还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模式之中？对于只经历过20世纪那种不容置辩的“非是即非”式的、排他性、淘汰性，甚至极权性(这并不局限于共产党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我来说，我为这种也许即将诞生于我们地球上的新的社会模式感到高兴，并受到鼓舞。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皮埃尔·卡蓝默先生，您作为这种模式的创始者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模式？您的介入的动机又是什么？

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我毕业于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拥有路桥总工程师职衔，曾在法国政府装备部担任过二十年法国人所说的高级行政官员；我之所以走上这一道路，是因为我历来对社会管理问题感兴趣。70年代时，我曾任法国北部一个大区的装备局负责人；当时这一地区正面临痛苦的产业转型；我意识到这种转型也意味着一些将需要很长时期才会产生的文化和制度变化。我在我的《可能的使命》这本书中所谓的“时差理论”的发现便由此而来。在我们这一同时是社会文化、生态和技术系统的复杂社会中，社会变革因科学技术转变而愈来愈快。但是，思想、价值、教育体系以及一切政治与社会调节机制的演变却要缓慢得多。于是，便造成一些深深的不平衡；因为我们试图用昨天的思想来思考明天的世界，并使用前天的制度机构来对其进行管理。

在80年代，我逐渐明白：这一从一个法国特定地区的产业转型中观察到的时差状况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更为真实；从长远看，这将使我们遇到一个致命的风险，而愈演愈烈的生态失衡便是一个明证。我们依然若无其事地行事、仿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会自然导致人类的进步，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发现科技也可能带来灾难和失衡。我们依然依照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前产生的观念行事，仿佛仅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便足以对全球化的现实进行管理。

然而，恰恰正是不能再以国家作为尺度和范围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于1988年放弃升任全国城市规划司司长的机会，离开了国家公职部门，全身心地投入了我原来已任董事的夏尔—雷奥波·马耶基金会的工作。因为，象基金会这样的独立空间极为必要，尤其是为了促进——哪怕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这一业已成为人类当务之急的思想和制度的重建。

金丝燕：“建设一个负责、多元与团结的世界”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存在已近十五年；这十五年大致可分两个时期：1986—1993年联盟诞生前夕时期和1994—2001年联盟存在的第一阶段。1988年，法国维芝莱(VEZELAY)小组发出支持“全球三级会议”的呼吁。这一“三级会议(ETATS GENERAUX)”的想法即是联盟的起因。您能不能就这一想法和这一事件给我们作些说明？

皮埃尔·卡蓝默：1987年，我向维芝莱小组提出了这一地球“三级会议”的想法。它的参照是一个法国历史事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迫于难以解决的财政危机，于1788年召集了全国三级会议。这曾是一个古老的解决危机机制：由国王召集一次代表社会各不同等级的显贵会议，作出特殊决定。1789年全国三级会议召开。社会各界的代表分成三个等级：贵族、教士以及事实上代表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所谓第三等级；而前两个等级所代表的则是政治、军事和行政权力。全国三级会议使第三等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严峻地发现国家组织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法国大革命便由此而爆发。当然，“三级会议”这一想法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的革命性以及相关的暴力和绝境，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遇到危机形势时，必须使社会不同有生力量依照不同于社会平常管理的方式进行对话。然而，1987年时，维芝莱小组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目前发展模式的失衡与绝境的初步分析。该分析使我们坚信21世纪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动，但是，思想体系、制度和既成权力尚未作好设计与领导这种大规模变动的准备。在同一时期，1992年里约全球高峰会议已开始筹备，我们意识到那最终不过是一次国家间的会议，尽管有其意义，但还是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全然不同的做法，即仿效两百年以前，也即1788年发生在法国的史实，召集一次全球范围的“三级会议”。这便是“全球三级会议”想法的由来。

金丝燕：这一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使我想起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从二十年代起就在社会运动中采用的做法。人们可以认为这一法国式的方法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似乎也是联盟的方法。您觉得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是一种能使社会不同阶层与其它阶层的分析和前景进行对照的方法？或者说，它是否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哲学前景，即：与萨特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人”不是地狱，而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它是否意味着答案不在自己本身，而在他人？如是这样，那么“本身”的角色又是什么？

皮埃尔·卡蓝默：“三级会议”的想法包含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层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和较量。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具体表现为各地起草的“陈情书”。如运用至全球范围，这一想法则意味着必须从当地情形出发，把握当代社会的各种挑战和差距。自上而下的关于全球化的唯一真理是不存在的；只有每个社会对其自身转变的理解以及每个社会对其自身被愈来愈全球化的技术、文化、生态和经济转变所贯穿的方式的把握一个体系愈是复杂，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则愈是关键。而这些关系又只能以其当地的具体形式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总是强调对社会及其问题进行地域性探索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应当学会“用双脚思想”。80年代曾在非政府组织界流行一句表达世界相互依赖现实的很得人心的口号：“从全球思考，在当地行动。”我认为这口号很不足，甚至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由谁来代替我们从全球思考。我觉得差不多该倒过来说才对：由我们依照自己的现实从当地思

考，以达到在全球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转变将是全球规模的。至于不同阶层间的对话，大革命前的法国是透过全国三级大会的贵族、教士和资产者这“三个等级”得到体现的。而思考全球三级大会，则应扩大这一视角：社会由非常多样化的社会与职业阶层构成，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可赋予一种与其它阶层极少对话的特殊的目光，特殊的观点。我甚至可说得更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远距离通信系统的发展，某些阶层内部的国际对话愈来愈频繁，但不同阶层间的对话却相反愈来愈少。这便是我所说的“琴管式社会”：每一琴管是一个国际范围的阶层，但琴管与琴管之间的交流却不存在。因此，在后来成了“建设一个负责、多元与团结的社会”联盟的框架中，我们提出一项世界性的倡议，尤其是建立包括从艺术家到农民、从军人到宗教领袖、从工会活动分子到企业家的各种社会职业会议团体。每个阶层拟从全球角度形成其观点，并承认在对付共同挑战中应担当的责任。这是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对话的先决条件。没有哪一个单独阶层拥有解决方案。普通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经常建立在这些阶层之间的纷争之上，因而，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分歧，例如：雇主与工会、国家与公民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某种类似于冲突和战争逻辑的支配，各自不是把其观点简单化，便是声称垄断真理。如同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在世界公民大会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战争方案总比和平方案来得简单，而接受与他人对话、承认他人的需求、承认他人拥有的真理、与他人一起寻求共同因素，这些都是建设和平的基本要素。然而，如果我们不为主导 21 世纪的伟大和平计划而作转变，那么，这些转变将通过对人类必将是致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强加给我们。除和平之外我们别无他路，就象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那样。欧洲建设首先并不是一项经济发展计划，而是一项和平计划。我们躲避不了人民和阶层之间的对话。

（金丝燕：卡蓝默访谈，2002 年）

IX. 世界集体问题思考中中国的声音
-世界 APM 网络与中国公民亮相海外

世界 APM 网络

这是一种理解世界、展开讨论、提出建议并进行培训和动员的方式。

从 1993 年开始，APM，即农民农业、食品和全球化网络逐步建立起来。1993 年 9 月，我们在法国拉尔扎克召开会议，来自中东欧、西欧、非洲（非洲 APM 网络）和拉丁美洲（RIAD）的 20 多名代表与会。当时各大洲的 APM 网络才刚刚建立。大会明确了网络的主题：世贸组织和区域一体化、土地改革、自然资源治理和农村基层组织。与会代表通过这次大会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开始建立起相互信任。

国际工作组的会议也由此启动。在此后的几年里，国际工作组会议陆续召开涉及的主题有：农民组织建构、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挑战、转基因食品和食品安全。以国际性视角思考问题、交流思想和提出建议的方法在很多国家取得了实效，由此及彼地展开了新讨论，并找到了各自关心的议题。从 1996 年开始，中国朋友们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国际网络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听取不同意见，了解其他国家经验的好机会。他们对转基因食品、世贸组织、乡村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农村发展方式等问题尤其关注。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由此意识到食品问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之中有些人回国后在政府部门任职。APM 国际网络也让越南和墨西哥的代表有机会交换观点，他们就一系列农村问题和在许多国家盛行的生产本位主义思想交换了意见。非洲国家通过 APM 网络从拉丁美洲和欧洲汲取了有关土地政策的经验。而拉美则在欧盟建设中看到了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成果。通过对比，拉美国家对区域一体化有了新的理解。区域一体化不仅扩大了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在政治、社会、环境方面加强治理，进行调整的过程。

某些情况下，该网络能给某个国家提供从整体上了解国际社会建设成果的机会。比如 1998 年的国际研讨会就让巴西了解了很多土地改革和土地治理方面的经验。巴西方面动员了工会和政界的许多要人与会，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世界 APM 网络的会员。1999 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该网络在食品问题上的贡献功不可没。2001 年 9 月古巴举办了食品主权世界论坛，APM 网络在论坛筹备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巴论坛中产生的许多思想和建议被汇总并结集成册，建议册主要录入了有关以下问题的讨论：可持续发展、土地问题、转基因食品风险、营养问题、国际贸易治理以及渔业问题。

APM 网络在多年工作中同世界各国人士建立了联系和信任，正因为如此，1999 年西雅图世贸峰会上，它才能起到了联络和牵头作用。在这次峰会上，由若泽·博威 (José Bové) 领导的农民同盟（法国）和许多 APM 网络的会员都在国际媒体上发表了言论。

APM 网络也是 2002 年 5 月雅温得世界农民会议的筹备者之一。这次会议为各大洲农民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信任的逐步加深，也就没有这次会议。

评点：

APM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关心食品和农业问题的国际网络。它活力四射，是人类基金会未来工作中可以依靠的好助手。

(皮埃尔·吴翰、弗朗索瓦丝·马塞、安杰拉·奥尔多奈
APM 网在中国 - 对社会政治的弹性适应，
fiches_dph_sur_le_reseau_apm_et_la_chine
[[.sxw](#) (15 ko)])

中国人发现农村组织问题

中国人一向把农民组织问题看作战略问题。事实上，他们认为农民组织可能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农民组织也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同义语。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人还高度关注着这个问题。他们过去倾向于把农民组织看作与中国政府作对的集团。而现在中国存在的所谓的农民组织其实是完全从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有自己的创意和活动的群众性农民组织并不存在。从1996年开始，APM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联系，也结识了中国农业系统的要人，尤其是陈越光先生，他是《中国农民》杂志的创办人。陈先生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很感兴趣。由此开始，我们陆续邀请了许多中国APM网络的会员参加国际会议并考察各国实际情况。特别是在1996年罗马食品峰会上，中国会员了解了国际民间社会和各国农民组织的现状。我们和许多APM国际负责人一道，多次向中国朋友强调构建农民组织的重要性：由于农民相互隔绝，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家的农业生产上，因此农民组织就成了他们表达想法、抒发愿望以及与政府当局对话的重要渠道，并有利于政府部门调整相关农业政策。在整个农业生产链中，农民可以通过农民组织处理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并生产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农民组织的建设是民主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加强和稳固民间组织有重要意义。中国朋友们在罗马了解到了国外农村的实际情况，在罗马之前的喀麦隆也受益颇丰。法国马延省举办奶酪沙龙期间，他们也体会到了农民组织在法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中国朋友还考察了当地合作社。在APM组织的巴西卡斯卡韦尔会议和里约热内卢土地改革研讨会上中国朋友们了解了无地农民组织的情况，感受到了拉美农民组织的巨大能量和他们思考问题、提出建议的能力。1997年和1999年，来自墨西哥、巴西和非洲的农民组织负责人抵达中国。他们参观访问、出席会议、提出了让中国APM会员颇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农民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杨参加了一次法庭对农民联合会几个负责人的审判，见识了农民组织与国家及司法部门的交锋，这几位农民领袖曾带领游行队伍拆除了米悠的麦当劳餐厅。之后不久，中国的农民组织负责人参加了RIAD网络组织的大洲会议，了解了巴西和南里奥格兰德州多样的农民组织。1999年中国APM代表团参加南非CAP大会，一项有关于全球化环境下农民和原住民组织的联合研究计划也由此启动。CIRAD网络、CIEPAC网络、APM非洲网络、RIAD网络也由此开展了一项全球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要让农民组织领导者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并通过改良组织、培养领导人才、公关宣传、组织建构、建立联盟等方式适应这种潮流。中国朋友们也参加了这个项目，负责调查中国新兴农民组织现状。调查有的以一个省为范围，考察组织的总体状况，有的以一个小地区为范围，了解更为细致的情况。调查报告的英文版于2002年10月面世。中方也组织代表团参加了2002年5月在雅温得举办的世界农民大会，团员包括一名农民和一名基层技术人员。从此以后，中方负责人就把农民组织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看待。目前中国的农民组织大都还在地方一级，主要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并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另外，某些人把村民自治组织也看作农民组织，但在我们眼里，它们更像乡镇小团体，尽管它们和欧洲国家的同类组织不一样，它们不担负教育职责。

中国有9亿农民，建设农民组织任重道远。农民组织一方面可以维护农民权益，另一方面可以用以探索可持续的农村发展道路。总体上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民组织是民主的支柱之一，它可以避免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可能爆发的危机。

评点：

APM网络所作的工作和它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让中国合作者受益匪浅，在农业问题上给与了他们极大帮助。由于该网络的努力，中国的许多代表都开始重视农业问题。中国APM网络的负责人大多担任公职，有农业部的官员，有的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外还有许多国家级机构的学者。无论是眼前还是将来，他们都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皮埃尔·吴翰、弗朗索瓦丝·马塞、安杰拉·奥尔多奈
APM网在中国 - 对社会政治的弹性适应，
fiches_dph_sur_le_reseau_apm_et_la_chine
[.sxw (15 ko)])

世界社会论坛-建设民间社会的新模式

世界社会论坛于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创立，人类进步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论坛的积极参与者。世界社会论坛的理念是：打造一方开展对话、倾听建议、进行辩论、促进团结和制定战略的空间，但同时不强求所有参与者持相同立场。所以每年论坛闭幕时都不发表宣言。我们同论坛发起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互信，这种关系使得我们的建议很容易被采纳。基金会不仅参加了2002年1月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也参加了在印度、欧洲、阿根廷、巴勒斯坦（筹备中）等地举办的洲级和地区级论坛。

居斯塔夫和皮埃尔·吴翰从 2001 年 4 月第一届论坛起就是世界社会论坛国际理事会成员。

2001 年首届论坛时，许多讨论组的负责人都把它当成一次推动建议书编写、就建议进行讨论的好机会，论坛与会者的旅费和住宿费或自理，或由马耶基金会以外的机构资助。马耶基金会负担了 60 多位联盟成员的差旅费，同时对数位 AVE、APM、PAX、DPH 等项目的合作伙伴给予了资助。许多农村的乡镇领导也借此机会筹谋，谋划召开世界农民大会。大会会址最初定在巴西，后来改为雅温得。本次世界社会论坛对哈瓦那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在马耶基金会及其协作网络的支持下，我们用来自世界各地的 550 块或雕刻或彩绘的石头为“世界公民马赛克”奠基，以具体的形象显示了跨文化精神，这项活动将首届论坛闭幕式推向高潮。马耶基金会的许多盟友都到场助兴，他们来自亚、非、中欧、以色列、巴勒斯坦（尽管只是象征性的）各地，大大提高了论坛的国际化程度。记者们、巴西的论坛主办者和广大公众对此深表欣赏。马耶基金会及其盟友的积极参与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因为基金会的宗旨契合主办者的愿望：就建议展开讨论、把与会者按主题分组、让论坛和文化挂钩。

由于里尔大会耗资巨大，基金会财政相对紧张，所以 2002 年世界社会论坛上，马耶基金会及其盟友的参与规模比较小，但参与规模并不妨碍参与价值。论坛举办了多次座谈会和研讨会，集中讨论团结经济（ECO 项目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原则和价值问题（在相关研讨会上人类责任宪章得到了广泛宣传），另外，食品主权（这是一次宣传哈瓦那世界论坛的特别会议）、艺术和文化多元性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里尔世界公民大会的建议书得到了大力宣传，每个会议的入口都张贴了印有其主要建议的海报，专门的展台也设立起来，与此同时，又有 400 块石头加盟“世界公民马赛克”，这成了论坛的一个标志。记者们则拿到了一份联盟建议资料汇编。北部-加莱海峡大区议会的代表们还在阿雷格里港组织了一次会议，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列席了此次会议。

2001 年年底以来，马耶基金会成员和其合作伙伴们就开始积极参加各洲级和地区级论坛的组织工作，并筹备了 2003 年 1 月在阿雷格里港召开的第三届论坛。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 1 月我们在印度启动了社会论坛印度理事会会议，我们的老盟友悉达多（Siddhartha）也是此次会议的倡导者。同样，联盟对阿根廷社会论坛的筹备也大有帮助，该论坛于去年 8 月在阿根廷召开，组织者罗拉·马斐（Laura Maffei）积极使用了联盟资源，联盟也为这次论坛创办了网站。我们还积极参加了 11 月在佛罗伦萨举办的欧洲社会论坛，参与形式如下：

* 主持或参与 5 个研讨会：世界治理研讨会（皮埃尔·卡蓝默），地方保护、排外主义和失业研讨会（马丁娜·姆耶 Martine Muller，郝日·文戴奥特 Roger Winterhalter），欧洲人类责任宪章研讨会（阿德里安·斯韦斯 Adrian Civici，伯努·德海纳 Benoît Derenne），团结经济研讨会（欧洲网络和社会经济组成员劳伦·福海斯 Laurent Fraisse，菲利普·阿姆 Philippe Amouroux），食品、健康和土地研讨会（欧洲 APM 网络成员皮埃尔·吴翰和弗朗索瓦丝·马塞），桑德罗·古丽亚（Sandro Guiglia）和玛耀拉（Manola）参与了世界治理和欧洲人类责任宪章两个研讨会。

* 推动各研讨会和讨论组编写建议书。

* DPH 项目（人类进步对话）（韦拉迪米尔 Vladimir，姐沙 Dasha，克林迪纳，

Cristina 和经过培训的意大利学生)。

- * 组织 ECLM 展台并编写建议书 (部分建议书和主要文件被译为意大利语)。
- * 为某个意大利非政府组织教授编写工作总结的方法。

马耶基金会的成员们参加了论坛的各项活动。与此同时, 他们的参与也使得基金会各个领域的活动, 尤其是联盟、APM 网络和团结社会经济中心更为人所知。

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社会论坛及其地区论坛虽然冲劲十足, 但仍很脆弱。与会的团体、网络和协会来自不同领域, 可谓多元, 但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代表仍十分有限。同时论坛的资金也显得颇为捉襟见肘。论坛涉及的领域虽然在日渐增多, 但某些领域的代表: 如企业家、军界和宗教界人士, 依旧很少甚至从未列席会议。世界社会论坛的各研讨会基本上是在重谈建议书中提到的话题。论坛的组织者们目前的最大愿望, 就是开创百家争鸣的局面, 大开放便之门广纳各路意见, 并就建议本身以及建议如何实现展开辩论, 力图在论坛的各项活动中融入文化因素。但目标和现实之间仍有差距,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 马耶基金会及其盟友可以鼎力相助, 这也是大家的希望 (参见 2001 年和 2002 年的经验)。目前的很多论坛, 尤其是世界社会论坛在工作方法上还有待改进。虽然如此, 这些论坛依旧是重要的国际聚会场所, 是新兴的国际民间社会探索前途的重要手段, 是发动年轻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机会 (比如 2002 年的青年论坛就有超过一万人参加)。除了世界级和洲级会议, 许多国家级和地区级论坛也在定期召开。

马耶基金会为这些论坛注入了活力, 它的贡献有:

- * 在论坛中宣传建议书和人类责任宪章。这些论坛有数千代表和记者参加, 因此这种宣传效果极佳;
- * 向各论坛传授先进的组织方法, 这对它们改进讨论和提高建议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某些研讨会采用了 DPH 和我们开发出的其他一些方法, 如电子论坛治理法、图示法和备忘录管理等。
- * FPH 主题组的主持人参与到论坛的讨论当中, 大大提高了讨论质量;
- * 推广革新观念和创造性做法。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以便进行真正的跨文化对话这种观念不太被人注意, 但对开展讨论却有决定意义, 因为类似论坛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容易受不宽容和排他观念的束缚。我们的参与恰恰可以使论坛更民主更尊重多元文化。在我们看来,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 * 致力于打造开放和多元的民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 不同的想法和建议可以针锋相对; 多样的计划可以实施; 各种联盟可以形成和发展。但这个空间, 同许多其他空间一样, 还很脆弱。当今世界, 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危险激增,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认识到避免模式化和封闭化的重要性。世界社会论坛恰恰是一个反封闭的空间、可以维护开放性。

(居斯塔沃·马林、菲利普·阿姆、弗朗索瓦丝·马塞、玛耀拉·嘉代、理查德·贝雷斯、皮埃尔·吴翰、韦拉迪米尔·俞加尔特：马耶基金会参与社会论坛：回顾和前瞻，n° 20 248)

中国对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 (2001-2002)

会议 25 日开幕。APM 网络会前进行了三天的巴西农村考察。这是 APM 网络的工作方法，在会前进行考察，摸清情况，带着问题开会。考察有中方代表参加。我因为大学有课，只赶在会议开幕才到。

代表告诉我考察相当艰苦，清早出去，晚上十点回来，晚饭都来不及吃，一路颠簸得要吐。这一点不奇怪。我们 96 年在喀麦隆考察，98 年在南非考察，都十分艰苦，不仅没日没夜，而且不是挨雨浇，就是受荒漠里飞车的煎熬。在中国的两次考察，由于中方严格遵守用饭时间，前面有警车开道，没有太受苦。在国外，只有国家元首来访才用警车，但不鸣笛。

APM 网络的代表考察了无土地农民运动。我在 98 年考察过这个运动。运动的领导人士都是农民，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勘测富人拥有却荒置的土地，突然出击，当然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人力，把土地圈起来，在上面种地，建简易住房。最后通过与政府的谈判，由政府出面，买下这块已经圈了的土地，分给农民。我问过甘地多，什么是无土地？他从事的公民运动与无土地农民运动联系十分紧密。他告诉我，在巴西，农民拥有的土地在 5 公顷以下，都算无土地农民。这一点每次都让来访的中国代表听得目瞪口呆：中国农民只有 0,5 亩耕地，土改时，有良田几十亩的是地主，不少挨了枪毙。这些挨枪毙的中国地主要是在巴西只能算是无土地农民，可以搞比起无土地农民式的圈地运动！生存地点决定一切，这就是生命的荒谬之处。我问过无土地农民运动的领袖，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回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公民社会具有现代社会精神，对话而不对立。他们与世界非政府网络保持紧密的联系，从世界和本地区两个层面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行观察，分析，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讨论，思考，而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给社会公民和国家的决策人参考。协作替代了过去的推翻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思想，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大概只有军人政权或希冀通过政变夺权的军人还会偷偷藏有，说偷偷，因为这种血腥的革命思想似乎不再被人民和社会认可。

1 月 23 日与我同机的有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十余个成员，都是另一个项目“世界同盟”的合作者。次日到巴西。下了飞机，我们正等着出关，忽然右侧走来一个人，留着八字胡，人很精神。他过来和我前面的大高个握握手，又转过来和我握手。我才认出，他是法国农民反转基因的领导人，约瑟·博维 (José Bové)。去年夏天，法国南方法庭开庭判他，我们正巧在那里开会，见过面。那里

没有中国人，我们几个中国面孔大概比较显眼，被他记住了。

(金丝燕，蓝天下 - 和马耶基金会闯世界的10年)

石头书

会后大游行，天上一架飞机伴着下面的队伍飞行，飞机尾巴拖着一条标语：“世界不是商品”。游行者载歌载舞典型的巴西狂欢节风格。我们目送队伍离开学校，没有随队。大厅出口处露天大阳台上皮埃尔设计的石书吸引了我们。

石书是皮埃尔两年前开始的设想：在每一次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会议期间，用各国代表带来的石碑石块以及上面的题字，镶拼成一部石书，留在会议所在地，以记录公民社会的发展踪迹。主意受到皮埃尔所有朋友的支持。其中有法国雕刻家埃里克，他去年曾给中国桂林建石头桥雕塑。这次，有的会议代表带来有文字的石头，有的会议代表带来的是没有文字的石头：来不及刻。中国那一页石书上面是陈越光的题字：“公民，现代国家的因素，未来社会的因素”。这句话是临行前，小华想了很多办法才在大理石上刻成的。当时民工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我在国外，没有这个概念，信息传达过晚。我们APM网络其他国家的代表，不都有小华这样能力强的助手，所以带来的大多是石块，没有文字。

为了这些没有文字的石头，皮埃尔请两个雕刻家随行：埃里克和他的朋友，在会议现场现刻。他们从早上九点一直刻到傍晚。皮埃尔也加入，他很少参加会议，大多时间，或在刻石，或守在石书旁回答问题，接受不断加入的石块。神情喜悦，象守护一群他刚生出的婴儿。石书最吸引人，其他世界网络的代表和当地与会的代表也动了情，四处寻摸石头，送来。石书不断扩大。烈日、刻石的噪音和灰尘把两位雕塑家和皮埃尔弄得也快成雕塑了。

(金丝燕，蓝天下 - 和马耶基金会闯世界的10年)

中国参与世界社会论坛（2003）

从巴黎动身去巴西前，金丝燕送给陈越光一本书，说让他开会没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的名字叫《阿弥陀经讲解》。我心里想，越光远道从中国来，让他到巴西去念经，是不是有点儿舍近求远呵？

1月23日下午，一场近十万人参加的反战大游行拉开了第三届世界社会论

坛的序幕。这是一场既激烈又温和的集会示威。说它激烈是因为高音喇叭的尖叫声，示威者的呼喊声，喧天的锣鼓声不绝于耳；说它温和是因为持续五六个小时的游行自始至终不紧不慢，秩序井然，警察骑着马，前后左右袖手旁观。同一时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经济论坛动用了两千名警察、一千五百名军人，保护两千一百五十位与会者，军警加起来比开会的人还多，戒备之森严已经让人不寒而栗，雪山上零度以下的气温更使人寒而生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开幕词中把在伊拉克战争阴霾笼罩下举行的本届经济论坛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相比之下，波尔图-阿莱阁正值摄氏三十度的夏天，社会论坛自发的反战游行不仅气氛热烈，而且色彩斑斓，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各族人民的节日：身着鲜艳裙装的巴西少女，头戴草帽的巴拉圭少年，浑身插满羽毛的印第安土著人，草绳裹体的爱斯基摩人，围巾蒙面的巴勒斯坦妇女，外套坎肩的阿根廷男子，身披褐色长袍的天主教僧侣，模仿古巴英雄切格瓦纳一身戎装的拉美青年，还有裙子裤子一起穿的印度妇女……别说西装革履的人一个没有，就连像我和越光这样穿衬衫长裤的人都觉得有点儿不合时宜。放眼望去，反战的游行队伍中大都是年轻人，给人一种年轻人不好战，未来世界更安全的感觉。仔细想想，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上战场的不也都是年轻人吗？无论如何，这里的年轻人又唱又跳，搂搂抱抱，使人想起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要爱情不要战争”的口号。这些年轻人约摸有三万左右，大部分来自美洲和欧洲，他们在一个叫“和谐公园”的草坪上安营扎寨。这个“国际青年夏令营”是按照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建立的，年轻人过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尽可能打破种族、宗教、文化的墙，相互友爱，好像要以行动证明地球不需要战争也能转动。有一天开完会，我去参观这个夏令营。最让我惊讶的是和拉美青年用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也能交谈半天。那种感觉又像是对话又像是自言自语但他们的友善和关爱是不需要通过语言也能感受到的。遇到讲英语和法语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反战？一个来自圣保罗的女学生回答说：“我不只反对某一国对另一国动武，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以生命的名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一个哥伦比亚学建筑的男学生回答说：“反战就是反对美国的石油政策。因此反战也是一个生态环保的问题。”另一个学哲学的小伙子说（我忘记问他来自哪个国家）：“我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金钱逻辑，战争就是金钱的耀武扬威。”原来我总以为反全球化的人，年纪大的关起门来开会，年纪轻的在街上与警察对垒。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眼前决不是“垮掉的一代”，我们没有理由对年轻人失望，我们更没有理由让年轻人失望。（陈力川：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跨文化对话》2003年第12期，第127-141页）

甘地多（Candido）和奇科（Chico）坚信，
我们可以开辟世界级的、开放的讨论空间，
而且不发表最终宣言。
我也相信。这些想法非同寻常，它们是创新的发动机。
90年代的风风雨雨让它们更加成熟，
西雅图大会之后，
它们终于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的大潮，
后来这股大潮被称为，
“别样的全球化”。
2001年的世界社会论坛是里程碑式的集体行动，

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创造历史、推动历史。

(皮埃尔 吴翰，2001年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
论坛，选自《存在的碎片》)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是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与前两届反对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反达沃斯的口号相比，这个口号显然更具有建设性。连续五天的一千七百场大小讨论会、辩论会、圆桌会、讲座围绕五个主题展开：民主与持续发展；人权的原则与价值、差异与平等；媒体、文化与反霸权；政治权利、公民社会与民主；世界民主秩序、和平与反对军国主义。每个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论坛申请举办讨论会，组委会免费提供会场，并配备两位同声传译人员和耳机。邀请我们参加论坛的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就主持了几个讨论会，主题是“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具体讨论的问题有：“国家改革与社会协调管理的原则”；“农业、世贸组织、环境与人权”；“土地所有权问题与世界农民组织的合作”等等。

在讨论中，陈越光提出“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的联盟思想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延续，在哲学和社会变革方面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新的影响。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认同联盟思想与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精神传承，但也强调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几点不同。他说：一、我们不赞成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关于人类进步是直线式的，法国处在人类进步中心位置的说法。我们肯定不同文化的价值，而且将文化的多元性视为人类应当保护的共同财富；二、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国家主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我们质疑国家绝对主权的理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基点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人类共同体。我们认为国家不过是全球治理系统中的一个级别，因此应该有一个合法代表世界各大区的议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者普遍认为政府和政党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现在我们认为人民的利益无法由政府和政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处于一种公民自治的状态。面对地球南北之间、社会内部贫富之间、人与大自然的不平衡，公民社会有必要思考一个协调管理的整体方案。四、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科学和理性坚信不移，他们相信科学、技术与工业的结合将导致人类的进步。现在我们知道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科学主义的神话，科学技术应当重新回到工具的位置，其本身不能成为目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奉行谨慎原则：“在没有能力把握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当前或将来危险之前，人类社会不应当生产和运用这种产品和技术”，比如转基因。

听卡蓝默这么一说，才发现“联盟思想”的倡导者与18世纪理性主义的分歧还不小。不过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18世纪的法国人道主义者没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今天欧洲的人道主义者更具有文化多元的国际观。两代人道主义的变化也表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陈力川：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跨文化对话》2003年第12期，第127-141页）

一位中国农民研究员首次出国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之前我并不想离开中国，我觉得中国的问题都还没解决，何必去别处呢？

中国 APM 网络的谢先生希望我参加这次巴西会议。我和他合作了很久，是他最终说服我出国。但我的妻子并不同意，她觉得这会扰乱我们的家庭生活，因为此时正值春节，是合家团聚的日子。不仅如此，她觉得在一座城市待一段时间对我的研究不会有帮助：我每年都呆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才能搞研究。而这次我要去的地方并不是农村。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来了。

我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祖上也都是农民。我的父母，我的 4 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包括我本人，都是农民。

我能上得起中学，这多亏国家的补贴：一天 1 块 5 毛钱，相当于 1.5 法郎。有了这个补贴，我中午和晚上才能喝上菜汤。

1967 年我 12 岁，小学毕业。随后就回到农村干农活，一干就干到 1970 年。1970 年到 1974 年，我上了中学。之后再次回到农村当农民。1978 年我参加高考被历史专业录取。4 年后大学毕业，成了历史教员，教授中国现代史。又 4 年过后，我被调到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部。我关心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断钻研。我的工作离不开中国的农民。

那是在 1988 年，我下乡调查。原本只计划待 4 个月，可一转眼 9 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考察了农民的现状，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白天黑夜都跟农民呆在一起。

我的调查从一个村子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要研究真正的农民，那些还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而不是那些已经进了城的。我想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生产状况、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期待……

我的研究主要针对以下方面：

- 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
- 食品安全
- 农村的城市化
- 农村的工业化
- 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就中国农民问题发表了 8 部研究性作品。

要问我对这次巴西会议的期待么？我的回答很简单：

- 丰富我对农民的认识，了解世界各地的农民，既了解他们的生活，也了解他们的经历；
- 读了马耶基金会的宣传册以后，我深受 APM 项目的鼓舞，我想借鉴他们的经验；加强，或者更确切的说开始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 这次会议符合我的期待。头几天，我们访问了巴西农民，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还和农民领袖们进行讨论。

对于这次会议我有几点意见反馈：

- 1) 世界社会论坛深深地打动了。我以前从没想到农民有如此大的能量，能有如此高的组织程度，能在社会中起这么大作用。
- 2) 我越来越感觉到，农民组织，确切地说真正能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到谈判作用的农民组织太少了。我甚至想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创造有利于农民组织发展的环境。
- 3) 黑帮的闯入打断了新闻发布会，我被这一事件震惊了，他们竟能做出这

样的事来。

- 4) 我觉得大会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太理想。可能因为有来自 120 个国家的人参加，组织也实在不容易。
- 5) 与会者的工作态度以及思想的深度使我深受震动。比如阿尔诺就非常认真、非常有耐心地参与我们组的讨论。约瑟夫来自发达国家，却关心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权益保护。还有皮埃尔·吴翰和其他许许多多人都如此。讨论的时候他们是如此认真，与我们如此接近。法国朋友也一样，他们兢兢业业，这同别人对我描述的法国人形象大不相同。在中国时有人对我说法国人很浪漫但不够认真。这其实是种成见。
- 6) 皮埃尔的石书让我大开眼界，他让我看到他们在为理想而非为利益工作。那两位艺术家整天呆在露天里，在烈日炎炎下用双手把石头变成了艺术品。我深受感动。
- 7) 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条件多艰苦，要继续研究农民，跟农民打成一片。我的这个决定是认真的，我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农村，保护中国农民。

我已不再是以前那个人。这次大会改变了我。我的眼界更宽了，我想要了解国外的农民问题，我每天都在经历意料之外的事。之前我收到过很多邀请，希望我去美国或别的国家做短期工作。这些邀请当然和我的研究著作有关，但我从未回应过。经过了这次会议，听到了那么多想法，进行了那么多辩论，我现在非常希望与外部世界接轨，因为这个世界很近，很深邃，也很开放。

(冯至，选自金丝燕《工作总结和展望
APM 中国网 2001 至 2002 的活动》)

1300 块石头，或被雕刻，或被彩绘，
三届世界社会论坛（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的嘉宾把它们，
从 80 多个国家带到阿雷格里港来。

这些石头是社会间的纽带，
组成世界公民马赛克。
这想法很疯狂但却行得通，
从梦想到实现的过程，
充满愉悦与惊奇。

（皮埃尔·吴翰，选自《存在的碎片》，2003 年于阿雷格里港）

属于中国的光束

离开波尔图-阿雷阁的当天上午，我和越光利用闲暇去植物园参观。与喧嚣的论坛会场相比，这里显得异常安静，令人想起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词句“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走出凤梨科的温室，又来看仙人掌科的植物或许是受到无数花草品种的触动，越光突然说道：“金丝燕送给我的那本《阿弥陀经讲解》中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社会论坛的多元性：‘一室千灯，光光互遍，重重互摄，不相妨碍’”。

“一灯之光不碍众灯之光，众灯之光不碍一灯之光”，这正是参加本届世界社会论坛的近五千个组织“和而不同”的写真。然而，他们共同发射出的光芒正在照向全球。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在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几乎全面缺席。“中国正忙着与世界接轨。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的接轨已初步完成，接下来就轮到接反全球化的轨了。”在波尔图-阿雷阁机场的候机厅，来自西班牙的拉蒙教授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

(陈力川，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跨文化对话》2003年第12期，第127-141页)

中国代表团访印小结

我想先做个简短的小结，之后还会应中国16名与会者的要求作评估和详细总结。在这个小结中我会重申这次访问的目标和前景，回顾主要的行程，同时谈

谈中印双方对这次访问的初步感受。

访问主要围绕以下主题：

1- 多元农业。我们在浦那地区看到了非常多样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进行了三次参观：第一次在浦那东边的平原地区，当地农业有水渠和水井灌溉，发展了高附加值农业（甘蔗、葡萄、水果）和时鲜作物种植（蔬菜、花卉等），由于生产条件好，现代科技得以发挥作用，同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第二次到了更东边的巴拉马蒂地区，它地处高原，农田灌溉要靠雨水，因雨量很不稳定，因此常有严重旱灾，今年就是如此；第三次到了浦那西边丘陵地区的一个小谷地里，当地从事传统农业。以上三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各异，经济发展状态也存在很大差异。

2- 生产条件。具体包括：信息传播及推广；培训与销售；市场及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与农产品竞争性问题；传统生产单位的技术和结构；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生产制度。

3- 多种社会形态并存与严重的社会歧视现象。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层转型的村庄；私有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以及非政府性质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机构。这种多样性的影响很值得研究。我们参观了乳液和糖业合作社，考察了合作社人员和富农阶级的比重及其政治影响力，由此看到了当地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和多元性。我们还访问了生活动荡的部族，感受到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4- 两种治理模式共存：一是农村地区的公共行政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采访农村公务员）；二是从村庄到联邦的各级民选机构。

5- 访问了两个处于深层转型中的城市（一个在都市，一个在乡镇）。在巴拉马蒂考察了农民的需求、农村与城市间的关系，具体包括教育需求、生物技术培训、各国立技术学院的发展、非政府机构进行的实验和技术推广等等。在浦那主要考察了城市扩张问题。我们以平民街区为起点，参观了被城市吞并的村庄，目睹了城市化产生的问题，采访了浦那市政府官员，包括政府专员和市议会议员选举的市长。另外还考察了城市行政结构。

6- 农村社会工作负责人培训。考察了培训活动的办法和前景、农村社团的发展经验及农村民主化的进程。

* 印度的社会不平等相当严重，但印度政府没有消解不平等的意愿。印度经历了政治革命却没有社会革命。这与中国大不相同。

* 中印两国对对方素有成见，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大都将述两国间的敌意。而这次印度人见到的中国人平易近人，原先对中国人的偏见不攻自破。中国人的友善让印度教科书里的中国形象荡然无存。中国人很自然地亲近印度人，这种亲近是自发的、真实的、充满人情味的，而印度的官员和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

* 印度的教科书把中国描绘成印度的敌人。同中国人的直接接触打破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两国间的仇恨是两国政府播撒的，两国人民希望和平共处。政府宣扬仇恨和战争是为了控制人民和维持政权。和平之路要靠两国人民的亲密接触来铺就而非政府首脑。

* VCDA 的工作方式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客人访问其中一个村子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工作方法与自己模式很不同。中国的模式主要受儒家和现代国家学说影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上”包括政府、精英、知识分子、专家等等

* 浦那市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对我们的访问给予了积极支持。在当地主要领导浦那市专员和市长的帮助下，我们顺利而成功地完成了访问。不仅如此，他们很快就表示，希望以浦那市政府和中国交流的形式继续合作。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居中联络，促成合作。

中印两个文明差异很大，两国的跨文化对话要针对双方的社会、政治、宗教（佛教）和符号系统，要深入了解现存差异，就必须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并对那些根深蒂固成见进行反思。我们在浦那的短暂参观期间粗浅地讨论了几个问题（比如女性地位和两性关系、家庭问题、国家是否有必要以正义和公平的名义救助弱势群体等等）。讨论虽然粗浅但富有建设性，这表明，普通公民间的思想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考虑到社会科学合作的研究重点，一部分中国来宾表示希望以研讨会的形式就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开展学术交流。他们的第一个建议是自传体文学。

（皮埃尔·吴翰：一种方法、一次经历、让人期待的未来，中国、越南赴浦那参访总结，2004年1月10日-14日）

2001年哈瓦那首届民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

此次论坛得到了多方支持：在国际农民组织（Via Campesina）的两个成员（ANAP 和 CCP），以及国际农业及农村研究中心（CERAI）、RIAD 和 APM 网络的共同推动下，国际农民组织在 2001 年 6 月加入论坛组委会。国际农业及农村研究中心资助论坛 61000 欧元，CCFD 资助了 28000 欧元。ANAP 和古巴政府也给予此次论坛大力支持（会场、翻译和旅费），其它一些组织承担了与会的农渔业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旅费。此外，马耶基金会和渔业界的合作者在哈瓦那共同组织了世界渔民及渔业工作者论坛，此次论坛在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之前召开，有 30 多名渔业工作者参加，两个会议遥相呼应。

我们可以就这个论坛发表以下看法：

1) 论坛组织得很成功：为期两个月的大会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400 人参加。与

会者包括农业、渔业和与食品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2) 这次论坛由民间发起，涵盖了食品问题的全部领域，从营养到土改无所不包，这样的规模，这还是第一次。经全会审议的论坛建议书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们涉及营养、土改、世贸组织、转基因食品等众多问题。我们由此得以用协商形式讨论食品领域内的所有问题。

3) 论坛以众多全球性建议为指针。大会还拟定、提交并批准了一份最终宣言。

4) 大会承认食品主权原则，承认各国人民有实现食品自给的权利，虽然这个权利的具体内容尚有争议，但是面对不利于食品安全的自由化政策，这些争议不妨碍大家达成共识。

5) 这次论坛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 土地改革与土地市场治理具有同等的必要性。

* 世贸组织不应干预各国内部的农业和食品政策，但应管理相关贸易、尊重人权食品权，并尊重环保共识。

6) 部分与会者认为，营养和食品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中基础性的环节（公共政策涉及农业、环境、社会、教育、卫生等等）。

7) 这次论坛给农业和渔业组织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接触机会。也利于在食品问题的大背景下探讨渔业问题。

8) 这次论坛证明民间社会有能力在全球层面就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的一次特别会议、特鲁埃尔欧洲食品会议和里尔世界公民大会都介绍了此次论坛的成果。

9) APM网络的成员们和马耶基金会功不可没。在它们的努力下，不仅农业和渔业组织积极参加了论坛，社会其它领域也参与了进来。

点评：

哈瓦那论坛是民间社会自发组织活动的一个典范，它的召开不是为了回应某次官方国际峰会，而是要提出民间社会共同的建议和战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把相关的问题分散为不同的主题，将渔民、农民、消费者等不同团体凝结成同盟，共同面向未来。目标尚未实现，但这次论坛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为今后相关团体的对话打下了基础。

（皮埃尔·吴翰：哈瓦那首届民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n° 3 035）

古巴的中国之声

我们的共识

食品安全关乎人类的生存，更关乎人类的未来，它比商业规律重要，也比国家利益重要。

我们必须尊重各国的食品自给权。食品主权首先源于国家主权，但更源于人民主权。农民有权自由地根据自身的传统和条件，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而消费者有权消费不与其文化传统和喜好冲突的食物。

在这一点上，中国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中国曾剥夺过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改正了这个错误。2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2亿，但13亿中国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从300千克增加到了400千克。

就食品安全而言，比起增加全球粮食总产量来，保证弱势群体的食品安全更为重要。

食品安全措施应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现在的食品安全保障措施不能损害明天的食品安全。

与此同时，全球食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一方面有 8 亿人在饥饿中挣扎，另一方面大量人口由于营养不良而疾病缠身，面对如此状况，我们难道不该对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吗？当然反思的前提是尊重食品喜好和文化习惯。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却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在构建食品安全理念的过程中，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哲学标尺。

国际食品安全系统的建设需要各国各地区、各国民间社会和各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为了实现食品安全和自由，我们必须共同思考，寻求共识，共同捍卫我们的道德准则。

(陈越光，中国代表在 2001 年古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上的发言集)

当初中国人关心的是温饱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方面优先考虑的是粮食产量，而忽视了环境和粮食质量问题。于是，森林的滥砍滥伐和围湖造田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

-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水土流面积已达到国土总面积的 38%，也就是 367 万平方公里。近些年来，在中国许多地方，不仅水土流失面积在扩大，程度也在加深，水土流失波及面积平均每年增加 1 万平方公里。
- 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沙化面积已达 262 万平方公里，是全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强，且仍在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
- 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逐年扩大。这些灾害波及 1 亿 3500 万公顷草场，占草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且仍在以每年 2 百万公顷的速度扩大。
- 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全国 15%到 20%的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5 个百分点（资料来源：《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9 年）。

（冯至：对中国未来食品安全理念的思考，选自 2001 年古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中国代表发言集）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
只有一个半小时。
“食品主权，这是个不错的提法。
可我们不该忘了农村百姓的生活，
他们需要医疗、需要医生
还有教育和自来水”。
全场都热烈鼓掌，
我也是。

世界食品主权论坛，2002年，哈瓦那
(皮埃尔·吴翰著《会场即景》，即将出版)

食品安全的公平原则包括两方面，即同代的横向公平，和隔代的纵向公平。同代人的内部公平是指，根据农业全球化所带来的新趋势和新需求，确定新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食品卫生准则，制定农牧业产品质量规则及相应的国际市场标准。同时要依法治理农牧业产品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以保证其质量，担负起维护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责任。而所谓隔代公平，就是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代代传下去，以保证持久的食品安全，保证一代人的食品安全不以子孙后代的食品安全为代价。

要在维护食品安全的同时爱护大自然，这就需要：

- 彻底放弃“以人中心”的观念，不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粮食高产；
- 在向老天爷要粮食的同时，承担起人类对大自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 尽早放弃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要走“绿色文明”之路，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等、共生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应该充分吸取教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食文化，保护中国农民利益，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维护中国食品安全。

(冯至：对中国未来食品安全理念的思考，选自2001年古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中国代表发言集)

一位中国与会者的期望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国的粮食产量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国的食品安全对世界的食品安全有重大影响。预计到 2030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其峰值，也就是 16 亿，比现在多出 3 亿 4 千万。如果以人均消费谷物 400 千克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届时须从现在的 5 亿吨增加到 6 亿 4 千万吨，也就是增加 1 亿 4 千万吨。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两方面的保证：首先，要保证耕地面积不再减少（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一条保证食品安全的红线），要保证谷物播种面积不少于 16 亿亩（1 亿 1 千万公顷）；其次，粮食单位产量要达到每亩 400 千克（每公顷 6000 千克），也就是说目前的亩产量还要提高 100 千克。

因此，我们要竭尽全力发展生态农业，并采取以下措施：

- 1) 提高良种（最优品种）的播种比例；
- 2) 扩大灌溉农业面积，普及节水农业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目前为 40%）；
- 3) 提高有机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使用，提高肥料的整体利用率（目前为 30%）；
- 4) 提高农业整体机械化率（目前为 45%）；
- 5) 提高一年多熟率（目前为 150%）；
- 6) 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目前为 42%）。总之，要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科教兴农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两个 16 亿（人口和播种面积）”和“两个 400（人均消费和亩产）”的目标。

（郭书田：中国的食品安全，选自 2001 年古巴世界食品主权论坛中国代表发言集）

2001年9月7日古巴哈瓦那世界食品主权论坛闭幕宣言

2001年9月3日至7日，古巴的哈瓦那迎来了从五大洲60多个国家来的400名代表。这些来自农民组织、原住民组织、渔民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和学术机构的嘉宾欢聚一堂，参加世界食品主权论坛。

这次古巴论坛由国家小农协会和其它一些国际民间运动团体、组织和个人共同发起。他们心系农村和原住民的农业生产、关心传统渔业、致力于发展可持续食品体系、捍卫人民享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权利。这次大会同时也向一个伟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致敬，这个国家40多年来遭受着美国强加的非法和非人道封锁，遭受着美国利用食品问题对其施加的经济及政治压力。然而，她进行了彻底的土改，获得了中小农民的支持，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完善的、积极的、参与性的和长远的策略，捍卫了本国人民获得食物的基本权利。

在这次论坛上，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球肆虐？为什么农民和原住民的农业生产、传统渔业、可持续食品体系等等，都在遭遇危机？为什么危机在不断加深？为什么人民失去了对资源的支配权？我们要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从跨国食品企业的利益出发，提出可行的建议、方案和战略，从而扭转本地、本国乃至全世界的不良趋势。我们还要思考新的目标、政策和理念，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不论现在或是将来，都能拥有尊严、远离饥饿。

(皮埃尔·吴翰， 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文件 n° 3 122)

古巴人想控制一下若瑟·波威的发言。
可他义正词严：
“我们在世界各地与死刑作斗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有 1500 人在场，
每个人都洗耳恭听，全场鸦雀无声。
发言结束掌声响起。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也在。
不知道他，有没有鼓掌。

世界食品主权论坛，2002 年，哈瓦那
(皮埃尔 吴翰著《会场即景》)

第三部分 求同存异、协同共事、迈向集体智慧

2004 年皮埃尔·卡兰默访谈录

金丝燕：“公民社会”这一说法正在进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由中国青年基金会组织、联合国参与的“第三空间”国际聚会便是一个例证；而且您本人也参加了该会议并作了报告。这一“第三空间”是否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呢？您和您的国际合作伙伴们正在构想的，是否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建设？“联盟”的参与者们希望建设什么形式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国家和行政权（我觉得这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两大权力）之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这种国际公民空间代不代表第三种权力？它能否双向运作，也就是说，是否在一个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空间，或相反，在一个因受全球化突然冲击而不再存在国家机器的空间都能运作？

皮埃尔·卡蓝默：我不认为“联盟”的方法以及里尔举行的世界公民大会可与你们在中国所说的第三空间（在法国被我们称为“第三部门”）的兴起相类比。在中国，第三空间是在继1978年开放和现代化运动后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经济获得了自主性。国家试图重新调整，已感到不再有能力象过去那样承担所有社会职能，但同时还希望保持对社会的密切监控，因为它知道现代化运动在中国造成了一些有可能使社会本身分崩离析的深刻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有一系列社会职能既不再由国家履行，也不为经济部门所承担；因而必须不惜代价寻找新的参与者，以履行这些职能。我想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空间”。

现在再来看看里尔世界公民大会，您会发现那些会议团体既有军人、公务员、地方民选官员的代表，又有企业家或科学家的代表。因此，它不止仅代表第三部门，而是全社会内部的一种对话。我认为这种方法在国家无所不在和国家不复存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必需的。因为，无论如何，全球化使得国家——也即公共调节机构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但与此同时，它又使国家主权、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等想法愈来愈不切实际。

金丝燕：在这种前景下，您对其它国际组织的作用如何看待？我指的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你们的角色是对它们进行补充、取而代之（我想不致如此）、顾问参谋，还是只是促使它们关注一些尖锐问题？

皮埃尔·卡蓝默：我已经说过，建立一种民主、有效、合法的世界优化管理是多么的必不可少。这里意味着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界管理体系的重新创立，并吸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布雷敦森林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得到的各种经验教训。然而，我们应不加犹豫地主张深层改革。我确信这类改革不会从内部自发而生。这些机构的人员虽然从智力上完全有能力，但他们既没有独立思想的余地，也不具备必要的宽广视野。因此，应该建立一些公共讨论空间、工作网络和必要的提议空间。作为一名资深公务员，我当然不致于想象用一个非正式的公民网络去取代一个既制订法则、又有能力调动大量资金并实施惩罚的国际公共机构！但反过来，我倒是发现，只有这样的网络才有能力形成一种把具体事实与普遍思考相结合的集体专家意见，以支持改革提案。换句话说，面对这样一些机构时——也许这与我自己的职业经历有关——我在与它们的对话中丝毫都不感到处于劣势地位。我很清楚地知道，若非生活的某种偶然使然，我是完全有可能身处他们的地位的；而且由于曾经担任过其中某

些机构的咨 询顾问，我似乎觉得能从内部对它们的运作了如指掌。所以，我想还是善于掂量出这些常被人视为非常强大的组织机构的任何无能之处。

金丝燕：法国或其它国家的政治家们是否对你们的方法表示出兴趣？他们对你们的活动是无动于衷、犹豫保留，还是忧心忡忡？他们对你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的立场是否有某种演变？您和您的工作班子在组织这次里尔世界性聚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目前的工作活动中又有哪些困难？

皮埃尔·卡蓝默：可以肯定的是，基金会和“联盟”的工作方法愈来愈受到关注，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因为“911”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各类政党或社会活动者之间的关系中极为常见的过于简略化倾向可能酿成冲突和战争。同样，象意大利热那亚8国高峰会议期间发生的这类暴力冲突也表明了，对全球化愈来愈强烈的担忧不能仅仅局限在抗议；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国家的代 议民主制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愈来愈少，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选票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多数代议制和政治活动体制，无论是教会、政党、工 会，还是大型社团组织，都面临一种危机：人们不再轻易认同首领和旗子。在这种情况下象“联盟”那样明确以回应这类危机挑战为目标的方法则引起人们的关 注、好奇，甚至担忧。凡担心的人通常是那些只能用传统概念思维的人，并设想“联盟”最终也会演变成一个新政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也证明了他们对目前正在世界范围所发生的现实一无所知。里尔大会组织上的困难在于它试图应因许多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巨大挑战，倒不是因为可能遇到挡道的政治障碍。恰恰相反， 法国外交部在解决签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大区议会共同出资赞助大会，并为会议提供大部分会场。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 我们开始所做的一切的深层意义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将只会愈来愈广泛。在里尔大会开幕式的重要见证人中，就包括一位法国前总理、一位欧盟创始人让·莫纳（Jean Monnet）的前办公厅主任、加拿大和法国的两位卸任大使以及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大区议会议长等。这些人都向我们表示他们坚信看到了某种极其重要的事物的诞生。

金丝燕：与其它诸如已于2001年1月举行并将于2002年2月再次在巴西南方城波尔多-阿莱阁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聚会相比，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活动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如何？基金会是否得到倾听、接触和请教？

皮埃尔·卡蓝默：在里尔大会闭幕式上，我曾强调指出，象“联盟”和世界公民大会这种不重媒体效应、但注意弘扬工作方法、追究事物实质的方法与那些追求媒体效应的社会运动论坛一如巴西南方城波尔多-阿莱阁的世界社会论坛（FSM），不仅互相补充，而且互不可少。社会论坛主要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的甘地多·格茨波夫斯基（Candido Grzybowski）也曾在该闭幕式上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自从2001年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起，联盟便积极参与并提出了最具条理化的建议。2002年将 可望做得更好，因为已有六十份现成的提案书。在这一背景下，曾为“联盟”的起步和发展提供支持的人类进步基金会与美国的大型基金会相比，还是属于一个小规 模基金会，但它的地位和作用却不是它的规模所能比拟的。

金丝燕：十五年工作才达到这迈向世界公民大会的第一步，仅从财政角度说，人类进步基金会都一定作出了巨大的投资。能否知道这一投资的数额？人类基金会在财务、政治和宗教信仰上的独立是不是有助于它的行动？这种情况在法国和欧洲是否比较常见？外界对这种独立是持赞赏、支持还是批评态度？这种独立性是否容易坚持？在您看来，最能体现人类进步基金会灵魂——也即对基金会生存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皮埃尔·卡蓝默：真正独立的基金会在法国不多，但在欧洲有不少，在美国则更多。我们基金会的年度预算是800万美元；2000—2001年度为支持“联盟”的全部工作和组织世界公民大会，我们曾在财政上作出了罕见的努力。两年内用于“联盟”的预算总额为700万美元，其中150万用于世界公民大会。有许多独立基金会都应该有能力作这样的、甚至更大的财政努力。然而，我们大概是唯一一个真正这样做的基金会。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我曾经常向其它基金会领导人解释过，我对我们基金会的与众不同特点有三个解释：

—第一点解释是：在大多数基金会，人们都有一种缠绕性念头，即总要求对其行动的影响能够作出评估；就象许多美国基金会所说的，要“显示差异”。为此，就必须象企业那样按市场的潜力来进行推理，必须确立具体目标和特定行动并须能够进行影响衡量。而我们则与基金会理事会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它使我们能够说：我们将支持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为此，我们预先接受不对自身行动进行影响力测量。

—第二点解释是：在许多基金会，理事会由一些出身经济界的代表组成，不敢贸然投入到一些可能会导致对其自身逻辑提出深层质疑的历险行动之中。

—第三点解释是：在基金会和社团界很少有方法论方面的投资，而象“联盟”那样的行动则需要许多方法上的创新。

我想基金会的独立性是受到赞赏和尊重的。对基金会的批评肯定要少于它所引起的不理解。由于我们运作的模式和别人不同，所以，有些人难于理解我们；而这种不理解有时倒会引起对我们的忧虑。波莱特·卡蓝默 (Paulette Calame) 在北京向中国青年基金会干部介绍本基金会时，大体上这样说过：任何基金会都既是一个机构，又是一种人类历险。而我们基金会与众不同的特点也许就是把自己设想为一种获得分享的人类历险，并重视耐心建设使这一历险获得长期发展与持续所必需的方法。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追求评估行动的影响，但却注意它的恰当性，也即：我们是否针对真正的挑战行动？方法是否得当？合作伙伴是否优秀？在一个人类面临重大挑战的时代，我们宁愿做为重大挑战服务的小角色，而不愿依照我们的规模来选择确定是否该应因的挑战。

X. 1999：北京会议：第三部门

对 FPH 非政府组织职能的思考

皮埃尔·卡蓝默在一次关于第三部门的国际会议上，向中国青年基金会介绍了FPH的哲学：FPH“尽人事”，而不“守成例”。正是这一理念，催生了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基金会理事会与工作团队间的关系、资产管理、财政理念、支出监管、时间与备忘管理；相关部门与其合作者间的关系

“尽人事”还是“守成例”？

一个基金会从来就有两重身份，既是组织机构，又是探险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可以更像前者或者更接近后者。以下我将简单说明作为组织机构的基金会如何运作？这将有利于理解一个探险队式的基金会与普通意义上的基金会会有什么不同。

a) 作为组织机构的基金会，其主要目标就是参与活动。基金会选择资深人士担任委员，将财产治理和目标治理分开。

b) 工作团队将项目草案上交基金会理事会，理事会决定是否资助该项目。资助后的跟踪管理仅限于核实项目支出是否符合预定计划。

c) 如基金会规模较为庞大，则分为若干部门进行管理，并促使各部门独立运作，每个部门拥有自己的合作网，预算和文献资料等。基金会也由此而成为若干独立团体的联合体。理事会将资金分拨给各团体，各团体间不会互通有无，这种现象在基金会看来并无大碍，因此他们很少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d) 基金会理事会与工作人员的关系由他们的法律地位决定。一般来讲，基金会委员拥有决策权，他们评估并衡量基金会活动的可行性和影响力(美国基金会宣称：我们要变得不一样！)。如此一来，基金会就像一个企业，只能在特定的狭窄领域运作。对于组织机构性质的基金会，理事会委员和普通工作人员的关系如同企业主和员工间的关系，或者，再打个比方，如同政治决策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

e) 基金会的刊物主要是基金会活动报告和计划评估。

f) 基金会在遗产治理上主要采取专家治理模式。遗产与基金会的年收入互相独立。基金会的年收入被当作来年的资金来源。基金会必须遵守所在国的税收法，如有必要，必须将一年预算的资金全部支出，这样便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这样的强制性政策带来了两个后果：

- ① 财政预算逐年变更，不利于实施长期性计划。
- ② “工作人员”承担着花钱的压力（即美国人说的“spending pressure”），舍本逐末，为花线而花线在所难免。

g) 基金会的财政预算常常将运作经费与计划开支截然分开。基金会理事会和管理人员认为运作经费不产出价值。

以上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

1. 基金会资产治理不善：遗产逐年减少，最终枯竭。
2. 基金会的目标最初由基金会的创建者制定，覆盖面比较狭窄，这一目标在创立者所处的年代或许有意义和价值，但 30 年后就未必如此了。

结论：

1. 资产须谨慎管理，着眼长远，分散投资，减少风险。
2. 基金会的目标。目标有容乃大，切莫局限在某一领域，如学校、卫生、研究和艺术等等，而是要针对一个问题，因为问题永远存在。

（波莱特·卡蓝默：具体步骤，探索性而非机构性基金会的操作方法和困难，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n° 173）

一张照片不是一部电影

探险是长期性的事情，不知道基金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现在，就不能算了解基金会：一张照片毕竟不是一部电影。

基金会的时间治理是重中之重。我们制定规则、决定办事的节奏和步骤都要考虑如何利用时间。

1) 征途中的基金会

基金会需有自知之明，需要留下过往的痕迹，这就需要常常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因此我们编辑了内部文件“征途中的基金会”，分发给我们的合作者。

2) 休整期

我们需要阶段性的“休整”，和我们的合作者一起回顾过去，防止重蹈覆辙，避免短视行为。重审我们的阶段性计划，重新定义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作用。

基金会的遗产使我们拥有独立性，也使我们有了采取行动的可能和义务。此外，基于同样的精神，我们可以资助我们的合作者，帮助他们“化经验为资本”。

基金会在1989-1990年经历了18个月的休整期。正是这个阶段，基金会放弃了对某些计划的资助，其目标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3) 年休整期

长期休整尚显不足。聚在一起总结工作必不可少，特别是我们这个团队分散在世界各地，而且海外的任务非常之多。我们一年中有二次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在这期间，一般不允许请假或者出差，我们将在这段时间里集中进行讨论、反思和总结。

4) 周一例会

每周一早上，基金会上上下下聚集一堂。会议持续3到4个小时，讨论上一周的工作，安排下一周的任务。很多想法都是在周一例会上提出的，我们由此制定活动计划。例会为我们协同工作提供了方便。

要想使基金会成为大家共同从事的探险事业，理事会的每一位成员就都要把基金会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探险队。

道理看似简单，却深刻影响了基金会的运作和基金会成员的选择：

1) 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关系

- ① 信任理事会委员；
- ① 理事会委员之间互相信任；
- ① 理事会信任工作组及其领导；

基金会的战略决策往往来源于理事会委员或者工作组成员的奇思妙想。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就会大大阻碍创造性和想象力。我们接受挑战，同时也做好准备，在失败的时候集体承担责任。

信任是长期工作中取得的成果，是通过相互认识得来的。理事会的每一位成员自觉自愿地为基金会做出贡献，安排必要的时间参加基金会的活动（会议、阅读）

基金会历史上出现过理事会委员辞职的情况，部分人即使起初拥护探险，但却不能适应我们工作方法。他们习惯于传统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我们不把此类辞职看成失败，毕竟人各有志。

2) 理事会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

基金会理事会集体行使权力。理事会委员对计划的执行没有直接控制权。基金会不像市政府的助理们那样，直接负责城市日常事务。

这并不妨碍理事会委员参与某项具体计划，他们可以像工作组成员一样自愿参与，并服从总理事的领导。这有利于理事会委员更好地理解工作组的日常工作。

理事会委员按照透明度创造信任的原则，接收各方信息。

信息主要包括：周一例会次日收到的工作报告，报告绝非官样文章，更不看人下菜碟。

与合作方的关系

曾与我们结伴同行的人，就是我们的合作者，不论我们之间是否签有正式协议或者是否有经济联系。

我们同合作者之间的关系，与基金会理事会或工作组成员之间的关系类似，都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信任的力量强于法规的约束，规则容易在交流中变形而信任则是真情的流露。

- ① 与合作方的关系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不少合作者深度认同基金会的目标，但在经济上部分依赖基金会。我们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合作者，给予他们帮助，促使他们独立。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放弃资助一些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我们的合作者。

为了解决资金投入不均衡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理念：

- ① 与合作方签订协议，确定双方合作关系。协议双方表达各自的愿望、简述各自的行动计划。“共同的目标”让合作成为可能，使我们能够同舟共济
- ① 为顺利推进双方合作，基金会将提供经济支持、工作方法援助、技术支持和网络资源支持等等。
- ① 合作方自行决定资金投入比例和工作目标，基金会不干预合作方的具体工作方式。谈到资金管理的时候，我就提到过，我们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同理事会与工作组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样，都遵循同一原则：明确目的，开辟道路。

(波莱特·卡蓝默：具体步骤，探索性而非机构性基金会的操作方法和困难，
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173)

中国 APM 网

1996 和 1997 两年，中国合作方对 APM 网络有了充分了解，在中国建立 APM 网的想法应运而生。于是，我们就跟中方相关负责人商议，大家觉得建一个网络或如他们所想，建一个工作站，是完全可行的。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我们给予中方合作者最大限度的自由，希望在他们眼里，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也希望该计划能在中国各地区顺利有效地实施。中国朋友们创立了一个名为“中欧计划”的农业网，该网与中国农业部、《中国农民》杂志社、中国青年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有联系。网络由陈越光先生发起，他是中国文化学院的副院长，之前我们打过好几次交道，其间离不开法裔华人金丝燕女士的协调，她对农村问题亦有相当的兴趣。由陈先生介绍，我们陆续结识了不少中方人士，他们参加了多次国际性会晤。1996 至 1999 年间，APM 中国网、APM 世界网和基金会的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双方的相互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加深，最终确定了协作关系。这几年来，APM 特别邀请中国 APM 网的成员赴非洲、拉丁美洲、法国和西班牙参观访问。中国网内部设有乡镇企业家网，部分乡镇企业家对讨论问题兴趣平平他们更关心企业精神和企业利润，而不是发展和社会问题。通过磨合，我们和中国合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度理解，讨论问题时中方的发言越来越踊跃而且更具穿透力。APM 中国网的成员在巴西卡斯卡韦尔 APM 世界会议，古巴 (FMSA) 会议和 2002 年 5 月雅温得会议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的 APM 网中国成员羽翼渐丰，他们希望融入国际性讨论并为国际会议贡献一己之力。

评论：

APM 中国网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它由若干负责人发起并得到了相关组织机构的支持。它具有联络政府机构的能力能够和中国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合作。有必要了解现在的网络负责人对网络有哪些思考，他们对网络的中短期发展有怎样的计划。

(皮埃尔·吴翰、弗朗索瓦丝·马塞、安杰拉·奥尔多奈
APM 网在中国 - 对社会政治的弹性适应，
fiches_dph_sur_le_reseau_apm_et_la_chine
[[.sxw](#) (15 ko)])

转基因：中国的目光

转基因产品激起了中国各界的强烈兴趣。每年约有价值相当于 100 亿美元的

4千万公顷转基因作物和4千种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交易。不论对转基因持何种态度，面对这样的数字，谁也不能无动于衷。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研究和发 展转基因食品，而是怎样使用转基因技术，从而更好为人类的延续和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自20世纪80年代格登（Gurdon）转基因小鼠试验成功至今已有21年。这段时间里，转基因的物种和转基因产品的数量都在急剧增长。“转基因产品”包括跨基因物种和以此为基础生产的产品。目前主要的转基因产品有：跨基因生物转基因食物、药品、以及器官。

以人口大爆炸为特征的当今社会，食物供给不足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而进行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已是强弩之末，不能解决60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转基因技术诞生的大背景，因为它可以为人类的延续和发展提供更多的食物。现在，这项技术的主要使命是增强农作物的抗病害能力从而提高产量，通过跨基因试验，寻找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和培养可移植的器官。

（谢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应对策略，1999）

应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策略

转基因食品存在危险性，所以务必要以人类的健康为出发点，发展农产品，维护生态平衡和社会安全，采取一定的前瞻性战略和一系列具体有效措施，以下是几点建议：

- 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
- 建立完善的转基因产品测试与核实体系、监控与质量检查机制：测试与核实体系要符合国际标准和国情，有效的监控与质量检查机制可以确保转基因食品的进出口安全。
- 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以严格检测与具体核实为基准，制定和实施转基因食品安全条例，培训通晓生物技术和法规制定的专业人士。
- 加强大环境建设：相关决策部门应当从大局着眼，采取具体办法，控制转基因产品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
- 推进信息普及：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科普工作，培养公民正确看待转基因产品及其安全问题的意识，进而培养有辨别、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转基因产品消费者
- 提供良好的公共资讯服务：建立相当数量、拥有良好信誉的公共资讯机构，为缺乏相关知识的消费者提供公允而有效的服务。
- 规范转基因产品市场：建立健康而规范的市场机制。

中国有句老话“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也就是说凡事结果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人的办事态度和方式，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应如是。

(谢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应对策略，1999)

中方合作者在国内外展开的思考与行动（1997-2001）

- 在FPH的APM计划框架内，我们在中国农村组织了第一次有国际代表参加的实地考察：为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安全”问题（北京，江西，山西，1997），

“可持续发展”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

- 南非会晤（1998年11月）。南非会晤上中方萌发了考察中国农村组织计划，计划由陈越光和谢杨负责，金丝燕协助。
- 第二次农村实地考察。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考察团，来到中国西部省份宁夏。宁夏省有85 % 的穆斯林居民，属于敏感地带。这次考察过程中，“食品主权”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与实地考察相关的主题讨论如下：
 - 1) 密集生产
 - 2) 农民组织
 - 3) 合作社
 - 4) 农产品国家管理以及农产品市场组织
 - 5) 农村发展与国家支持
 - 6) 构建农业保护体系
 - 7) 六盘山造林工程
 - 8)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
 - 9) 农村工业化的构建、结果及其问题
- 考察中国东部的农民组织以及东阳和西山地区合作社（2000年10月23-30日）。
- 中法及非洲国家在西山制定了中国农民组织联合计划，发表了5篇报道，其中三篇是农民自己的文章（2000年）。
- 发起农民组织联盟者计划。金丝燕发言，题为《关注还是漠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组织》（2000年11月6日，蒙彼利埃，SIRADE）。
- 参加米悠会议（2000年6月到7月）。
- 金丝燕、谢杨和林焕军筹备并参加了APM网世贸问题讨论；考察了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土地规划以及大中城市作用等问题，并参加了声援若泽·博威的活动。
- 启动了关于世贸问题的激烈讨论，由此引出的一些新思考与结论，与政界人士以及中国普通大众对世贸的看法大相径庭。
- 第一阶段的中国农民组织计划实现情况：
五个不同领域：
 - 中国腹地河南省南乐县农民组织状况。
 - 农民组织技术自主个案研究
 - 国家支持的职业农民组织个案研究。
 - 农民组织：服务与合作个案研究
 - 乡村自主问题报告。

- APM 2号文件的中文翻译及其出版，发行3000册。
- 翻译并在中国出版《草莓里有鱼腥味》。
-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食物安全与农业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7月7-10日）。本次研讨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FPH联合举办。

(金丝燕：小结及回顾：国内外的中国APM（1999-2000，2000-2001），2000年10月)

哲学社会运动

巴西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甘地多（Candido），是巴西农业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我们九六年在喀麦隆考察时认识。他很地道的法语引起我的注意。巴西是拉美国家中唯一说葡萄牙语而不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他告诉我，他是在巴黎索尔邦大学读的哲学和社会学博士。回巴西后任社会学教授，有感于巴西社会进步问题和无土地农民运动而专注农业与公民运动。1999年APM的中国宁夏考察和北京会议，他都参加了。他谈的主题就是巴西公民运动。

我们在宁夏考察的路上有一段很短的对话。那天上午，去看治沙。汽车往前开着，把两边的村庄或沙漠甩在后边。甘地多问我：“生命是什么？”

“你说呢？”。

甘地多指指窗外：

“生命就是在这条道上奔跑的车。”

这是常识，生命只往前走，不会往后挪。甘地多大概看出我的不屑，说：

“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就是两边的景象。被甩在后边的瞬间记忆而已，而且互不关联”。

这有点悲观，象哲学家的样子。可是哲学家怎么又搞社会运动呢？他怎么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拧在一起而不出毛病呢？遇到矛盾，是哲学家的他让步，还是搞社会运动的他让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琢磨，但没有问过他。

(金丝燕：蓝天下-与FPH闯世界的十年)

XIII. 2003年肩负起思考的责任——相遇北京 回顾与前瞻：跨文化对话——构建一个负责、团结和多元的世界

我们的会议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开始进入筹备的，但今年一月底我和法方主席卡莱姆先生在巴西波尔多-阿莱阁参加世界社会论坛期间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讨论，回国后中方筹备组在10个工作日内对会议的全部日程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会议筹备比较仓促，加上我们的与会代表从原来预定的不超过55人，到现在已经超过80人，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欠缺，疏漏的地方很多，所以，首先希望与会代表对在与会中发生的问题及时地提出批评，及时地提醒我们改正，当然，如果可能也希望谅解我们的过失。

1、 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

大家都知道这个会是在一个基础上召开的，这个基础就是人类进步基金会在中国进行了十年的项目运作，“联盟”项目做了十年，“文化间”项目做了差不多八九年，“APM”项目做了七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要来展示我们十年的合作成果？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来回顾十年的合作历程？我们的考虑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们会议的目的。我们会议的目的不是将十年合作的成果做一个回顾和展示。我们会议的出发点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问题把我们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虽然会议的主席是乐黛云教授，是皮埃尔·克莱姆先生，但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总召集人是问题，是共同的问题在召集我们。但是，即使有这样共同的问题把我们召集起来，在当今这个文字快速传递，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现代通讯已经创造了最便捷，也是最经济的异地沟通手段，我们为什么还非要聚集在一起开会？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要开这个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只有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才能达到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感受在问题面前的共同感，只有我们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这种感受，我们需要相互激发一种带感情的思考，任何研究的结论，任何文字的传递都不能感受带感情的思考，我们需要创造和体验一个共同思考空间中共同思考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我们非要从四面八方，天南地北聚会在一起，来开这样一个会议的理由和追求。

二、这个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希望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开这个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这个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从问题到问题的深入。一般，我们传统的会议设计总是希望从问题到答案，从分歧到一致，从异到同。但是在我们这个“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我们说问题是我们的总召集人，问题也是我们的向导。我们把会议的过程看成一条线，一条从问题到问题的深入的线。我们从问题开始，今天开幕式第一个致辞的是汤一介教授，汤先生的发言就是对当今世界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思考，接下来我们每个与会者要做自我介绍，希望大家除了介绍自

己以外也从对会议的期待，也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方面提出思考。会议闭幕式的最后一项是全体与会者的自由发言，每个人表达自己对于未来的自由畅想、问题、建议、设想。所以，我们是从问题开始到问题结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重视在问题面前探讨方法，在方法背后寻找智慧，这条线是问题-方法-智慧。我们不刻意追求一种共同的答案，我们追求一切过程都有记录，所有的大会都有速记公司做记录，所有的小组讨论都有专门的记录员做记录。我们追求一切过程都有反馈，每次的小组讨论以后每个小组都会产生两个代表到全体大会汇报发言。我们追求一切过程都有追溯，我们希望把思考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过程，而不是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后无影无踪，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种经验思考的长远积累，所以我们把图表总结系统运用到这个会议上，每天晚上的工作会就是做图表系统汇总，第二天反馈给每位与会者。虽然第一次运用图表总结系统会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但是我们还是做这个尝试。

第二个特点：让每一个人在想象力说话。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坐在了一个屋子里，但是我们内心依然可能是被分隔的，我们之间可能是壁垒重重的，有的是官员，有的是NGO成员，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教授，是学者，我们被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所隔离着。知识本来是人和人之间一种交流的工具，一种沟通的手段，但是知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壁垒，我们也可以被知识，被各自的专业壁垒所封锁，尤其各种专业术语，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一道道火力封锁线。在APM的中国网络中有两句口号，一句叫做“在观察中思考”，意思是在看中间思考，强调思考以实地考察为前提；另一句是“从邻居家的围墙上探出头去”，就是强调打破这些壁垒。我们希望职业和知识都只是我们的一种背景，让我们用想象力来说话。所以，我们这个会议要打破少数人发言，多数人听会的传统格局，要开成一个全体成员参与和互动式的会议。我们大会、小会的主持人是24个主席，由不同的会议主席轮流主持每个会议，就是希望从会议组织方面汇聚不同的想象力。在想象的面前人人平等在想象的面前也可以人人不同。我们希望尽量表达不同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的意见而不说话；我们可以用赞美来表达爱，也可以用批评来表达爱；我们可以在赞同自己的意见中听到尊重，也可以从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中听到尊重。

第三个特点：把创造空间留给创造过程。筹备组没有把开这个会议看成是盖房子，画好图纸，一切按照图纸进行，我们更多的把会议看成是一个生命体，看成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设想只是用四大主题来关照原有的三大项目，就是环境与人类责任，第一个主题；公民意识与第三部门建设，第二个主题；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互动与冲突，第三个主题；农民农业与现代化，第四个主题；用这四大主题来关照和回应原来进行了十年的“联盟”、“文化间”、“APM”三大项目。但是，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把“建设一个协力、多元、负责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性项目，我们更多的把它理解为一种哲学，它贯穿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之中，它是一种标准，是一种方向和灵魂。我们在会议的设计中也把它贯穿于我们所有的主题之中和所有的讨论之中，因为我们感觉到这里有一种承接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情怀和思想力量。为了更多的把创造空间留给创造的过程，我们对所有的会议主题发言都不要求提交论文，连演讲题目都不报，只是规定了一个大的主题范围，以便发言者在二十分钟的主题发言中，有更大的可能来自由发挥，做交谈式的发言，而不是论文宣读式的发言。每个主题都是一小时大会主题发言，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的分组讨论，然后每个组产生两名代表，又回到大会交流。分组讨论可以根据大会主题发言者的思路，也可以完全不受大会主题发言的局限。每个组产生代表的方法完全由这个组自由决定，可以是汇总全组的讨论意见，也可以仅仅是一个人的观点。每个讨论小组除了记录和本次讨论的主持人外都是自由流动、自由组合的。而且，作为一个开放、互动式的会议，我们欢迎非会议代表参加会议但他们必须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而不能只当旁听者；我们也随时准备在会议过程中调整议程。

我们相信会议的成败是全体与会者创造的，失败也是全体与会者创造的，不是大会筹备组决定得了的。这样说有点像推卸责任，但是尽可能地把创造空间留给创造过程，我们确实相信这个会议的一切结果，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创造的。

(陈越光：中方筹备组对“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会议的思考，2003年大会开幕式发言——担当思想的责任-构建负责、团结、多元的世界。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3 308)

总结

已经十年了，才仅仅十年。

十年了，可是对我们而言，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1993年2月，通过于硕介绍，我们认识了陈嘉映，大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那时我们还不是盟友。当时有四十来人与会，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价值和经验，以及面对当前的挑战中国人能提出怎样的建议。

才十年，但我们觉得，仿佛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十年里，我们敢为天下先十年里，我们情同一家；十年里，我们触及到了如此多的问题：跨文化出版和对话、家庭农业、城市管理、社会遗弃、国际商务、工业生态、土地和水资源、伦理、科学、经验交流、大学和联盟。

这段历史，这些希望，这些互信，以及那些涣然冰释的误解和那些令人欣慰的成果……所有这一切，既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财富，又让我们每个人从中受益：我们由此变得开放、变得丰富。

是时候了！我心怀欢喜。十年前，在中国，我们有了第一个合作者，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回头看看结伴走过的路。我们聚在一起，不是要搞世人所谓的周年纪念，也不是要翻翻相片然后合上相册，让记忆醒来又睡去，与此相反，它更像泥瓦匠盖房子，打好地基以后，要向上进军了。

对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和它的全体会员来说，此时此刻尤为珍贵，基金会的休整期即将结束，此时，大家齐聚一堂，总结十年来的工作体验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几个星期以前，我向基金会理事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对未来七年我们将走向何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提议建立在集体智慧之上。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没有你们的意见，不与你们展开对话，没有你们信心、灵感、建议、质疑和期待，我们要给未来定位，将会多么困难！

终于，在第一个七年结束之际，联盟，这个试图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探险队，召开了世界公民大会。今天的联盟，属于所有以之为梦的人；属于一步一步创造了它的人；属于曾经为它的成长付出过的人，也属于那些将要为它付出，将要为它做出努力，将要与我们共同制定第二阶段方针的人，我们将携手并进，构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公民议会。

近十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仿佛是架起了织布机，而那些在各样计划中成长起来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朋友们、这三个字母的简称早已耳熟能详：AVE、DIV、DPH、APM还有ETA），如同布匹的经纱，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配上纬纱，把散线连成布匹。

假如没有乐黛云教授及其工作小组担当大任，把我们组织起来，这一切都将化为虚谈。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在座的所有人，都从百忙中抽出身来，和我们进行长期对话。这次会议能够召开，还因为欧亚大陆的东西两极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吸取了以往的工作经验，所以我们才能立足往昔，展望未来。

我很高兴能够做开幕式发言，也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我对我们的合作方有着怎样的情感、我对联盟有着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人类所有重要的冒险活动也许都是二元的：它是长远理想和短期实践的统一，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一致，也是奋斗目标和前进艺术的相辅相成。我想从我们各自的文化中引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拉丁作家塞内卡说过：水手若不知去

往何方，便不会一帆风顺，这里讲的是方向。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里讲的是实践。

我们的目的，从一开始，我认为就可以归结为5点：

- 1) 人类在本世纪初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这是现代化的真正含义。现代化不是经济全球化，不是世贸组织，不是将所有事物都商品化，也不是文化的庸俗化和单一化。人类彼此依赖，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 2) 我们要建设的未来世界，应该是负责的、多元的和团结的，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是文化和人口大国。在我们参加过的所有国际会议上，包括一个月前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我们都会问：中国人来了吗？印度人来了吗？非洲人来了吗？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却放眼世界的基金会一直关心着中国问题。今日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我们不能局限于中欧间的对话，更不能局限于中国和瑞士或法国间的对话。相反，我们要成为世界各地区间对话的促进者。这就是“关键词”项目、世界 APM 网络、城市中介站乃至联盟的含义。这也就是印度的同盟成员和其他印度朋友出席此次会议的意义所在。
- 3) 中西关系：两千多年来中西间互相吸引、互有怀疑、相互倾慕也相互误解。两者互有影响，但相互了解尚显不足。现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文艺复兴以来中西的第三次深度互识提供了契机。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6和 19世纪，以痛苦和失败告终。如果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尚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话，21世纪的我们就不能再这样了。第三次中欧交流没有任何失败的借口和理由。
- 4) 21世纪许多领域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思维方式、研究和学习方法、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消费、流通和治理方式，还有人类与生态圈的关系。我们别无选择，延续现行的经济、科学、政治和教育模式，只能导致战争。我们也看到，统治世界、国家和跨国集团的各权力方并没有为迎接这些挑战做好准备，只有将各行各业人士聚集在一起的世界公民联盟才能力挽狂澜，因为它把诸多经验、想法、创新和数千人的信念聚集在了一起。终有一天，百万男女的信心将汇集。我们不怕势单力薄，也不会因此自暴自弃，人类最伟大的冒险在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星星之火，力量要靠慢慢聚集，要靠与他人结盟。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义无反顾。
- 5) 将来的世界应该是团结的，应该在谨慎小心地处理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尊重多样性。互相依存让我们唇齿相依，多样性使我们得以丰富。我们面对同样的现实和同一个地球，但我们处境各异，不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问题。有些地方极其富有，有些地方一贫如洗。我们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们的历史背景各异。但是每一寸土地、每一种环境都有唯一性。从今往后，治理的艺术将表现为如何求同存异。

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和梦想，十年来，是这些梦想一直支持着我们和中国走过了创业阶段。

没有实践的理想会沦为空谈，没有前进的艺术和向前的决心，指路明灯将一无是处。实现目标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重视实用性、理论结合实践、拥有承担风险和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的意识。

首先，实用性。位于古老欧洲一端，隐没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基

金会，要和一个大国携手，和一个千年古国，一个有着 13 亿人口的中国协同合作，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不珍惜友谊，不迈出第一步，不承担风险，没有明确目的，我们将一事无成。这和水滴石穿的道理一样。回顾这几年的合作历程，其实就是回顾那些标志性的日子，那些值得纪念的相遇和会议，这期间，我们双方懂得了耐心和尊重，学会了沉默，培养了执著。有时某项动议很快地就能实施，有时它们又得慢慢萌动，最初柔弱的小芽，很可能长成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同样的，对出乎意料和无法预料的事情，我们要有承受能力，要知道像基金会这样的团体，现在的一项行动，以后才能看到成果。

理论结合实践。我反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并认为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手段应该和目的一致。实践中应该相互尊重，寻求一致性，保留多样性。我们非常重视各种会议，因为只有会议才能够建立起互信，面对面交流远比电子邮件和通信来的实在，有些东西文字无法传输。隔开两岸的河流是交往的障碍，但是一旦有了摆渡者，它就可以成为交往的纽带。我想说的是，在这十年里，于硕和金丝燕频繁地往来于两岸之间，是我们功不可没的摆渡者。

承担风险和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的意识。每次合作都是冒险，没有一个项目其目的和手段是在事先完全设想好、评估好了的。向未知游弋，当然要做最充分的准备，把干粮载上船，以备远航之需，要募集能战之兵，装好罗盘，掌握风向，但所有这些并不能保证我们会抵达新大陆。也许世间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完美，那就是目标不要太大，期望不要太高。但是我们选择的是未知和雄心，因此我们必须不断调整行动方式，敢于接受瑕疵和失败，并注意吸取教训。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过里尔世界公民大会。我在公民大会上看到大家在为理念与实践的结合做出努力，在为伟大理想转变成具体实践做出努力。当然，迈向未知需要承担风险，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

- 大会表明我们拥有在世界各地展开对话的可能，
- 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世界公民大会上，中方代表的数量最多，占了全体与会人员的18%，
- 多样性不仅指地缘文化差异，也包括社会和行业差异，包括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人士，
- 我们必须以差异为起点，寻找一致性和关注点，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合而不同”。因此，对我们来说，里尔大会其实是一次寻找一致性之旅，
-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公民社会。里尔大会的贡献在于，它采用了互动的方式，使每位与会人士都能够为集体智慧做出贡献，

下一步怎么办？怎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需要做到三点：第一点涉及总体哲学，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的延续”，或者现代性新阶段；第二点涉及第二阶段的计划；第三点是方法论，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会议取得最大成效。

第一点：现代性新阶段。18 世纪的人们有思考宇宙问题的热情和愿望，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启蒙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其影响超出了欧洲大陆，是世界性的思想源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五四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启蒙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那是对自由的向往，尤其是对自由思想的追求；拒绝宿命论；要求把理性科学与宗教和政治区分开来；坚信人类的进步，

并相信掌握了进步的方法；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的普及；人权；民主、民族和国家；坚信西方思想的优越性。

人类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此，我们不该视而不见，应该超越启蒙时代的思想、学会管理相互依存的新世界；必须将权利、自由与责任联系起来；不能分而治之，要学会应对复杂局面，学会协调关系；不一味追求科学进步，要改变研究科学的方式，要联系社会；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世界共同体；摒弃西方优越感，建设尊重多元文明价值的社会，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由此，我想到了第二点，下一步的工作，它和两个词息息相关：连接和扩大。连接：我们织完了经纱，但还没有织完纬纱。我们通过在里尔制定人类责任宪章和二十一世纪日程，积累了很多想法，这是第一条纬纱。把这些思想串联起来是一码事，把人类和各组织串联起来又是一码事，这是时代的考验，也是对我们考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共同筹备的会晤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扩大：即使我们交换了经验、整理了意见、筹备了宪章、讨论了工业生态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在联盟以及里尔大会中所做的一切还只是雏形、一个微小的模型。下一步的任务，是扩大范围，将这些思考推进到其他领域中去，和大规模的运动与机构接轨。我们的会晤必将引出新的思考。

所以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观点是会晤本身应该体现对话精神和反映我们的目标：积极参与，每个人都拿出自己最宝贵的经验、思考和创造；求同存异，为了共同的目标超越分歧；不各自为政，而是将不同的观点重组和联系起来；长期战略问题和短期工作计划并重；我们的合作方所做的后续工作，比如中国团在里尔会议之后，对宪章的宣传和制定、教育体系改革、税收和治理、公民社会建设、地区融合等问题提交的丰富建议，就是一个出色的榜样。大会之后，中方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行动建议，对此我们将在此次会议上做深入探讨。

（皮埃尔·卡兰默：2003年北京会议开幕式发言）

农民农业与全球食品供给

此次报告，我将立足于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具体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在农业、社会和全球化领域所做的分析、思考，并提出一些建议，有些问题已经在构建负责和团结世界的框架内讨论过。我的分析资料还包括：FAO的研究成果、马塞尔·马佐耶（Marcel Mazoyer）和劳伦斯·胡达尔（Laurence Roudart）的著作，他们清晰地介绍了世界农业状况，分析的同时也给出了某些建议，另外还有皮埃尔·康帕涅（Pierre Campagne, IAAM）和雅克·贝尔朵迈（Jacques Berthommé, CIEPAC）的研究成果。大家不仅会在建议簿中重温这些分析、建议和说明，还会看到全球的农民们，他们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有着怎样的看法。建议簿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版，它是长达两年的工作结晶，由农民代表们发起，是全球一百三十名农民代表参加喀麦隆雅温得会议的成果，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团。中国 APM 网的朋友们参加了讨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将做出的结论。

[...]

食品领域发生了什么？

世界上有 8 亿人食不果腹，近 20 亿人营养不良，严重缺乏铁、碘、锌、钙和维生素。

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在所有缺乏食品和营养不良的人中，有四分之三是非城镇居民，其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现在地球上生活着 60 亿人，预计到 2050 年会增长到 90 亿。

在这段时间之内，想要让所有的人都吃饱肚子，农产品总量就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产量增加 3 倍，非洲国家则要增加 5 倍。此外，还需要提高食品质量，需要均衡地摄入营养。

中国在五十年里，人口增加了 1.3 倍，食品产量增加了 3.5 倍。中国是个榜样。实际上，中国通过农业保护政策，保障了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从而解决了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世界食品产量的成倍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就特别要求在一些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出产的农产品在现体系内没有“竞争力”的地区，依然不放弃农业生产。

[...]

- 1) 怎样解决世界和中国的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
- 2) 中国是否能够控制并减少农业人口，怎样才能增加中国城镇岗位的需求量？
- 3) 中国是否可能建立农民组织，并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进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怎样发展壮大？怎样利用世界民间社会加强农民组织和其他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
- 4) 怎样培训中国农民？使农村领导们明白世界和中国的当前形势从而找到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
- 5) 怎样处理农民、贫困等关乎中国社会整体的问题？

- 6) 是否可能在中国采取地区性措施，并与有关各方团结合作，解决食品和营养不良问题？
- 7) 怎样在中国对转基因食品问题展开真正讨论？
- 8) 怎样考虑农民和食品问题所涉及的文化因素，并以此来指导思考和行动，并增加生活乐趣？
- 9) 中国农业可持续性发展路在何方？
- 10) 怎样在食品大框架内考虑渔业和自然资源治理问题？
- 11) 中国怎样在世贸起到建设性作用，在怎样的条件起这样的作用？

(皮埃尔·吴翰：《怎样应对产生世界
贫困和饥饿的机制？》，2003年北京会议发言)

跨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随笔

这次跨文化交流会议中，有三个词语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们就是“协力、负责、多元”。仿佛早已等待多时，我一下被它们吸引，接纳了它们，并开始进行关于它们的思考，于是有了一些个人理解：

“协力、负责、多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人类整体，我们需要了解并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需要建立并尊重一种协力、负责、多元的关系。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人，需要在前一个承认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自己与其它个人的协力、负责、多元的关系。这三个理念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需要面对一些基础问题，下面是我所想到的。

[...]

高中时，我开始有了一个隐约的想法：“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回到从前，以现在的想法阅历亲自教育小时候的我，我会怎么培养他？”上了大学，受了挫折，经历了从肉体到心灵的一些磨难，这个想法变得更加真切，仿佛成为一种呼唤——那个嗷嗷待哺的小东西，那个对世界充满善意与好奇的小家伙，向现在这颗疲惫而困惑的心发出召唤——“复归于赤子”！这个遥远而清晰的呼唤使我不断回顾我所受过的教育，反思它的合理性问题，经过越来越多的思索，我得出了令我遗憾的结论：我所受过的教育，从模式到内容，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刷新，尤其是文科的教育。

我第一个自然产生的问题：这个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先听听文革后出生的我被动接受过的说法吧：小学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初中是“社会主义四有新人”、高中是“四化的建设者”、大学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呵呵，为什么年级越高要求反而越低了呢？这是我较早意识到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意识形态要从娃娃抓起”，人越大就越不好哄，所以需要降低门槛，以同步地减少它与现实环境的脱离感，同时减少我对现行体制的怀疑。后来我发现，问题不只于此，因为从这些说法里，我只看到了一个个的政治面孔，看到了愚民与顺民的影子，除了政治属性，可看到一点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感情的“人”字在里面？可曾告诉我怎样成为一个有完善独立的人格、分析批判的思想的快乐的人？我只能遗憾地说NO！如果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我想说，这个官方的教育方针，本来就是培养体制化的工具的，本来就不是培养本色的“人”的！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教育是怎样进行的？

来看我用过的教材吧：理科的教材走的是在从古至今纷繁复杂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缓慢匍匐的路，以至于大部分理工科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后的数学水平还停留在十八世纪，除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性使用，对数学的深刻、和谐与美的本质一无所感，对进一步学习现代数学唯恐避之不及，遑论提出什么创见！文科的教材更是充斥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亦步亦趋奴颜婢膝，中心主题就是试图证明现行官方意志的伟大光荣正确，以及潜移默化地灌输另一种形式的“政权神授”观，唯恐被人想起自己还有质疑政权的合法性的天赋权力。

[...]

于是我得出阶段性结论：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教我思考的教育，更不是教我创造的教育，把它做一个极端的比方，就像是用污水在一张白纸上涂鸦，而我有幸，在自己这张涂鸦之作上，终于隐约地看出了“自主”二字。如果可能，我宁愿抹掉这将近二十年的“教育”，从头开始教育我自己，因为不让人热爱学习的教育，不使人充满创造冲动的教育，在我看来就是失败的教育。当然，这只是个狂想，但是我的下一代，决不应重蹈我的覆辙，为此我会争取有为，甚至

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做当车螳臂。

[…]

这些想法是我上大学后逐渐产生的，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哲学。可是当时我被哲学教育的拙劣形式弄得反感透顶。与我的生活经验不符、没有及时准确地反映科学的新发展、和我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相矛盾、缺乏从我的意识积累到书本结论的令人信服的推导，这些都是我想到的反感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不是当时我生活里真正自发需要的书，而是官方意志需要的书，不是试图贴近从而提高我的思辩水平的书，而是高高在上冰冷说教我的书。想到这些，我不能不产生至少为我自己的下一代重构一套建立在新理念上的基础教育的愿望，以我个人的微薄力量，我也许无法将这些理念形成完整严密的教材体系，可是我希望下一代或许可以因此而少走些我走过的弯路。学问本身就是美的、有价值的，科学不是光为了任何世俗目的而存在的，它就像我们这个宇宙一样自由自在地长久存在着，为全人类扩展科学边界的人，他们在科学中永生。我能做的，就是虔诚地靠近科学，间或分享一下它的美丽，管窥一点它的秘密。这次跨文化交流会议，促使我下决心开始把我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而不是让它们始终停留在头脑和言语中，因为时不我待。现在的我，正在铺展一个更加广泛的知识基础，尝试把目光延伸向各个科学领域的前沿，并且尽可能地寻求支持与合作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实践自由开放的学术形式。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新意的会议，一扇通向更加广阔天地的门。写下这些文字，以为自勉。

（陈江睿：一扇通向更加广阔天地的门，《跨文化对话》，第12期，选自34-40页）

长期合作关系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成立于1989年。如同其它非营利组织一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新型社团组织，中国青基会也经历了从蹒跚学步到独立行走的过程，面对非营利组织必将面对和解决的那些难题，有成功的实践，也有过失败。在此，我想借助中国青基会的个案经验，简单陈述几个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当前的实践中可能普遍遭遇的问题，并且就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谈一些设想。

我们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开始自己的旅程的。能否在这场深刻而又广泛的体制变革中把握发展机遇，创造运作空间，制订有效策略，推动社会转型，是检验我们这个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尺度。创业期是如此，现在也依然如此。走过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和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面对那些诸如“应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如何去做”这类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能力再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青基会成立之初，决定要做“希望工程”，目的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让天下所有的儿童都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明天”，是当年一批理想主

义者的热情冲动和不懈追求。在这一理想感召下，在一大批创业者的孜孜努力下，“希望工程”成为建国以来社会大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公益项目。1998年联合国授权机构——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在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中，知道“希望工程”的占93.9%；而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以各种方式参与并捐款的占63.5%。13年来，中国青基会联合各省青基会募集“希望工程”捐款共计20亿元人民币，以“一助一”的方式，资助了近250万名最偏远乡村最贫困家庭的儿童上学读书，同时改造和新建了9000多所希望小学。依目前44万余所农村小学计算，在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两所用民间资金援建起来的希望小学。在此基础上，一大批相关项目迅速涌现：从失学儿童救助到涵盖大中小学生的“希望之星”奖学金的设立，从建设“希望书库”到推荐希望小学校园歌曲，从乡村教师培训发展到建设信息化远程教育的“希望网校”。“希望工程”为贫困农家子女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条件，也为城乡大众提供了长期参与公益活动的实践机会。

今天，当“希望工程”已受到整个社会高度赞扬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公益象征能否继续保持其感召力，它的运作者——中国青基会能否最终成长为一个深得公众信赖、具有专业能力、富于社会责任感的非营利组织，是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顾晓今：中国青基会的实践与思考，2003北京会议发言)

什么是“第三部门”？

中国人第一次在媒体中频繁听到NGO这个词是在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大会包括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引起了不小轰动。由此人们把中国此前已经出现的若干民间组织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有些民间色彩的组织与国际上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运动联想起来，促进了这类组织在中国的发育。

NGO在中国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正是这一进程如今又使中国加入了OMC。随着中国的入世，NGO和OMC的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如何看待国际上“NGO反OMC”趋势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运动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两种全球化”以及它们的矛盾？

(秦晖：全球化进程与入世后的中国第三部门，
《跨文化对话》第十一辑)

谈到个人的身份问题时，美国的自由人士和社团人员声称个人的身份是由团体的性质来决定的。当然，我们属于一个既定的团体。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毋庸置疑，一个过于被五彩缤纷的当代社会所吸引和异化的人，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那些极端的团体人士，当他的团体成员身份抹杀了他的其他社会角色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民族扩张主义者。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还是整个人类的一员。因此，那些鼓吹团体主义的人和那些无所用心的个人主义者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是多元团体里的个人。

总之，我认为，面对新世纪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智慧，不断超越文化普适性和特殊性间的矛盾。推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

(王焱，《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为建设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国际研讨会，2003年2月26日至28日，北京大学，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译自基金会文件n° 3621)

环境问题是 21 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保护环境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家利益。环境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的大气、卫生的饮水和安全的食品，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与义务。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效的政府治理体制是改善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过去 20 多年，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进展，污染排放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正在开创新的局面。这些进展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政府环境与资源治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当前中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是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不曾遇到过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应对与合理的选择，以迎接环境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王毅：环境、发展与治理——何应对新世纪的环境挑战，收入《北京会议文件》杨建钢译）

北京会议的经验与续曲

联盟的第二步工作是从2003年2月北京会议开始的。会议充满激情、希望和困难，以上几个词就是我在会后的感想。

为抛砖引玉，我想再次提出我在会议之初提到的两个意象：

- 旅行
- 编织

先说旅行。如果把以前的征程比作平地行军，那么现在我们则到了大山脚下再说编织，我们已经织好了经纱，现在要编织纬纱，好使散线成匹。对一个好的织工而言，织错的地方就是进步的起点。

基金会正在经历一次彻底变革，现在只是开始，要拉起纱线，和合作者一起开工。我们的工作基础建立在集体愿望之上，建立在某个具体的项目之上。在联盟和基金会的新阶段，我们要和每一位合作伙伴协同合作，但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基础？构建一个更加负责、多元和团结世界的愿望，是不是足以使我们团结协作？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我们将依据怎样的日程工作？我们会用什么方法交流信息、协调工作？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方式是否有效？筹备北京会议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上问题。我把筹备、组织和举行论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告诉大家，以鉴来者。

- 谁来发起活动，谁来联络大众？ 谁会去做吃力不讨好、冗长、困难而又不可或缺的和组织工作？是FPH在它的“安息期”挑起了这个责任，是它在组织协调大众。今后我们要为各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对话做提前准备。
- 怎样使个人分享集体工作经验？ 不论对中国还是对欧洲，北京会议都是一个榜样。我们有丰富的资料可利用。大家以不同的方式为会议作出了贡献，有些细节的描述对某些人有意义，但对另一些人则未必如此。
- 怎样协调愿望？ 与会者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FPH的老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愿意参与这个大联盟。联盟的“元老”们、世界公民大会的成员和此次会议新结识的朋友们，他们不一定有同样的需求，怎样协调各种愿望？
- 怎样组织文化间对话？ 怎样组织不同领域和不同主题的文化间对话？怎么做才能避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怎样选择讨论主题？ 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很多：治理、水资源、工业生产体系、教育、人类责任宪章等等。计划相当多，每半天就要讨论一个重要而棘手的新议题。在不可能将每个主题都深入挖掘下去的情况下，怎样做才会不让我们的参与者失望？

- 怎样总结我们的思考，使之更直观？ 我们知道，也检验过，口头的总结不足以表现主题的丰富性。我们提议使用世界公民大会的方法。不是全体与会人士都知道我们的计划，乍听之下可能有些奇怪。但是要感谢大家最终都接受了这一工作方法。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我还想再补充几点，这几点我昨天早上也提到过：

- 怎样通过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不同地区间的开放性对话，制定出足以应对当前挑战的调整战略？ 居斯塔沃·马林昨天说：“联盟是激情也是方法”。我非常喜欢这句话。陈越光出席了世界社会论坛，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揭露暴行，都认为别样的世界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又该怎样去构建它。我们的雄心在于探讨怎样去构建，而不是树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是边走边干，摸着石头过河。

四场会议中讨论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好呢？皮埃尔·吴瀚提到了联盟大会上写建议薄的办法，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利用国际经验，从大会的四个主题出发，把我们这次会晤的内容落到建议簿上。

- 怎样将中方融入到思考中来，怎样以合适的方式使联盟的工作成果为中方所用？我首先想到的是里尔会议的结果：

—此次会议没能对里尔会议后中方提交的大会报告做细致研究。

— 赵佚峰和秦晖为人类责任宪章做出了突出贡献。蒋亚平和韩湘景在里尔会议之后就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辩论的操作方法提出了创新性意见。

二十一世纪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工作框架，有利于我们处理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利用基金会的三项资源，这一点昨天我也说过了：

- 第一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是人力财富。我们常常把它称作“社会资本”。它不仅包括人的能力、经验，也包括对多元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还包括可依赖和适合进行对话的朋友。负责、多元和团结世界的联盟永远不可能像

布什先生那样，拥有飞机和火箭，也不会拥有大银行的雄厚资本或者大企业里的工程师，我们拥有的，是一些珍贵的知识和经验资源，还有彼此间的信赖。所有这些是我们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应该共同分享。

-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提案。皮埃尔·吴翰今天早上已经给出了例子，向大家展示了雅温得会议和 APM 计划的所有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总结出了 11 个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了集体多方反复鉴定。所以每一次发言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每条提案背后都有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在作支撑。
- 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方法。我们使用了包括图表法在内的多种工具，创建了网址，构建了经验交换网。我们曾希望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能在中国联盟网站的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网站的建立不仅能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也能让联盟在中国的工作为世人所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提高警惕、戒骄戒躁，就像米歇尔·苏盖所说，这是我们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合作的珍贵成果之一。通过上海市政府信息发展研究中心何承和中国市长联盟合作，我们将实现建立资源中心的构想。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人类挑战的最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我们怎样才能使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完美结合？个人怎样在集体中定位？

在开幕式上，我想把我个人有关联盟第二步工作的意见与大家分享。我把它总结为两个词：连接和扩大。

连接：这次会议是迈向连接的很好的一步。剩下的工作是找到具体、行之有效、节省时间和经费的方案：要团结中国国内力量、要使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必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找到财力和物力支持。我们都看到了各个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它们能对此助一臂之力。

扩大：怎样延伸到其他领域里去呢？怎样将普通个人、思想家和其它网络，如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联、工程师联盟、企业家和大学学者联盟等团结起来呢？所有来到这里的杂志、影视、出版界朋友们，他们怎样才能开展集体讨论，传播意见、深入研究、适应和参与中国的现实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蒋亚平提及的中国日报在电子论坛中的重要作用，我也想到高宏明拍摄的世界公民大会的纪录片相当出色。

以上三点是为了说明今天下午的讨论不是要结束会议，就像会议本身的目标也不是要总结过去的 10 年那样，而是要以史为鉴，再创辉煌。

(皮埃尔·卡蓝默：闭幕词，北京会议，2003)

两个目标

我们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已经十多年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互相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这一次的会议，我们希望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是要把基金会最近提出来的一个理想——建设一个负责，多元，协力的世界这么一个基本理念传播到中国，传播到很多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理想的人的心里。我想这一点，我们最初的愿望是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十家新闻媒体参加了采访，卡莱姆先生和我还有陈越光先生，

我们都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关于这个会议的讲述。

另外我和卡莱姆先生在25号接受了北京最大的网站，人民网的邀请，在那儿回答了全国网友们的问题，我们两个人一共回答了37个问题，一共是两个多小时。人民网的网友是很多的，我们已经使“建设一个协力、多元、负责的世界”这种理想传播到很多人的心里，甚至传到台湾，因为问我们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台湾网友提出来的。

在这一天下午，卡莱姆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也与“建造一个协力、负责、多元的世界”有关。到会的一百多学生，对这个报告的反映是强烈的，他们纷纷讨论，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也有反驳的意见，可是这样一个报告促使了他们去思考很多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

另外我们三天的会，不断有人来旁听，不断有年轻的学生和外界的，不是我们邀请的一些自己想来听的人来听，特别可以接触到比方像地球物理系的退休教师，还有原来是经济学教授，现在在研究天人问题的一位老师，他们都没有被邀请，可是知道以后闻风而来；来参加的学生有清华的，也有北大的，他们中间有一位是清华高分子化学的研究生，一位是北大国际金融的研究生，还有一些本科生。他们都是由于理想和兴趣的吸引，才坚持参加了三天的会。因此我想我们基本达到了第一个目的。

第二是形式方面的。就是我们想改革开会的方式，我们特别不喜欢过去那种学术会议的形式，几个人坐在台上念报告，时间非常紧张，二十分钟一个，没说完就赶快结束，讨论的时间很短，而且与会者没有时间真正动自己的头脑，开会对于广大听众来说，只是来接受一些别人的结论。这次会议，在基金会的倡导下，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会议的形式，就是重在参与，这个会开得好不好，不是主席的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关键在于我们大家是不是真正参与了。因此我们开会的方式就跟过去不同。我们提出对每个与会者来说，开会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们并不是要接受一个已经创造好了的结果，而是要参与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我们自己创造和产生结果的过程。这一点我想我们也做到了，大家对这一次的讨论方式非常感兴趣，我们先有几个人讲一讲自己的看法（不是长篇大论念稿子），然后大家分成20人以下的小组讨论，小组会先有几分钟酝酿，把你的想法归纳一下，写成一些小纸条，贴在墙上，这是里尔会议的经验。对于这一点，坦白的说，开始时我是怀疑的，有没有用呢？是不是也很形式化呢？经过几天的实践后，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第一是它帮助我们在讨论以前，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我们原来如何想，现在如何想，有什么反对的或补充的意见，然后把它们按照不同的分类贴出来。这样，不仅启发了进一步思考，而且把这最原始、最个人的思想过程，作为资料永远存留下来，需要综合的时候，就会有丰富、具体的材料来进行综合。

关于这一点，我想Vincent所创造的那个软件起了很大作用，它按照贴出来的每一张小便条来进行电脑分析，立刻制成统计分析图表，让人一目了然。Vincent在北京大学开了一个软件演示会，到会的人比参加Pierre calame的学术讲座的人可能要多1/3，那个教室里面挤的实在是站不开了，可见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大家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我想对于这样一个软件，这样一种讨论方式是非常赞赏的。

以上是关于我们的大会达到了什么目的。

(乐戴云：闭幕词，收入《北京会议资料》，杨建钢译)

为了一颗理想的种子和它的一千年的未来

我们这个历时三天的“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进入了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来到大觉寺举行我们会议的闭幕式，我们企图把我们整个会议所经历的思考，想象，疑问，困惑以及曾经有过的，或者会议上产生的梦想——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在这个场合有一个表述。在今天会议的闭幕式上，我们有一位特别嘉宾，他是瑞士驻华大使 Dominique Dreyer 先生，他的中文名字是周铎勉。大使先生比我们先到会场一个多小时，一是因为路途的关系，另一个是因为我们先参观了这座千年古刹，它实在太迷人，对于一个跨文化对话者来说，除了人和人的对话还有跟悠久历史的对话，所以请大使先生原谅我们。

让我们感谢法方主席卡莱姆先生，他的二十分钟的会议总结给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他不是用一个概括答案的方式来做他的总结，而是用把问题做出归纳的方式来做他的总结。这非常符合我们大会设计中的一条原则——从问题到问题的深入。他提出的九点思考将使我们进一步把这条原则贯穿到这个会议的闭幕式中，使我们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提炼出“问题-方法-智慧”这样一把思考之剑。

中方主席乐黛云老师的总结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会议的宗旨。尤其她表示愿

用10年时间，为“建设一个协力、多元、负责的世界”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在这个所谓时尚潮流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快餐文化时代，为了一种理想去播种，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这种情怀和责任感，是我们会议精神最好的写照，也是我们这个会议将产生积极成果的象征。刚才乐黛云老师说，我们会议的代表除了邀请代表以外，有大学生、研究生、退休的老教师、律师、记者，各方面自发的与会者不断参与进来，这说明我们的会议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会议。接下来我们的闭幕式要进入最后一项，我们以全体会议的形式用三个小时就对未来的设想、建议与提问进行开放式讨论。我们希望它体现我们会议的另一个特色：全员参与——每一个在座的人，不管您是正式代表，还是自发与会者，还是会议代表的客人，坐在这里您就是我们会议的一员，就承担着对这个会议成功与失败的一份责任，因此您就必须对会议贡献您的发言：可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会议的评价、建议、批评，和您参加会议的感受；第二方面是对今后的设想，您自己的工作，和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以及在建设一个多元、协力、负责的世界中怎样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与互动。今天出席会议闭幕式的有近七十人，所以每人发言不要超过三分钟。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个会议到了可以说结束的时候了，但我们的心情却好像是一种开始，一种新境界的开始。对于我们的会议，我想借用今天会场内外的两个实物来表达一种感想，先请大家抬头看看会议室的这个大吊灯，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小灯泡组合而成的，我们正好在一个千年古刹里面开这半天会议，使我想起佛家解释无碍法界所用的一个比喻：“一室千灯，光光互遍，重重互摄，不相妨碍”，就是一个房间里面点着一千盏灯，每一盏灯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光芒，也在吸收其它灯发出的光芒，一灯之光不碍众灯之光，众灯之光不碍一灯之光。我想我们的会议过程，以及我们所要建设的公民社会过程，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协力、尽职、多元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再请大家了望一下会议室外面那一棵千年银杏树。我在想，我们会议提过一个要求：一切过程都有记录，一切过程都有反馈，一切过程都有追溯，这棵银杏树能够如此巍巍壮观，值得人们用崇敬之心去瞻仰它，这不会是在一千多年以前，而是在它拥有了一千多年历史以后，所以历史意义往往是在追溯中发现的。一颗种子即使被称为“伟大”也只是对它未来的一种期待。我们这个会议，已经把建设一个多元、尽职、协力的世界这样一颗种子播下去了，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劳动还需要历史性的创造！所以，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要求每位与会者能给这颗种子浇第一桶水——每个人给会议秘书处反馈三百字以上的提案。同时，希望我们的与会者今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树木，就能想起您有一颗种子播种下去了，这颗理想的种子和它一千年的未来在期待着您，需要您的尽职！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跨洲际的会议过程中我们的翻译非常辛苦，质量非常高；我们的速记员，差不多每次会议都有五、六万字的记录稿；我们的小组记录员除了讨论记录以外还要每天晚上和万森做图表处理，我们每天早上看到的图表，都是他们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十一、二点的结果；我们所有的会务工作人员，为会务联系、文件准备、场地安排、食宿交通付出辛勤劳动-----他们的名字不在会议手册上，但他们同样用他们负责的态度，协力的态度在为我们共同的理想所工作着，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们所要建设的另一个世界不是乌托邦，是可以现在这个世界中发芽的。让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陈越光：闭幕词，2003 北京会议)

北京归来，我们将做，并且倾听

三月二日下午返回巴黎。睡一天一夜之后，去大学上课。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会后越光在北京还住进协和医院，汤老师心脏病发也住了院。北京会议是一个奇特的磁场，上面的各个电子超速转动。大概只有基金会的人马没有倒下，至少现在没有倒下的迹象。嘉特琳，皮埃尔和繁森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工作台前。北京会议的法国梯队各个精神抖擞地投入总结、报告、规划，忙得脚底朝天，连午饭都集体进行，电话一律留言不接。进入战事状态？修炼状态？可是战事需要无时无刻与外界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

清晨，我去卢森堡公园锻炼。春风悄悄带来绿色，树丫带着满枝苞蕾伸向蓝天，鸟儿不停地和你逗乐。真美啊，生命！我不禁想到浮士德，我没有和魔鬼签约，赞美美丽不会要我的命。我默默地问：基金会的大象，森林，水手，写作的芦苇，舒适的盖子，优雅的嘉特琳，“神奇”与“隐士”和“绅士”们，你们怎么舍得躲开春天的鸟儿？

我的朋友们——那个从1972年起就用中文唱“东方红”的胖先生（虽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听懂他在唱什么）；那片北京柔和的蓝天下茂密而又其乐融融的“奔腾”树林；那位上了年纪喋喋不休的身边总围着印度人的海员；那根一直写个不停，甚至彻夜无眠的芦苇；那张饱含了激情的漂亮封面；那位像消防队员一样，冲上五楼扑灭计算机火苗的好人；那位有幸地得到上帝启示的人；那个无所隐瞒的修士；那位高尚智慧，严肃下透出幽默的编辑；那位因沉着镇定而闻名的中国女学者，一个身上闪烁着从容和优雅光辉的女人——这些朋友们今天都在哪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刚刚回到一个地方，那里正发生着一些奇迹。

我们都在和时间抢时间。可是时间是一个不能定义的东西。人的生命以年计算，而大千世界以劫为单位。劫有大中小三种。小劫与人的寿命最接近。从十岁开始算，每一百年加一岁，一直到八万四千岁，之后，又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回到十岁。这么一来一往，用去一千六百八十万年，称为一小劫。这么想来，我们生命的时间对于宇宙，大概就像我们鸟儿和人类。

(金丝燕：蓝天下，收入《北京会议资料》)

前瞻

团结产生智慧——中国与 FPH 合作创新

一瞥

2004-2005年，在FPH的有力支持下，中方人员广泛参与的七项计划得以实施：

-皮埃尔·卡蓝默关于大学改革问题的讨论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行。(陈越光、金丝燕工作跟进笔记 n° 22059, n° 22132, n° 22144) ；

-皮埃尔·卡蓝默治理问题圆桌会议的相关文章载入《中国妇女》杂志，（陈越光、金丝燕、皮埃尔·卡蓝默工作跟进笔记 n° 22208）；

-有关治理与构建和谐社会辩论会在山西行政学院举行，与会人员：皮埃尔·卡蓝默、乌斯马纳·西（Ousmane Sy），黛琳达·保利瓦（Teolinda Bolivar），陈力川和弗朗索瓦丝·马塞。

-与 IRG 合作开展中国政府官员培训调查。(陈力川工作跟进笔记 n° 22524, n° 21648 ；皮埃尔·卡蓝默工作跟进笔记 n° 22327) ；

-科技发展国际治理论坛（2005年6月4-5日，中国科学院信息与档案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中外各界人士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的成果（翻译资料）发表在《科技中国》杂志和论坛创建的“治理”网站上。皮埃尔·卡蓝默的著作《破碎的民主》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在此次论坛上分发。《科技中国》和《跨文化对话》两家杂志社都为北京治理论坛出版了专号。借此次论坛之机，马丁·韦拉禹斯（Martin Vielajus）、朱丽埃特·德高斯代（Juliette Decoster）、金丝燕和陈力川将所有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转换成 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格式。（陈越光、陈力川工作跟进笔记 n° 22230, n° 22525; 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18 ；皮埃尔·卡蓝默工作跟进笔记 n° 22 321) 。

-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协办的渔业与海洋养殖业参访团计划（2005年8月17-31日）在“可持续食品实验室”计划框架内实施。中外三十余人参与此次访问，集中讨论了渔业、海洋养殖业、水产饲料和垂钓资源治理等问题，使得中国在该领域与世界组织建立了联系。（皮埃尔·吴翰、金丝燕 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n° 2966, 工作跟进笔记 n° 22745)。

-《跨文化对话》杂志。该杂志由FPH与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合办(2005年1月)，是我们的特别合作方。皮埃尔·卡蓝默任该杂志学术委员会委员。

-《跨文化对话》的成功改版。（金丝燕工作跟进笔记 n° 21849, n° 22742)。

2005年北京治理论坛

中国确实存在民间社会吗？如果存在，它是否能被组织起来，自主赢得民主身份？如果不存在，那么怎么解释二十年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迅速繁荣，怎么

解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健康和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对于以上问题，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

(陈力川：《中国民间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译自基金会 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
常设文献库) n° 3 287)

心系国家改革

对于有些人来说，不论何时何地，国家都是心中的港湾；而对于另一些人则相反，它是寄生官僚机构的载体。在“多些国家”或“少些国家”的争论之外，一些人呼吁给予公众行动应有的权力，进行必要的革新。他们的建议(积极辅助政府、联接政府各层……)以自身的职业经验为基础，是他们在法国和国际机构中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切身经历。

(皮埃尔·卡蓝默的《心系国家改革》已经由胡洪庆译

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非政府组织的不同类型

50年代初，为重组社会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这一时期，八大联盟组织得以成立，有些直到今天还起着重要作用，如共青团、全国妇联和全国总工会。这些机构从属于政府机关，它们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就是公务员。这些“群众组织”和通常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但它们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网络，在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FPH的中方合作者不属于这一类。

1979年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公私领域出现了一些盈利性团体，其发展速度一日千里，这就是“社会团体”。1989年以后，政府试图规范这一领域，并于当年10月颁布法令，对社会团体的注册和管理作了相关规定。十年后，政府又制定了具有补充性质的管理条例，管理社会团体的临时注册和民间的非商业团体。根据以上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民政部注册，并由一个政府性质或准政府性质的机构监管，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作“婆婆”。“婆婆”要盯着媳妇，媳妇不能乱来，她做任何事情都要得到政府和国家的认可。中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几乎全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机构”。这是中国特有的矛盾现象。根据规定，非政府组织可以针对某个特定领域在某个行政区域注册，注册后只能在该区域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些可以被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其实根本不符合非政府组织的传统定义：“独立于政府和政府行为的组织”。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名无实，较之于政府，它们处境尴尬。FPH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合作方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

中国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们没有正式地位，但依然能够为社会做些事情。这些私人发起的组织被官方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们不需要在民政部注册，而是像非盈利性企业一样在工商部注册。这就意味着它们不仅不能像非政府组织一样享受税收减免政策，而且还要交税，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影响了它们开展活动。这些单位无疑最接近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但FPH还没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历史背景与当前状况

1995年第四届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举办之前，中国人对非政府组织知之甚少。大会以后，由于媒体的重点宣传，一些非政府组织慢慢建立起来。另一个转折点是1999年清华大学组织的非盈利产业和中国发展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为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不论这两次会议多么重要，它们都只是外因。中国民间社会的崛起根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非政府组织的繁荣就不可避免。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00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在1000到3000美元之间，非政府组织发展所需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到2005年，有近300000家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注册，其中半数是“社会组织”。还要指出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正式注册的民间机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已有120000余家。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总数已达三百万。考虑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对这一数字，还应持谨慎态度。

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自然之友等环保机构最为积极。今天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这类组织，并依靠它们解决一些环境问题。环保机构也参与教育、研究和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从1972年起就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但直到今天，中方在非政府组织的2236个议席（2000年统计数字）中只占有13个。从1998年开始，唯一一个享有特别咨询资格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颇具讽刺性——仿佛在指射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力不从心。

这样小的比例揭示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不具有国际规模。具体来说，和红十字会、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大赦国际、ATTAC等国际知名非政府组织不同，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没有分支机构。从广义上来讲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人员多于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大多数还处在起步阶段。

-问题与展望

除了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是否清晰这一关键性问题，还必须指出，比起政府建立的非政府机构，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运作经费问题上。此外注册也是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不仅要去寻找某个政府或准政府机构来做担保，还要自掏腰包，拿出三万元或者更多的注册费，有时候政策也不允许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一直发展下去。一旦注册成功，他们又常常要顾虑监管机构的政策，不能自己做主。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注册，他们今后的发展就成问题，要随政治风向而动。

经费问题上，由于资金运作缺乏透明度，发生过几次经费挪用事件和资金丑闻，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大众眼里的形象大打折扣。2004年6月1日颁布了新法令。它在基金会注册和管理方面引入了新规定，该规定允许基金会拨出10%的经费用于自身管理。以前基金会要遵循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的规章，而这次改革虽然只涉及某一特定的非政府组织，但却是一次重新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尝试。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由于存在法律空白，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它们处境尴尬，其原因有二：1. 它们的存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意愿，其活动随时可能被中断。如果要在某个省扎根，处理比较敏感的问题（如艾滋病）就更加困难；2. 从实践来看，他们不能享受进口免税，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在中国筹集资金，在地方招募工作人员也有困难。虽然活动空间有限，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是在九十年代就进驻中国，到目前为止，已有500家取得了中国政府认可，其中有一些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了重要工作，其中包括法国世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和沛丰金融。

虽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基金会要依赖中国政府、缺乏独立自主性，但中国实施的某些金融政策为它们进入中国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途径。某个领域的项目是否可行，取决于它们与地方合作者是否相互信任。双边和多边合作最近几年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但是因为政策关系，目前的合作伙伴也仅限于中国那些体制内的、非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出资方对私人机构的兴趣日益浓厚，正在考虑就行政能力和经验传授等问题，开展加强民间社会的合作项目。

(陈力川：《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关系》，译自Fiche Bip (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 文件 n° 3 287)

破碎的民主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仅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而且也是时代的变迁。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各社会之间、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猛烈冲击着思想体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机制。我们传统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标识已遭侵蚀，传统的团结互助已遭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张的继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我们必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

科技的迅猛发展、商品关系的统治和地球平衡发展面临的新威胁正在动摇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想和机构体系。我们传统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岌岌可危。数世纪以来建立的团结力量正在削弱，而民主的滥用，已经使它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头口号。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循环的起点，要继续运转就必须建立新的伦理模式、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创造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从而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笔者倡议进行一次真正的治理改革——人类社会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即创建代表性机构、程序、规则、社会实体、礼仪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实践，并让这一体系能够自行运转，进而实现治理理念。

（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高凌瀚译，三联出版社，2005年）

第一届治理论坛（2005年6月5-6日）

本届国际论坛的主题是“以科技为指导，反思治理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此次论坛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第一：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论坛。论坛的举办地设在中国。当今中国，是一支正在崛起、让人欢喜让人忧的力量。此时，中日关系正陷入僵局。

2) 第二：此次治理论坛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走向问题。全球化带来了重估西方民主模式及其价值的新思潮。随着相关思考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公共事务管理和政府治理模式。面对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中国制定了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本届治理论坛是一次思想交流盛会，旨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一己之力，尽管这种力量很微薄。

3) 最后，治理论坛决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开展活动，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网，相关工作将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 挖掘理论深度
- 传播思想
- 个案研究

II. 与会人员：

此次论坛的与会人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二名评论员和发言人，以及近三百名研究人员、企业家、政府官员、学生、非政府组织成员和记者。

- 外方与会人员：

1. 贝特朗·德·拉·夏佩尔先生：法国外交部前参赞，新交流技术专家。主题发言：“治理是一个老话题，但今天我们必须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给出新答案。”

2. 雅克·泰斯塔先生：国际药品与健康研究院 (INSERM) 主任，生物学专家。主题发言：“在科技发展的挑战下看治理与民主。”

3. 皮埃尔·卡蓝默先生，人类进步基金会会长 (FPH)，治理问题专家。主题发言：“治理与市场——多层面商品和服务体系中市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4. 阿勒菲多·裴纳维加先生：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主题发言：“教育治理问题以及大学与社会间的新契约。”

5. 泰奥林达·波利瓦尔女士：建筑师、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教授。主题发言：“公共权力以及居民间的合作关系。”

6. 乌斯马纳·西先生：马里地方事务部前部长，非洲协同治理网络创始人之一。主题发言：“治理虽然是世界性问题，但各方需依照自身情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 中方评论员

1. 陈方正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物理学家。《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始人之一。

2. 杨焕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所长兼教授、中国驻世界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代表。
3. 徐永光先生：中国政协委员、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4. 王元先生：科技部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5. 翁永曦先生：金通投资管理公司总裁、中共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办公室前副主任。
6. 吴明瑜先生：中国科技部前副部长。

III. 论坛媒体合作方：

1) 六家杂志社：

- 中国科技部：《科技中国》
- 中国科技部：《中国科技论坛》
- 中国科学院：-《电子政务》
- 中国科学院：《科学文化评论》
- 《跨文化对话》
- 《新闻周刊》

2) 八家报社：

- 海外版《人民日报》
- 《科技日报》
- 《科学时报》
- 《北京晚报》
- 《北京青年报》
- 《中国青年报》
- 《光明日报》
- 《新京报》

3) 三家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凤凰电视台

4) 四家网络：

- [<http://www.cc.org.cn>] (世纪中国)
- [<http://www.kjzg.com.cn>] (科技中国)
- [<http://www.sina.com.cn>] (新浪网)
- [<http://www.people.com.cn>] (人民网)

IV. 文章刊载:

- 1) 《科技中国》2005年7月为治理论坛开设专号。
- 2) 《电子政务》杂志刊载了治理论坛的系列大会发言。
- 3) 《跨文化对话》刊载了治理论坛部分文章的中文翻译。
- 4) “世纪中国”在其网页上 [<http://www.cc.org.cn>]刊登了论坛的全部发言稿。
- 5) 其他报社也有部分文章发表。

V. 发表计划

大会之前，将活动安排及相关翻译资料分发给每位与会者。
讨论会文件与相关治理发言，将另行结集出版。

(金丝燕，陈力川：治理论坛简介)

总结与日程

人类间、社会间、人类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人口增长、环境压力加大、权力日益集中和财富两极分化。欧洲乃至世界近两个世纪以来沿袭的发展模式已是明日黄花。当今社会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没有合理的机构设置，缺乏公正、负责和团结的态度，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但人类的征程将继续。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我们思考和感受的方式、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联系和行动的方法都在经历深刻变革。不论老少富贫，无一例外，都处在这些变化当中，但是大家似乎都认为这些挑战来势凶猛，人类既然无力应对，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于是乎，人人视若无睹、安置若素。我们反对这种消极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基金会的信念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94 年以来，基金会致力于创建一个“负责、多元和团结的世界”联盟。我们相信唯有通过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间的对话，共同的愿望才能达成，一致的目标才能建立。在对话领域，2001 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堪称典范，它促成了国际主题网、社会职业网和全球文化网的建立。这些网络不局限于分析问题和说明局势，而是提出了若干可行的建议、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世界大会激起了各大洲数千人的热情，将二十一世纪人类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从辞源学的角度来说，这才是“日程”的真正含义，即待做之事。基金会 2003-2010 的工作计划就是根据该日程制定的。

日程记录了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和需要推进的两大变革：发展模式变革——生活、生产、消费和交换模式；治理模式变革——组织和治理社会、保障稳定和公平、维护多样性、坚持百家争鸣以及为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统一两大变革的，是伦理规范。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需要有公认的道德准则：历史、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区别不是根本差异，不能妨碍我们去寻找公认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来治理世界。

世界共同体不会从天而降，我们必须动员多方力量，来创造、设想并实践。孤雁难飞，正如保尔·利科（Paul Ricoeur）所说：“团结产生力量，人们一旦各行其是，力量便随风而逝。”要建立世界共同体，就应该团结各种力量、交流各方经验。对于基金会而言，建立世界共同体要和分享经验紧密联系，这项原则需要在各个层面予以落实。

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治理、伦理、替换发展和建立世界共同体穿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关系建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事交织，本质上相互依存的世界。现行的教育、科学、思想、道德、生产、政治和行政系统互无联系，人们认为这种独立性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它标志着西方理性的胜利。但是，这正是知识、道德、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危机所在。基金会重视关系治理：协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协调人员之间的关系，协调地方和整体的关系，协调文化间以及问题间的关系。管理统一性和多样性、承认差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是治理和伦理的关键所在，是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中心议题。

建立世界共同体不是要像过去那样，构建大的集体行动体，行动体内部有

上下级之分。世界共同体是一次组织机构上的大革新，我们将按照联盟的模式，用共同的目标，把个人和组织团结在一起的同时，保持他们各自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建设多样与团结的世界需要我们调节一致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多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地球文化、社会职业和多样主题，我们既要表现多样性的这三方面，又要加强对多样性的总结。双管齐下的原则将指导我们进行治理改革和基金会的管理。1990-2002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主题项目；2003-2010基金会的计划将会有所改变，与我们对治理的关注相适应，工作的重心将放在管理同地区基金会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上。

我们确信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并承认有些改变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如何去实现这些变革？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不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我们要换一种眼光看世界、要换一种方式处理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要发展技术与科学间的新关系，建立另一种教育体系和另一种治理模式。在所有这些革新之中，理念的革新才是重中之重。基金会应该将思想领域的革新放在工作首位。十年来基金会通过与世界各方的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举行活动、发表讲话、提出意见以指导行动、实现着日程规定的治理、伦理和交替发展模式三项首要任务。我们重视和不断丰富着知识型财富。如今，基金会对自己的定位与以往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评估他人成绩和编织关系网的工具，也是信念和意见的载体；它试图创建新的治理理念，制定人类责任宪章，更新经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模式；它推动着建议和计划的实施，希望与志同道合者分享经验并开展合作。

最后，我们可以将2003-2010年的计划总结如下：

基金会致力于为长期性的社会变革贡献力量。它以世界共同体构思为指导，力图推进三大改革：治理改革（社会、政治和机制调整）；共同伦理的制定（人类责任宪章）和发展模式的改革。基金会将兼容多样性（各层面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统一协调各方关系，保持地方行动的一致性）。基金会的三种行动方式是：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倚靠市民联合组织；推进和丰富行动方法。

(FPH, 2003-2010 计划概述)

前瞻 1 中欧论坛

近现代的中国落后贫弱，饱受欧洲列强凌辱。近二十五年来，中国日益崛起开始在国际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欧的交往激起了各界的隐忧和强烈兴趣。

如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样，中国的崛起对欧洲来说也是挑战，双方必须付出努力，才能相互理解和达成合作，退缩和保留只会留下遗憾。欧洲曾经面对的许多难题也成了今日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激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讨论。

- 环境保护
- 研究节能和节省原材料的生产及生活方式
- 跨国集团对中国的影响
- 中国国内流动人口增加；欧洲国际移民成潮
- 人口的老齡化
- 大都市治理
- 身分认同与民族主义
- 社会公平与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中欧论坛在传统的会议模式之外还创造机会将关乎两方社会发展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期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并提出可操作的合作计划。

2005年9月第一届欧洲论坛在中国举办。主要与会者包括：米歇尔·罗卡尔、吴建民、约尔迪·普约尔，米兰·库昌，让·路易·布兰热在内的150名大学学者外交官和中欧记者。第一届论坛的成功举办让中欧都满怀期待，希望双方的对话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二届中欧论坛将于2007年10月4-7日在欧洲举行。会议分两步走：

* 2007年10月4-5日：四十余个社会职业及主题工作组聚齐欧洲的近千名代表。

* 2007年10月6-7日：召开布鲁塞尔全体会议。

中欧论坛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支持。论坛由以下机构发起：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BICCS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欧洲华人协会的友谊机构：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外交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以及澳门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中欧论坛负责协调方为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

（让-保罗·德拉特：《社会对话——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译自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文件），n° 7）

现如今中欧关系赢得了广泛关注但也激起了不少忧虑。

如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样，中国的崛起对欧洲来说也是挑战，双方必须付出努力，才能相互理解并达成合作，退缩和保留只会留下遗憾。欧洲曾经面对的许多难题也成了今日中国的问题，如人口的老龄化、流动人口增加、研究节能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大都市原材料治理、协调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公平间的关系，以及探寻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中欧论坛在传统的会议模式之外还创造机会将关乎两方社会发展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期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并提出可操作的合作计划。

2005年10月第一届欧洲论坛在中国成功举办。主要与会者有米歇尔·罗卡尔、吴建民、约尔迪·普约尔，米兰·库昌，让·路易·布兰热。第二届中欧论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目标是讨论当今世界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二届中欧论坛于2007年10月4-7日在欧洲举行。会议分两步走：

* 2007年10月4-5日：四十余个社会职业及主题工作组聚齐欧洲地区的近千名代表。

* 2007年10月6-7日：召开布鲁塞尔全体会议。

中欧论坛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支持。由以下机构发起：

-现代中国研究中心（BICCS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欧洲华人协会的友谊机构：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以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论坛筹委会成员包括：

吴建明先生：前驻法任大使、外交学院院长，

何建立先生：霍英东基金会秘书长，

宋新宁先生：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彦先生：欧洲中国知识分子联合会成员，

密歇尔·罗卡尔先生：法国前总理、欧洲议员，

乔治·贝尔图安先生：让·莫奈馆前任助手、欧洲运动名誉主席，

保罗·张万亭先生：前欧盟驻世贸组织大使，

皮埃尔·卡蓝默先生：人类进步基金会会长。

(中欧论坛)

前瞻 2 中印论坛：迈向文化间对话的第一步

2007年2月25-27日，中印青年齐聚北京筹备中印论坛。这次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和《跨文化对话》杂志社的支持。FPH发起的这次聚会旨在籍中印两国青年的参与，评估举办中印论坛的可行性，从而加强两国间的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互往。数名来自班加罗尔和新德里的印度青年与来自北京、上海及南京的中国青年开始了论坛的筹备工作，FPH试图通过青年间的对话及交流，将讨论推广到中印社会职业各界。会晤组织了主题讨论组，针对以下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环境问题，尤其是水资源和能源问题、两国文化交流中儒教与佛教的作用、妇女地位、健康特别是艾滋病问题、科学技术对发展的作用以及教育的重要性。以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大挑战，青年一代的责任心与创造性为基点，拟定了中印论坛基本问题宪章，并筹备建立2010年中印公民大会先头工作理事会。会议决定实施第一步计划，即2007年秋派中国青年代表团赴印度班加罗尔和新德里访问，与印度合作方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该代表团将由来自中国各地、各职业界的青年组成：大学学者、记者、企业家、科学家以及艺术家。中印论坛筹委会将在未来几周内开通网站，并开展“工作共同体”主题讨论，社会职业各界的活动也被提上日程。旅行结束之后，访问团青年将发表宣言，推进2008-2009年的工作，正式宣告2010年中印公民大会的召开。中印论坛先头筹备理事会负责人将在第一年内研究并起草一份经费计划。活动运作经费将由企业、基金会、联合组织、大学和大使馆共同筹备，以期帮助实现2007年中印青年印度会议，并保证各种计划活动顺利实施。

(居斯塔沃·马林，2007年)

青年的责任感与创造力将改善 21 世纪的中印关系 (2007-2010)

中印是两大文明古国。两国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为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国互滋共长，为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若干世纪之前，中印人民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中国历史上的两位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取经于印度，而鸠摩罗什和达摩祖师则带着印度的佛经来到东土。他们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伟大先行者。时至近代，两国人民在争取各自国家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彼此同情、相互帮助。如今，中印都踏上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向世界昭示了亚洲崛起的潜力。中印在多个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在各方面有了良好发展。两国还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共同迈向和平与繁荣，中印关系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要将中印关系落到实处，就要发展双边合作、着眼于未来并培养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印青年领导人要具备前瞻性，对待中印关系，应顾及长远和战略利益。把握时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并开展全方位合作，从而加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印两国间存在过不信任。2006年中印友谊年的举办，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取得了长足发展”。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积极投身于建设一个“负责、团结和多元的世界”，它从1991年起关注中印交流，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借鉴。中印公民大会的举办，加强了中印友谊，推进了中印合作，有望通过实施一系列计划促进亚洲复兴。2007-2010年我们任务是实现文化间对话、个人交流、安全旅游与公平贸易。

中印论坛的发起者是几位中印青年（Anugraha John, Deepa A G, Mandakini, Prateek、叶伟达、赵天汲和陈顿斐）。2007年2月，在FPH的支持下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论坛同样得到了居斯塔沃·马林先生、陈越光先生、赵白生教授、乐黛云教授、金丝燕教授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计划不可能实现。

中印论坛的目标

- 鼓励中印文化与历史的多元化发展。
- 加强文化间对话、促进知识交流、凸显两国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
- 建立信息畅通、合作积极的公民网、正确认识文化间互信及其重要性、正确看待地区及全球性问题。
- 推进和平、巩固民主、治理负责、持续发展、扫除障碍。
- 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交流：环境保护、信息及交流技术、教育及中印文化交流。

展望2007-2010中印论坛

中印论坛将成为政府官员、各界媒体、宗教领袖、农民、青年、妇女、企业家和其他各界人士以及教育机构的交流平台。它将通过两国公民的文化间对话，建立和谐稳定的友好关系，使得两国实现互相理解，创建非暴力社会。

我们将在三年内开展以下计划：

2007：中印论坛青年节

2008-2009 : 中印文化间对话, 讨论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以及和平问题。
2010 : 中印公民大会

(居斯塔沃·马林, 2007年)

前瞻 3 中国食品实验室

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问题讨论会将 2008 年 4 月 7-17 日在中国组织的“实验室”的计划上提上日程。

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努力提高农产品数量，以解决一部分居民面临的供给不足问题。但是将来，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大众对农渔业产品能量和质量的重视必将成为关注的新焦点。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应对营养问题，如不健康饮食。一部分人只是吃饱了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摄入了足够的可供日常需要的热量，但是从营养结构上讲，身心所需的微量营养元素和维生素却很匮乏。

与此同时，在不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因大众的不良饮食结构和缺乏运动而导致的营养过剩乃至体重超常现象非常普遍，患肥胖症的人数在迅猛增长。肥胖为身体带来了额外负担，肥胖者的数量在今后几年还将成倍增长。

全球还面临着过渡开发资源问题，具体包括：密集型农业开发、过度垂钓、农产品企业开发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性使用。

食品质量、健康标准和环境标准的提高都威胁到食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将要面临的大问题之一。

怎么办？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现有的食品发展体系，并充分认识它的有限性；要么在发展食品体系的同时，将食品质量、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并重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现今取得的经验为起点，我们或许可以展望未来可持续农业体系发展进程。

务必坚持在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各层面同时展开工作，以便多方位治理。这个目标的实现，既要依靠政府部门的良好意愿，同时也要依靠有志之士的具体努力。

现阶段，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显得同等重要，即在地区和国际领域启动多方机制以解决复杂问题。依靠消费者和公民的良知与行动力，聚集对当前形势有影响的力量：农产品企业、分配各方、消费者、农产品生产商、垂钓者以及政府人士，使他们意识到食品 and 环境的矛盾，投身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来，这至关重要。

这一行动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我们要提高关注、改进方法，以便在相存怀疑甚至敌对的各方间建立起起码的信任。这对我们在国际上实施“可持续食品实验室”等计划有重要影响 (www.glifood.org)。

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有望看到地区和世界的具体改变，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政策或法令上的变更。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世界食品领域出现新

政府治理形式。

(皮埃尔·吴翰：《世界领域食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大挑战》，译自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n° 2993))

中国的期待

中国凭借占世界 9.5%的耕地（1.22 亿 hr vs. 13.06 亿 hr）和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 31%的淡水资源（2201m³ vs. 7044m³），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从 1978 年到 2006 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 57.5%和 67.7%下降到 35.8%和 43%，中国人的饮食也从食物短缺进入数量充足、种类丰富的年代。上述发展表明中国已经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中国食品供应的发展

过程具有“先发展、后治理”的特征，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当食品业进入买方市场、消费者需求结构升级的阶段时，增强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成为食品供应链管理的主要任务。

人们对于食品供应链的关注，是因为很多在食品供应中产生的问题，无法归咎于哪一个企业或供应链条上的哪一个环节。目前在中国，对于食品供应链的讨论，绝大部分是为了提高食品安全性以及食品物流过程的效率。不过，具有可持续性的食品供应链，其特征除了食品安全保障和流通效率高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两方面，即最终食品的价值增值的合理性以及利润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合理分配、食品供应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最小化。

从可持续的食品供应链的上述四个特征看，中国的食品供应链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总体上是不可持续的，食品安全隐患较大，污染较严重，食品链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合理；（2）中国正在食品物流业、食品企业、农业产业化、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等多方面做出巨大努力，食品供应链正在改善；（3）食品供应链的改善具有不平衡性和渐进性。

（檀学文：《中国可持续食品供应链的现状、问题和展望》）

前瞻 4 中国与 FPH 的新平台：三维跨文化对话

《跨文化对话：思想与方法》

乐黛云、金丝燕主编

主要目标：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方法，加强跨文化对话，帮助中西方第三次交流顺利进行。

《跨文化对话：思想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跨文化对话》是出版文集、传播思想的重要平台：

- I. 《思想与方法》
- II. 翻译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著作。
- III. 新思想丛书。

(乐黛云、金丝燕)

后记

FPH 的目光

1992 年 FPH 开始和中国合作，通过十四年来举办的各项活动，我们打开了工作局面、稳固了与中方的伙伴关系、学习并努力适应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取得的经验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活动的展开。

1. 1992- 1996 年，与君初相识：文化间交流。

因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关系甚笃， FPH 自 1992 年始，拜跨文化之功，和中方几所大学取得了联系。在居斯塔沃·马林发起的 AVE 计划框架内，FPH 提议 1993 年 6 月在蛇口举行一次会晤。中方朋友们在此次会晤上各抒胸臆，为构建一个负责、团结的世界出谋划策。

以“建立一个负责、团结的世界联盟”为契机，我们邀请中方合作者赴法国和其他国家参观访问。访问活动的开展加固了双方友谊。FPH 最关心的是文化间交流，但中国还处于对话前的孤立期，还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世界文化间对话中来。FPH “关注他者的话语和意见，而不是想当然地自认为了解对方。尊重和友谊足以超越利益冲突，从而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皮埃尔·卡蓝默)。”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创建的燕京小组为两方合作提供了支点(地球日、两性关系讨论)。

这一时期也是我们与安德烈·勒维斯克(André Lévesque)、CERS 及于硕的合作期，我们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了“统一性和多样性”，探讨了“价值交叉”等问题。

这一时期我们与中国文化研究院(乐戴云教授)取得了联系。在金丝燕的协助下，米歇尔·苏盖和嘉特琳·盖尔尼耶与南京大学开始了合作。

这一时期是 FPH 在中国的关系初建期。我们参观访问、结朋交友。除了文化间交流之外，当其时，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活动是否可行，也不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2. 1996- 2002 年，跬步成千里：多领域计划的实施

1996 年可谓承上启下，南京会议得以举行，此次会议聚集了中法各大学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商、编辑和哲学家。在米歇尔·苏盖和嘉特琳·盖尔尼耶发起的 DIV 计划框架内，我们制定一系列出版计划，如远近文集、文化间对话杂志关键词计划和中法著作互译等。南京会议闭幕后，这些计划得以先后落实，并在 1996-2002 年间举行的维拉尔索会议(1997)、北京会议(1999)和巴黎会议(2001)中得到了发展和充实。

经米歇尔·苏盖和金丝燕介绍，陈越光结识了皮埃尔·吴翰。当时陈越光是中国文化书院副主席兼《农民》杂志主编。两人的相识是 APM 和 FPH 在农业与食品领域合作的起点，促成了中方 1996 年参与 APM 在非洲和罗马发起的多项计划。我们帮助中了解到非洲、欧洲和拉美农民的实况。因为从未要求中国朋友们发表这样或那样的申明，FPH 赢得了中方合作者的信任，其他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如出版领域的 APM, AVE, DIV 计划等)。这种高质量和可持续的良好关系为我们之后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这个时期，我们意识到在中方、FPH 和其他国际合作者之间必须存在高水平、稳定而可靠的协调人，以此来确保交流畅通，保证翻译、联系、文化阐释工作顺利开展并建立相互信任。在这个方面，于硕和金丝燕贡献突出。

这一时期，我们探索了新的合作形式，在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1997 和 1999 年，在中国市政机关的支持下，我们不仅与 APM 网以及新建的 APM 中国网合作调查了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也与 CERS 一起在六个城乡开展了关于“全球

化和中国身份认同”讨论，还对内蒙古进行了土壤考察。

我们采取小组讨论方式，举办了多次讨论会，主题涉及第三产业、一致性与多样性、食品安全和食品主权，可持续发展和工业生态学。皮埃尔·卡蓝默曾在讨论会上发言，FPH与APM网积极参加或是应邀与会（1999年北京食品安全会议，2001年中国市政大会）。从此，FPH成为中国官方正式承认的合作者。

这一时期，我们建立了交流网站，在欧洲和中国城市之间设立中介站（1998年），建成了APM中国网，通过出版计划逐步建立起编辑网并创建了燕京小组。这些都为合作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

2001年里尔世界公民大会的筹备工作使中国合作方融入到对责任宪章的思考中来。四十余名中方代表参与了这次形式新颖的国际会议。前几届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也为中方参与者提供了了解世界公民社会动态的机会，使他们思索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投身到集体事务中来。

我们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中文书籍和资料，被收入《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皮埃尔·卡蓝默的《可能的使命》、苏伦·埃尔克曼的《工业生态学》，另有一些社会学书籍、建议书、转基因方面的著作、中文的《土地公民》和APM的中文资料。

3. 2003- 2006，百尺竿头：中国人的创造力、维持世界可持续发展、迈向新型治理方式

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几年里，她将成为极具实力的国家，也将面临全球化的生态问题和一些潜在威胁。

我们的中方友人（大学研究中心、报界、杂志界、基金会、市镇团体、市区政府和公共机构）深谙中国发生的新变化，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筹办各项活动并逐渐走向创新。他们拥有全球视野和提出意见建议以及发展新型合作关系的能力。

2003年，FPH在北京制定行动计划之际，也是我们的中方盟友才华大显之时。他们认为与其将FPH的全体中方合作人员集结在一个领域（建设负责、团结世界联盟），不如保留多领域的多样性，从而以温和灵动的方式来求同存异。

此外，他们还组织了治理问题系列会议、在某些杂志上发表了以治理为中心议题的论文，就上海城市发展问题建立了工作站，并通过网上交流工具与FPH展开讨论。讨论所涉话题广泛。陈越光建议编辑世界公民社会和治理问题年鉴，政府治理网站得以创立，由陈力川负责协调。农业发展学院组织了一次水产养殖和渔业参观访问，并准备在中国举办食品展览会，诚邀各界人士参加（企业界、民间代表以及政界），协助“可持续食品实验室”计划顺利实施。

2005年南沙中欧论坛的成功举行，得益于中方的参与和组织。FPH也动员了国外一些重要合作者并提出了不少方法和建议。这次论坛是一次大陆和国家间的对话，其后续会议将在欧洲筹办。南沙论坛激发了皮埃尔·卡蓝默的灵感，他由此构思了中日法德论坛计划。

中印间有了不少交流契机，两国也都积极广泛地参与到交流中来（AVE，孟买世界社会论坛FSM之前的印度行……）。

中国人在世界社会论坛中成了一支积极参与、活力四射的力量（在阿雷格里港，尤其是孟买组织了一次印度长旅）。

中方的创新能力有了飞跃发展，这种进步既体现在中国国内，也表现在与国外合作方的合作上。如此一来，我们在各领域都有了一些对话者，可以进行讨论、交流、且共同制定各种活动计划（治理、城市、食品可持续发展体系和工业生态

学……)。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开辟出了一方更宽广、更开放的讨论天地：建立网址网页（治理、科技中国杂志、上海城市经验等）、组织网上讨论（人民网 People.com）、与杂志社合作（《跨文化对话》、《科技中国》、《中国妇女》和《教育报》等）、举办交流讨论会（大学、地方行政学院、科学院等）。

公民社会如初生之鹰，羽翼未丰：环境网正在建设之中，我们与企业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国食品领域采取的行动（食品实验室），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与中国企业界交流的新契机，也是我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的一种新尝试。

从 2003 年起我们就启动了中文翻译工作，并将某些翻译好的文章转化成了 Fiche Bip（基金会内部常设文献库）格式。由此，FPH 的网页上就有了一些汉语文章。

从 2005 年至今，我们按月举行一次例会，以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整，处理好 FPH 中国团体内部、协调人以及活动家之间的关系。

回顾在中国与中国朋友们一起开展的各项活动，我们可以看到 FPH 在合作方法上的演进和变化，这种变化源于我们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也和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举办的某些活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展开提供了有力参照，如独立出版人联盟、参访团、治理年鉴计划、洲际间国家对话论坛以及湄公计划等等。

（皮埃尔·吴翰：《FPH 参与中国活动的演进》）

中国的目光

在我看来，FPH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间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联系，一个不设具体机构而具象征性和可操作性的实体。该实体具有创新的勇气、宇宙精神、摆渡者的作用以及懂得倾听、坚忍不拔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着对人类共同体的极大信心投身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FPH的长期发展。

FPH 的特色：

- 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关系

自1992年始，FPH及其负责人逐渐成为欧洲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专家”，在欧洲享有盛誉和号召力。这项成绩的取得，既要归功于FPH业已构建的运作体系，也要归功于中欧两方人民的努力，是他们积极投身于媒体、大学、市政、农民、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各个领域，满怀热情地实施着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

- 与非中方合作者一起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FPH可不是一个寻常组织。它可以发起各种会晤，给中国带来了新观念，从而给社会注入了新活力。任何一个中国人，想要组织类似的活动，则要受到更多限制。FPH的这些功用是在会晤、研讨、教学、考察、出版、网上讨论、电视宣传和建立城市工作站等一系列活动中慢慢摸索而成型的，与AITEC、CERS、LARES、跨文化对话和其他组织的协作密不可分。FPH在中国举办的以上活动也为它在欧洲赢得了良好声誉。

- 推进中国融入世界公民运动之潮

FPH是世界公民运动的领导人。它积极推进中国融入到世界公民事务的思考和治理中去，中欧论坛及参照法德经验启动的中日对话就是很好的实践。中方对FPH抱有真挚的感情和殷切的期待，因此必须对FPH担当的重要角色予以重视。

● 思想传播

在中国人看来，皮埃尔·卡蓝默是卓越而可敬的思想家、实践者和领导人。以上认识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各项创新性活动的举办；二是电视纪录片（《地球祖国》介绍了世界公民大会、《治理我们共同的家园》讲述了卡蓝默的中国之行）、书籍（《法国新思潮》、卡蓝默著作的中译本以及发表在以下杂志及报刊上的文章：《中国妇女》、《中国市长报》、《上海城市发展》、《中国教育》、《科学与技术》和《跨文化对话》）、网页以及讨论会。

中欧双方认为以下问题堪称当务之急：

- 大学改革以及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研究改革，
- 城市、地区以及世界治理，
- 借鉴各方治理智慧，思考全球治理方式，
- 树立道德规范，超越技术专制，
- 创建全球关系新模式。

对未来工作的建议：

FPH 需要建立一个固定团队，以此为中介，加固与长期合作者间的关系、维护计划持续有效实施、跟踪长期性计划落实，如上海的可持续城市治理工作站就是 FPH 与上海合作的特色创新。这样一个固定团队的建立还可以让我们的部分合作者专司其职，而不至于有心无力，在这方面，何承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愿 FPH 的成功为明日之世界做出贡献。

(于硕，建立世界新型关系的唯一实体)

两个转折期（1996-2002, 2003-2005）：从观察到参与，从计划到方法

1. 第一个转折期（1996-2002）：与 FPH 一起行动和思考-从观察到参与

1996：起步迈向积极参与

1996 年南京会议是中国和 FPH 合作史上的第一次转折。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与会者不再满足于临时行动，而是提出了一些长期合作计划（跨文化对话，远近文集，关键词等等）。一起行动、共同思考从此成为中方的座右铭。FPH 也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中方各界信任，能在中国不同层面开展活动的欧洲基金会。

1997：第一次政府会见

1997 年夏，SECM（陈越光、谢杨）成立了中国 APM。针对食品安全和二十一世纪世界农业保护政策等问题，APM 组织了一次与 FPH（PV）的国际合作（合作得到了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及河北、江西和山西三省的支持）。此次合作使 FPH 成为被中国政府认可并在外交部注册的国外合作方。星星之火意义非常，从此，FPH 的身份就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在中国展开多样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得以集合七个国家的二十名代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进行了一次深入中国内陆的考察。1999 年，在宁夏省党委第一书记毛如柏先生的协助下，我们考察了宁夏（该省因其 85 % 的穆斯林居民而成为“保护区”）。考察前的准备工作非常艰难，此次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来自 12 个国家的二十名外国人一起进省已是不易，更何况这些来访者又都是民间代表。毛如柏先生信任中方组织者陈越光，在听取了 FPH 的方法、原则、合作计划和考察部署后，毛先生支持考察团的二十名客人进省。十五天里，从城镇到山区，我们且行且止。某些深山地区的百姓在日本部队（1945）溃败后，没有再见过外国人。如果说 1997 年的山西之访让某些中国百姓第一次在电视上，从皮埃尔·吴翰口中，听到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词，那么这次宁夏之行则是第一次让乡民知道有人在关心“食品主权”问题。

我们最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际共同体不仅听到了中国大众的声音，也可以带着自己的思考以及方法体系参与到中国的发展大潮中来。这是 FPH 和中国合作以来的第一个转折点。

2. 2003-2005：第二个转折点-从计划到方法

2003 年 1 月，在阿雷格里港，陈越光与皮埃尔·卡蓝默进行了一次 7 小时的长谈，谈话的焦点是确定双方合作的新方向。此次谈话将引发中国和 FPH 合作史上的第二次转折。2003 年 2 月，中方与 FPH 合作，以“回顾与前瞻-跨文化对话：构建负责、稳定和多元的世界”为主题组织了一次会晤。双方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规定了今后十年的合作行动内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将中方各界盟友齐聚一堂，为将来制定纲领和行动方向。

2005 年 6 月，在中方和 FPH（陈越光和皮埃尔·卡蓝默）的组织下，我们在北京举行了治理论坛（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治理论坛），这是中国和 FPH

合作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此次峰会确定了合作部署。中方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主题思考（治理、道德和可持续发展）及方法研究上。双方将通力合作，建立治理思想学院。

合作中取得的成果有：

- 动员各界力量，聚集各学科人士（政府官员、大学学者、研究人员、记者、作家、农民、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济济一堂）与 FPH 同思考、共行动。
- 激发了农民对外部世界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关注全球性的大问题。
- FPH 在中国逐渐为人所知。中方成为 FPH 的积极合作者，并能就 FPH 制定的战略性计划，在国内外展开合作。
- 带来了观念领域的革新，推进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文化的多样性的相关集体思考。
- 合作中的最大发现是懂得了互识的重要性。

当今时代将太多掌声和欢呼送给了盲动，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却无人问津。

我们建议共同寻找新方法，以应对新挑战。集体思考治理问题，获得相关思想和智慧。

思考是人类最重要的责任。

思考将会给未来留下不朽的印记。

最大的进步莫过于思想的进步。

我们期待着与 FPH 一起：

- 长期合作、共同探索新思想和新方法；
- 在治理问题上取得思考和资料方面的新突破（网页、年鉴、个案研究及交流）；
- 积累并保存我们共同行动所取得的经验（总结、资料卡片及出版物）。

（陈越光、金丝燕，对 FPH 的期待？ —— 两大历史转折）

思想与实践循环往复互滋共长

PC（皮埃尔·卡蓝默）：我们基金会的另一个特色，是我们在具体经验和理论思维两者关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我总是很怕看到那些所谓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之间的裂痕。在对世界的理解方面，这一割裂是荒谬的，在理论和知识方面以及认识论方面同样如此。对社会的认识只能来源于行动，来源于具体经验的交流。

JS（金丝燕）：这是不是在思维与实践之间不断地来往反复？

PIC：这是在思维体系的演变和实践的演变之间持续地来往反复。真正的革新就是在这其中进行的。正因为此，我们特别强调信息的结构化。世界公民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试图弄明白，我们从所有这些工作中得出了什么结论，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先行任务是什么。我们发现，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世界共同体的构建之外，真正巨大的变化不是政治变化，而是思维体系的改变。

JS：伦理和美学思想的变化非常缓慢，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五十年，甚至是八十年时间。

PIC：变化确实很慢。因此我们最终谈到了信息的结构化这一重大问题。如果说思维体系的演变确实扎根于实践中，与经验的交流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应该构思经验交流的国际体系。这里面有许多问题：comment aller la chercher, la trouver, la mettre à la disposition des autres（这里的la究竟指什么）？还有，如何对信息进行结构化？在我看来，电脑和因特网的普及引入了一种新的维度，我常说，甚至是在这之前，在与信息的关系层面上，民主的挑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信息即力量。”我们都明白官场上每个人为了隐藏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息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但这同时也就是说，民主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获得信息。然而如果您注意看，您会发现，如今世界上流通的信息量成倍增长。比如，有了因特网，每个人都有获得世界上

所有信息的可能。按照人人皆知的规律，信息量每年翻一番，问题不再是如何获得信息，而是如何将信息结构化，如何选择信息！问题不再是“我是否能够获得信息”，而是“我是否能够获得对我来说有用的、可靠的、能够在行动中运用的信息”。因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方法论层面的工作，来组织信息，将之结构化，以弄清我们在这片信息的海洋中如何找回自我，寻得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同样，我们完善了方法论，在复杂的信息间穿行，建立各种联系。这正是樊尚·卡蓝默所做的工作，他设计了一款地图绘制软件，来代表各种联系。人们会说：“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了。”非常好！但问题是我们人类的头脑如何能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关键问题是怎样做。比如，在一场会晤中，我们如何能从多元的观点中构建出一个综述，而这个综述又非作报告的人在会议前就已经准备好的结论，而是真正的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切都需要方法。因此，我们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七年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继续完善集体智慧的方法和工具。

信息重新结构化体系的基础之一，就是我所说的“镜头焦距变化过程”。首先要拥有综合信息，然后深入研究它们中看起来最有用的信息。于是我们从关键词过渡到题目，也就是说从最概括的事物过渡到摘要，从摘要过渡到更加细化的经验卡片，或许最终再过渡到各种资料。比如，我们曾与上海城市发展中心进行过一次对话，与他们商讨共同开发一种交流大都市治理经验的工具。未来七年内我们所想要的，正是这种可以赋予他人，尤其是与他人共同完善和发展的方法论资本。

JS：这项工作已进行了二十年之久了吗？

PIC：这是二十年工作的成果，它还要再继续延伸五十年。

JS：您谈到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方法论，您是否能用几个您认为最重要的词来对其进行定义？

PIC: 第一个关键词是“信任”。信任比权力更有力，因为信任只可能被背叛，而在权力问题上，人们则可以换着路走。因此在对伙伴关系的构建中，对信任的构建处于中心位置。第二个关键词当然就是“对关系的处理”。问题的关键不是完善局部事物，而是构建关系。

因此，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对复杂性的处理”。人们如何在复杂性中穿游？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笔记，题为：“复杂性是一种节日。”我们不把复杂性看作是会把我们压垮、让我们头疼的东西，不把它看作是让我们走不出去的致命的迷宫，而把它当作人类财富和多元性的一种表达，当作一种节日。为了让它成为一种节日，我们要学会在复杂性中穿游，就像其他人学会在外海航行一样。

第四个关键词是“集体智慧”。我们独自一个人聪明是不够的。我们一个人对现实的感知只能是很小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智慧不是并置或对立，而是联合起来以产生集体智慧。

另一个关键词是“过程”。即使是一场会晤，一次研讨，我们也要把它看成是一段历程，是攀登高峰的一次远足，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却不知道会找到哪条路。让我们对过程进行思考。不要把会晤当成通过一项事先制订的草案或将各种陈述并置的机会。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次共同分享的历险。

最后一个关键词“经验与思考之间的联系”指的是在行动与思考之间来往反复。

（皮埃尔·卡蓝默/金丝燕 主动构建自己的世界观，《跨文化对话》，第22期，2007年，第193-219页）